



城市 造反

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

環境設計研究協會 (EDRA)
2012年最佳著作獎
PLACES BOOK AWARD

CITY REBELLING

主編



ISBN 978-986-6723-93-3 0GGK0195 NTD380

讀書共和國
www.bookrep.com.tw

挑戰公共／私有、開發／永續、中央／邊陲、城市／鄉村……的界線
北京·洛杉磯·舊金山·柏林·東京·西雅圖·香港·多倫多·溫哥華
農學都市×閒置空間再利用×社區營造×藝術介入×社會正義×反迫遷×城市游擊

怎樣才是好城市？誰來定義好城市？

從突尼西亞到埃及，從占領華爾街到占領土耳其的廣場，從北半球的
城市造反事件如野火燎原般席捲全球。這股從城市點燃的人民之火向
我們想問的是，人民的力量如何參與新公共空間的建立，又如何打壓
在新一波的公民行動中，對城市空間的改造如何能夠帶給社會關係、

《城市造反》從世界各地，收錄了十一個特色各異的社區營造實例，
透過各地的城市造反實錄，瞭解當地民眾與專業者，在面對個化的都市
不只是從事抵抗、反制與自力救濟，更重要的是重新營造一個更多元、開放的城市。

《城市造反》說明了面對政治與資本支配空間的力量，人們並不是無助的。

這些空間反叛是一種民主實踐，是民眾由下而上參與公共生活，參與對於公共空間的書寫與意義的創造。

——張鐵志 | 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

《城市造反》改寫了我們一般對於公共空間的想像；

打破從國家所定義的集會廣場、紀念園區，為公眾而建的市集、社區公園等刻板形象，
而理解到原來城市可以變成生活的實驗室，個人可以積極參與和實踐公共的可能。

——吳瑪悒 | 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教授

城市造反

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

CITY REBELLING

侯志仁 —— 主編

JEFFREY HOU —— Editor

城市造反

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

CITY REBELLING

城市造反：

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

侯志仁主編；吳比娜等譯。

—初版。

—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2013·09

面：公分。

—（左岸建築：195）

譯自：City Rebellling

ISBN 978-986-6723-93-3

（平裝）

1. 都市計畫 2. 社區總體營造

3. 個案研究

545.14 102014557

左岸建築 195

主 編 侯志仁

總 編 黃秀如

責任編輯 林巧玲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

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 版 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 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 108-2 號 9 樓

電 話 (02) 2218-1417

傳 真 (02) 2218-8057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E-Mail service@bookrep.com.tw

網 站 <http://blog.roodo.com/rivegauche>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 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380 元

I S B N 978-986-6723-93-3

行著作權 翻印必究（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3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尋找都市裡的造反基地

室內講座

9.26 (四) | 誠品台大店 20:00~21:00

好樣的協同住宅：溪洲部落的抗議與新生

于欣可 (《反造城市》作者) vs. 楊示範 (政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

10.4 (五) | 誠品敦南店深夜講堂 22:00pm~23:30pm

城市裡的夜市人生

顏亮一 (《反造城市》作者) vs. 邱啟新 (《反造城市》作者)

10.18 (五) | 誠品敦南店深夜講堂 22:00pm~23:30pm

用綠色來游擊城市！

大猩猩綠色游擊隊 (《反造城市》作者)

10.25 (五) | 慕哲咖啡 19:30~21:30

《城市造反·反造城市》分享會

10.26 (六) | 社造中心 15:00~17:00

《城市造反·反造城市》分享會

WALKING TOUR

11月各週末，單場100元

憑本書活動券可免費參加

- ▶ 用腳閱讀那一頁的美麗與哀愁：瑠公家園 | 吳振廷 (《反造城市》作者)
- ▶ 探訪生態綠寶石：土城彈藥庫 | 當地文史工作室
- ▶ 走訪新店溪左岸：溪洲部落 | 于欣可 (《反造城市》作者)
- ▶ 綠點巡禮：跟瓦片去旅行 |
連振祐 (《反造城市》作者)、施佩吟 (《城市造反》譯者)

確定場次請見「左岸文化 Facebook」或「造反基地 Facebook」

1 「尋找都市裡的造反基地」
WALKING TOUR
活動免費券

2 「尋找都市裡的造反基地」
WALKING TOUR
活動免費券

3 「尋找都市裡的造反基地」
WALKING TOUR
活動免費券

推薦序 **重新占領城市** 8

RE-OCCUPY THE CITY

張鐵志 —— 文

推薦序 **打開新的社會關係，形塑新的公眾** 10

**OPENING NEW SOCIAL RELATION-
SHIPS, MAKING THE NEW PUBLIC**

吳瑪俐 —— 文

《**城市造反**》序 12

CITY REBELLING: AN INTRODUCTION

侯志仁 —— 文

- 1** 在北京街頭跳舞.....22
城市系統裡的即興演出
DANCING IN THE STREETS OF BEIJING
IMPROVISED USES WITHIN THE URBAN SYSTEMS
陳樂倫——文·吳比娜——譯
- 2** 洛杉磯的拉丁城市主義.....44
城市再造的新模式
LATINO URBANISM IN LOS ANGELES
A MODEL FOR URBAN IMPROVISATION
AND REINVENTION
James Rojas ——文·鄧佑生——譯
- 3** 占用一下.....58
Rebar 無厘頭的城市寬厚戰術
TAKING PLACE
REBAR'S ABSURD TACTICS IN GENEROUS URBANISM
Blaine Merker ——文·顏寧——譯
- 4** 「城市實驗室」.....78
孕育柏林自由空間的永續發展
EXPERIMENTCITY
CULTIV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BERLIN'S FREIRÄUME
Michael LaFond ——文·賴彥如——譯

- 5** **東京・城市再生** 92
營造都會建築的公共性
RE-CITY, TOKYO
PUTTING “PUBLICNESS” INTO
URBAN BUILDING STOCKS
伸響庭、西田司——文·賴彥如——譯
- 6** **在私人住家裡營造的新公共領域** 104
**MACHIZUKURI HOUSE AND
ITS EXPANDING NETWORK**
MAKING A NEW PUBLIC REALM IN PRIVATE HOMES
林泰義——文·施佩吟——譯
- 7** **西雅圖夜（市）未眠** 118
搞活動與公共空間的再造
“NIGHT MARKET” IN SEATTLE
COMMUNITY EVENTSCAP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侯志仁——文·賴彥如——譯
- 8** **城市農耕與反叛空間** 132
洛杉磯與西雅圖
**URBAN AGRI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INSURGENT SPACES
IN LOS ANGELES AND SEATTLE**
Teresa M. Mares and Devon G. Peña——文·吳瑟加——譯

9 廣場外的動／感地理 152
移向潤澤邊界的香港城市公民行動
GET WET AND DIRTY

SHIFTING GROUND FOR
HANDS-ON URBANISM IN HONG KONG

黃舒楣——文

10 公共空間行動主義 172
多倫多與溫哥華
**PUBLIC SPACE ACTIVISM,
TORONTO AND VANCOUVER**

USING THE BANNER OF PUBLIC SPACE TO
BUILD CAPACITY AND ACTIVATE CHANGE

Andrew Pask ——文·顏寧——譯

11 「非常」公共空間 190
**(NOT) YOUR EVERYDAY
PUBLIC SPACE**

侯志仁——文·吳比娜——譯

城市造反

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

CITY REBELLING

侯志仁 —— 主編

JEFFREY HOU —— Editor

推薦序 **重新占領城市** 8

RE-OCCUPY THE CITY

張鐵志 —— 文

推薦序 **打開新的社會關係，形塑新的公眾** 10

**OPENING NEW SOCIAL RELATION-
SHIPS, MAKING THE NEW PUBLIC**

吳瑪俐 —— 文

《**城市造反**》序 12

CITY REBELLING: AN INTRODUCTION

侯志仁 —— 文

- 1** 在北京街頭跳舞.....22
城市系統裡的即興演出
DANCING IN THE STREETS OF BEIJING
IMPROVISED USES WITHIN THE URBAN SYSTEMS
陳樂倫——文·吳比娜——譯
- 2** 洛杉磯的拉丁城市主義.....44
城市再造的新模式
LATINO URBANISM IN LOS ANGELES
A MODEL FOR URBAN IMPROVISATION
AND REINVENTION
James Rojas ——文·鄧佑生——譯
- 3** 占用一下.....58
Rebar 無厘頭的城市寬厚戰術
TAKING PLACE
REBAR'S ABSURD TACTICS IN GENEROUS URBANISM
Blaine Merker ——文·顏寧——譯
- 4** 「城市實驗室」.....78
孕育柏林自由空間的永續發展
EXPERIMENTCITY
CULTIV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BERLIN'S FREIRÄUME
Michael LaFond ——文·賴彥如——譯

- 5** **東京・城市再生** 92
營造都會建築的公共性
RE-CITY, TOKYO
PUTTING “PUBLICNESS” INTO
URBAN BUILDING STOCKS
伸響庭、西田司——文·賴彥如——譯
- 6** **在私人住家裡營造的新公共領域** 104
**MACHIZUKURI HOUSE AND
ITS EXPANDING NETWORK**
MAKING A NEW PUBLIC REALM IN PRIVATE HOMES
林泰義——文·施佩吟——譯
- 7** **西雅圖夜（市）未眠** 118
搞活動與公共空間的再造
“NIGHT MARKET” IN SEATTLE
COMMUNITY EVENTSCAP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侯志仁——文·賴彥如——譯
- 8** **城市農耕與反叛空間** 132
洛杉磯與西雅圖
**URBAN AGRI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INSURGENT SPACES
IN LOS ANGELES AND SEATTLE**
Teresa M. Mares and Devon G. Peña——文·吳瑟加——譯

9 廣場外的動／感地理 152
移向潤澤邊界的香港城市公民行動
GET WET AND DIRTY

SHIFTING GROUND FOR
HANDS-ON URBANISM IN HONG KONG

黃舒楣——文

10 公共空間行動主義 172
多倫多與溫哥華
**PUBLIC SPACE ACTIVISM,
TORONTO AND VANCOUVER**

USING THE BANNER OF PUBLIC SPACE TO
BUILD CAPACITY AND ACTIVATE CHANGE

Andrew Pask ——文·顏寧——譯

11 「非常」公共空間 190
**(NOT) YOUR EVERYDAY
PUBLIC SPACE**

侯志仁——文·吳比娜——譯

作者群

陳樂倫 Caroline Chen |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環境規劃博士與公共衛生碩士，哈佛大學景觀建築碩士，現任加大柏克萊分校景觀建築系講師。主要研究環境與社會文化因素如何透過城市裡的中介空間影響社區健康。

James Rojas | 一位全美著名的都市規劃師，專長於研究拉丁文化對都市設計的影響。他在麻州理工學院的有關拉丁文化環境的碩士論文曾被廣泛引用。目前為Place U!主持人，推動各式讓民眾得以充分發揮創意的工作坊與參與式設計遊戲。

Blaine Merker | 定居於美國舊金山的景觀建築師與公共藝術工作者，以及Rebar與Park(ing)Day的協同創始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景觀建築碩士，他的作品主要探討設計與社區運動的介面，以及環境中的社會與空間提示。

Michael A. LaFond | 德國柏林id22創意永續中心主任(id22.net)。作品主要涉及空地與空屋的市民社會再利用、非正式規劃、環境技術的創意使用，以及都市規劃過程的民主化，專注於都市與國際性的協同住宅(CoHousing)文化：一種自我組織、社區導向與包容和永續的住宅形式，以及如eXperimentdays和Wohnportal網路平台等活動與網絡。

饒庭 伸 | 早稻田大學建築系工程博士，現任首都大學東京副教授。共同創立「愛麗絲中心」——一個拓荒性、非政府組織間的中介團體。主要研究城市規劃、地方治理與市民參與。

西田 司 | 出生於日本金澤，橫濱國立大學畢業，曾任首都大學東京助理教授與橫濱國立大學副教

授，於二〇〇四年成立ON Design，開始在日本建築界展露頭角，主要作品包括「六本木農園」。二〇一三年展於維也納工藝博物館(MAK) Eastern Promises 東亞建築展。

林 泰義 | 東京大學畢業，為日本推動市民參與非營利組織運動的主要人物。一九七〇年代於東京世田谷區從事「造町」運動，並於八〇年代推動日本的社區參與、「造町」立法與工作坊。一九九八年非營利組織法通過之後，著力於推動社區發展的新社會基礎建設的推動。

Teresa M. Mares | 美國華盛頓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博士，現任美國佛蒙特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並參與食物系統跨領域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族群移動與食物的連結，特別專注於拉丁裔移民飲食習慣隨著移居的變遷。

Devon G. Peña | 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與美國族裔研究教授，Acequia研究中心會長與創始人。著有多本專書，包括最近的「墨裔美國人與環境：土地與生活」(亞利桑那大學出版社)。

黃舒楮 |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建成環境學院博士。曾服務於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華盛頓大學都市計劃系與地景系助教，研究關注東亞都市更新、依存地理學、城市地景保存與地方記憶、流動與迫遷等議題。現任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系兼任助理教授。

Andrew Pask | 溫哥華公共空間網絡VSPN(www.vpsn.ca) 執行長。有過人類學與都市規劃的訓練，參與加拿大各城市的都市議題、社區研究，以及規劃與設計案。

譯者群

吳比娜 | 覺得城市不該（只）是住大房子、好辦公室的地方，城市應該是學習、成長，跟不同人相遇的所在。喜歡在路上跟陌生人聊天，並在廣場和草地上發呆，希望從夢想漸趨於實踐。常從事寫作與翻譯，作品散見《聯合報》、《鄉間小路》、《大自然》、《人籟》。台大城鄉所畢，哈佛大學公共政策碩士。

鄧佑生 | 一九八五年生，台灣新竹人，中原大學建築系畢業。期望建築是以一溫暖的方式存在，反應環境、文化，與人性。當建築具有意涵與故事，便能使人產生共鳴，與溫暖人心。喜歡在旅行中體驗不同的文化，尋找各國建築與居民交流的方式。希望能找到一種頻率，做出能讓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共鳴的建築。

顏寧 | 現任「綠色和平」海洋專案主任。近年關心都市空間與海洋生態，愛好表演藝術，看舞跳舞也寫舞評。過去組織「五年計畫」參與台北藝穗節，尋找與環境對話的表演方式，演出作品《女子弄》、《環遊我家》和《雙爽呆逮》。舞評發表於《PAR表演藝術雜誌》《國藝會雙月刊》與《BINDO翻桌報》等刊物，曾獲台灣藝文評論徵選專案優選。兼職譯者，譯有《質性研究：設計與施作指南》與《建構扎根理論》（合譯）。

賴彥如 | 有豐沛的好奇心，喜歡觀察人心以及世界怎麼運作。在山林裡感覺很安全，和陽光與樹葉的光影是好朋友，愛聽蟲鳴唧唧，四處亂走。著迷瑜珈的古老智慧，想要找到一種讓你我他蟲魚鳥獸陽光空氣水與老樹老屋更快樂的生活方式。台大外文雙主修社會系畢，在文學的領域裡發現人性的複雜，在社會學裡發現自己和這個世界連結的可能，後來進了城鄉所打滾。現在從事社區營造工作，持續摸索好城市的各種可能。

施佩吟 | 一九八二年次，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大學時代因為一場南投埔里反瀝青廠運動的街頭落淚經驗而開始接觸九二一災後社區營造，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在鹿谷茶鄉進行田野調查研究，對於空間環境與人的興趣是在那時才開始的。目前還持續從事空間規劃的行業，專注於都市公共空間及社區社群的地區營造機制。

吳瑟加 | 台大哲學系畢，兼職譯者。在康乃爾大學都市與區域規劃研究所就讀時主要興趣是歷史保存，對於常民地景一老牆一朽木，皆常有感情：故既懼唯商是慮之摧迫；但另一面，也對漸漸蔓生、深具「造反精神」的城市塗鴉發愁。但這就是我們百花齊放，處處生命力湧現的多姿世界，豈不令人讚嘆？

推薦序

重新占領城市

RE-OCCUPY THE CITY

張鐵志 | 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 —— 文

八月四日晚上，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上，二十萬白衣人席地而坐，齊聲唱著《你敢有聽著咱唱歌》，表達對這個政府的強烈憤怒。

在今年（二〇一三年），已經有許多抗議活動，抗議音樂晚會在這裡進行。例如，三月九日的反核晚會，陳明章、1976、Tizzy Bac、旺福輪番上陣，根本就是一場陣容華麗的演唱會。

這個曾經是最森冷的權力展現的大道，現在是人民抗爭的公民廣場。

同一時間，在兒童育樂中心和花博，正在舉行搖滾音樂節「野台開唱」。在今年的野台開唱，也有許多音樂人在這個前台北市政府巨大都市改造計畫的土地上，拿起了抗議標語：「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

人們拿著手上的吉他和布條，重新占領過去被政治界定的公共空間。

這個占領反抗行動當然不只是台灣，而是過去幾年在全球

各地都不斷發生：從開羅的廣場到華爾街的公園到馬德里、智利、土耳其，占領行動既是抗議更大的政治經濟體制，也是重新要翻轉當地公共空間的定義。

占領的反抗行動當然不只是這些短暫的抗議行動。在這本《城市造反》中，呈現了世界各地的不同「占領行動」，或者都市游擊行動：搶占公共空間，改寫公共空間的意義；占據廢棄的空間或都市的邊緣，賦予這些空間新的可能性；或者守衛著自己的社區與農村，捍衛生活的意義。

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本來就是一部空間爭奪的歷史。

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或者更多是兩者的合謀，總是試圖界定城市的樣貌與精神，在城市的紋理留下他們的慾望、利益與文化想像。但城市空間除了規劃者的想望，往往具有豐富的、有機的庶民生活，在制式的都市主義邊緣強勁的生長。而資本積累的必要性，和政客們對於「現代化」的貧乏想像，又讓他們不斷操縱著怪手剷除那些「都市毒瘤」，以「都市更新」之名建立起一個個光鮮亮麗的公園、中產階級社區、購物商場，或者一個又一個「曼哈頓」。又或者，他們會「活化」歷史建築來成立大型文創園區，卻不讓底層的文化活動有生存的土壤，以方便統治者的管理秩序。在台灣，我們尤其看到各種以工業科學園區（或者底下的地皮）之名來剷除農村，以致於「土地正義」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詞。於是，我們的公共空間不是被私有化與商品化，就是被國家整編入可規訓的大型計畫。

面對政治與資本支配空間的力量，人們並不是無助的。這本書記錄了全球各地的空間游擊，參與的行動者是都市居民、農民、藝術家、塗鴉者、青年、違建者、性工作者，他們或者挪用、或者取回（reclaim）、或者抵抗空間支配，他們所吶喊的是，這是我們的生活，這是我們的公共空間。對一個城市來說，每一個異質的空間都可以生產出不同的社會連帶與認同，甚至不同的文化創造，因而豐富了城市的靈魂。

更重要的是，這些空間反叛／占領行動就是一種民主實踐：是民眾由下而上參與公共生活，參與對於公共空間的書寫與意義的創造，而不是被政治權力與資本所控制——一如我們早已貧困的民主體制。

因此，重新占領／反叛我們的城市空間就是重新占領我們的民主。

推薦序

打開新的社會關係， 形塑新的公眾

OPENING NEW SOCIAL RELATIONSHIPS, MAKING THE NEW PUBLIC

吳瑪俐 | 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教授 —— 文

《城市造反》這本書出現得正是時候，因為這幾年在台灣有許多游擊性、短期性或長期性的空間改造案例，或與空間變革相關的公民行動出現。和解嚴前後的街頭運動不太一樣，它們不以對抗獨裁政權為目標，而是在邁向民主體制後，市民積極想要扭轉主流價值、參與政策制定、改善生活世界有關。它背後的意涵，正是該書所揭示的：這些市民自力營造的希望空間，在舉世濁濁之時，讓人看到個人可以積極參與和實踐公共的可能。

這本書很重要的改寫了我們一般對於公共空間的想像：打破從國家所定義的集會廣場、紀念園區，為公眾而建的市集、社區公園等刻板形象，而理解到，原來城市可以變成生活的實驗室，進行即興或節慶式的短期占用。帶著創意想像，公有空

間的屬性可以被改變，私人空間可以公共化，老街巷弄可以變成藝術展場，不同文化的飲食習慣可以形塑出多元文化的社區菜園，城市也可以成為糧食生產的基地等等。這些手法讓我們看到，不僅公／私的邊界可以挪移，民眾也可以參與重新定義公共空間的形態。都市原來是我們的。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行動者讓我們看到，所謂的公共，原來真是一個爭議的場域，透過不同認同力量的召喚，空間的生產也可以是新的社會關係的生產。空間的即社會的。

透過書中觀點的指引，我們也得以重新檢視，台灣在社區營造、公共藝術，乃至藝術介入空間等政策，在實踐過程的問題。這些政策往往容易流於群眾動員，或者民眾被邀請參與公共空間的「美化」（意識形態的教化），而不是真正的參與公共空間的創造，因此，公民意識難以在過程中形成。

然此書最精彩的也在於讓我們看到，人的身體感官知覺和空間生產重新被聯結起來。從土地意識、食物生產、都市生活、文化記憶、到身體勞動。它們說明，當我們不再便宜行事的以打倒強權作為廉價訴求，返身回到日常的實踐，從關注周遭大小事務，重建鄰里關係，參與公共空間的生產時，我們的存在感、身體感、土地感，便一起重返，回應我們對於美好生活的想像。

誰的公共？從國家所定義的空間，到市民自主的公共生活空間生產，這一條漫漫長路，透過書中案例的啟發，讓我們也找到了市民社會真正的核心價值。

《城市造反》序

CITY REBELLING: AN INTRODUCTION

侯志仁——文

新的世紀以來，各式各樣的「城市造反事件」，在全球形成浪潮。快閃族在城市裡形成新的次文化，街頭與公園裡的枕頭大戰為城市生活帶來新的趣味（圖1）。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創意可以透過網路，在瞬間成為「瘋」潮與效仿的對象。在舊金山，Rebar將路邊停車位改造為臨時性公園的點子，隨著網路的傳播，迅速拓展，成為遍及世界上百個城市、一年一度的全球性活動。這些「城市造反」的做法，有人稱為「臨時性的城市主義」(Temporary Urbanism)¹，也有人稱謂Pop-up與DIY，或是「游擊式的城市主義」(Guerrilla Urbanism)。二〇一二年，報導都市規劃議題的Planetizen網站，以「戰術性的城市主義」(Tactical Urbanism)為名，將這個運動列為年度最流行的規劃趨勢。同年在威尼斯建築展的美國展場中，「即興的介入」(Spontaneous Interventions)更成為年度的主題。

1 見Bishop and Williams, 2012; Haydn and Temel (eds), 2006.



非主流變成主流。

但這些雨後春筍般的市民行動，不僅是即興的創作，它們更可被視為是對傳統、僵化之都市規劃與建設的反諷，甚至是反叛。這些事件凸顯出城市空間的營造，不應只是被體制、專業與國家機器所操控，它也是市民所能發揮創意或向體制進行抵抗的領域。城市造反行動展現的是市民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它提示著人民才是城市的主人。

圖1
紐約聯合廣場上「國際枕頭大戰日」現場綿軟的枕頭與激情的民眾。
(侯志仁攝)



城市造反行動，其實並非是近年來才有的新現象。自古以來，底層社會的群眾即不斷在城市裡營造自我的空間。在江戶時代的東京，人們習於逃離下町管制嚴密的街區，到市郊去尋樂。朝鮮王朝時代的漢城（首爾），一般老百姓為了避免整天頹向在鐘路大道上騎馬而過的官員行人禮，便在後巷中走出一條捷徑，久而久之，成為熱鬧的平民生活與消費的場所。納粹時期的慕尼黑也有類似的經驗，行經 Odeonsplatz 廣場的民眾被要求必須行「希特勒禮」，對納粹主義反感的民眾於是開始走後巷，避開廣場的警衛。這些就像在台北的士林夜市以及大大小小的街頭巷道裡，攤販為了躲避警察的取締，發展出一套機動性的生存法則，俗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圖2
占領華爾街事件將附近的
Zuccotti公園轉化為政治
對話的空間。
(侯志仁攝)

除了平日消極或積極的抵抗之外，戰術性的城市造反行動也有可能累積與爆發，成為有組織的運動與抗爭。二〇一一年，從突尼西亞開展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就是因攤販遭不公的待遇與自焚所引起，長期累積的民怨一夕間爆發，成為阿拉伯世界的全民運動，並在突尼西亞與埃及等地推翻獨裁的政權。同年，「占領華爾街行動」亦透過網路與社會媒體的動員，快速的成為全球抵抗資本主義與跨國企業霸權的新典範(圖2)，「占領」(Occupy)成為新社會運動的代名詞，其精神與手段更影響後續如在土耳其Taksim廣場的抗爭行動。而在巴西，「免收費運動」(Free Fare Movement)也從Occupy得到靈感，以水平式的組織模式，引導了上百萬民眾上街頭，迫使政府讓步，取消公共運輸漲價的決策。城市造反孕育了社會的革命。

■ 反叛：Insurgency

「造反」或「反叛」一詞雖然聽來聳動，但在學術與運動的論述上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用來描述「反霸權」(counterhegemonic)的各式行為。人類學家James Holston(1998)用「反叛的公民權」(Insurgent Citizenship)來顛覆傳統以國家為界定之公民權的定義，以反映日益多元的族群與居住形式。從「反叛的公民權」到「反叛的城市主義」，Holston(1998)認為都市規劃需要對社會面進行再思考，以回應當代社會生活經驗的多樣性，跳脫正式的、簡化的行政體制。研究「全球南方」的都市規劃學者Faranak Miraftab(2009)進一步形容「反叛式的規劃」為一整套邊緣族群所從事的反霸權實踐，它們可被視為是對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形式化與鳥籠式公民參與的反

證。Miraftab (2009: 33) 將這些體制內的公民參與，稱為「新自由主義式的包容」(neoliberal inclusion)，意旨「利用公民的同意與感受上的包容來建構霸權」。

「反叛」的概念特別適合用來討論邊緣族群對正式系統的抵抗或反制。對Holston (1998: 47) 而言，反叛的形式同時存在於有組織的草根動員以及平日的實踐，它們均「以不同的方式來反諷、推翻與顛覆政府的議程」。規劃學者Nihal Perera (2009) 進一步釐清反叛的行為與正式系統或體制的關係，他指出反叛的行動並非是獨立存在，而是經常與正式的系统糾纏在一起，使得在空間上做切割變成是幾乎不可能的事，他強調：「這些弱勢者在正式社會的邊緣與縫隙中所營造的空間，並無法完全取代霸權的空間敘事，但它們的存在使這些敘事被在地化與脈絡化」(Perera 2009: 52)。

■ 反叛的公共空間

二〇一〇年出版的《反叛的公共空間》(*Insurgent Public Space*) (Hou 2010) 一書(也就是本書的前身)，其寫作過程見證了近年來世界各地城市造反活動的發展(Rebar的創始人之一Blaine Merker也是該書的作者)，而出版之後更目睹了二〇一一年爆發的全球社運與革命浪潮。《反叛的公共空間》一書是一項集體的創作，由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者與研究者合著，彙集出自不同文化與環境背景的案例，它所聚焦的是人民用自力所營造的公共空間，有別於體制內所生產的制式環境，這些反叛或人民自力營造的公共空間代表的是不同的社會關係、價值與認同。透過自力的營造使都市的邊緣族群，在管制重重的城市地景裡，得以有一席之地。



雖然原書在英美出版，但其實創作的原點是二〇〇七年在中國泉州舉辦的第六屆環太平洋社區設計網絡會議上，一場名為「公共空間變奏曲」的討論。當時共有六篇文章，分別探討中國、日本、臺灣、與美國等地的另類公共空間案例。泉州會議之後，同年夏天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OURS 於台北市的山仔后社區舉辦了一場國際設計工作營——DIY: Design in Yangmingsan，針對美軍宿舍的保存與再利用提出發想，工作營的活動延續了泉州會議上對城市公共空間的檢視。山仔后美軍宿

圖3
洛杉磯的拉丁族群在新的城市地景中植入他們的信仰與文化認同。
(侯志仁攝)

舍特殊的歷史背景、社區脈絡與土地權屬，顛覆了傳統對公共空間的定義，而參與工作營的師生在基地上未被許可的集體與即興的創作，也突破了習慣性的規劃與設計手法。

這一連串的活動與對焦成為《反叛的公共空間》一書出版的推手。返美之後，我開始招兵買馬，向一些專業同好邀稿，並在隔年我於中原景觀系擔任客座教授的期間，完成了此書的主要編輯工作，而中原景觀系透過「大樹教室」的參與式設計課程，把校園圍牆打掉，拉近學校與社區的案例，也是啟發該書的靈感來源之一。

■ 從反叛的公共空間到城市造反

《城市造反》基本上即是《反叛的公共空間》一書的精選版，我們挑選了原書裡十篇文章，涵蓋了亞洲、美洲與歐洲等地的經驗，另外再加上一篇香港的案例，希望能引起台灣讀者的共鳴。

從北京的高架橋下到洛杉磯的街角，在本書中我們看到城鄉移民與社區民眾，將平淡的都市剩餘空間轉化為生動的生活與休閒場所。在這裡，空間的活力來自群眾，他們用肢體、舞蹈、樂聲，來轉變生硬的環境，開展新的社會關係與認同。在北京，移工與居民在都市的水泥叢林中得到喘息，即使是短暫與片段的；在洛杉磯，拉丁裔族群找到他們熟悉的生活語彙，建立新的家園與事業（圖3）。

空手營造新的城市空間與生活環境，不是小市民的專利，專業者與創作者其實也可以參一腳，甚至能動員更多的人來參與，發展另類的城市營造模式與論述。在舊金山，Rebar用一連串的城市實驗，包括Park (ing) Day，來推展所謂的「城市

寬厚戰術」，將城市空間從制度與慣念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在柏林，eXperimentcity則是另一項實驗，將市區的空屋與空地變成城市永續的實踐空間，培育新的產業、文化與社會關係。

即使作為全球城市典範的東京，也有不少草根的創意與實驗。在神田區，首都大學東京的師生與社區合作，提出了活化老舊社區的構想，並動手做實驗，他們將巷道變成戶外電影院，樓梯變藝廊，屋頂與街角變成聚會、聊天的空間，在他們的手下，老空間有了新的生命，鄰里與陌生的民眾間也產生新的關係。在東京都另一角的世田谷，社造工作者也嘗試將私人的住宅轉化為社區共用的空間，拉近了鄰里間的關係，也挑戰了公共與私人空間的疆界，建立新的、積極的公民意識。

在美國西岸的西雅圖，亞裔社區的青少年用夜市活動，顛覆了公園空間的使用，使得城市地景真正反映新的多元文化。在洛杉磯的南中央農園以及西雅圖的瑪拉農場，少數族裔在都市叢林中營造了一片屬於他們的園地，透過農耕，他們不僅補貼家用，也傳承著有長遠歷史的農耕文化，並營造社區與認同。在這兩個案例中，民眾用自己的力量與創意，翻轉了城市公共空間往往僅被用來作為休閒的消極角色，透過夜市與農耕，他們賦予城市公共空間新的意義與角色。

公共空間不僅可以有社區營造的角色，它更可以是社會運動的溫床。在香港，社運人士從對公共建築與廣場的關心，延伸到更廣義的公益與公義，包括弱勢族群的權益，將運動的場景從市區拉到新界的農村，為受高鐵興建衝擊的社區爭取權益。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與溫哥華，公共空間本身就是當地組織所關心的議題，透過對公共空間開放性的關注以及對私有化的反對，當地團體集結更多市民的參與，對當地政府形成有效的

監督。

最後，本書以《反叛的公共空間》原序作為總結，以公共空間為切入點，來探討城市的社會關係、政治過程、文化認同與價值的符碼，如何透過空間來強化與運作。城市的造反，也就是對這一系列關係與結構的反制與反思。

這本書的用意在於讓我們深入認識世界各地的城市造反行動，看當地的民眾與專業者，面對僵化的都市建設所從事的抵抗、反制與自力救濟。在造反的同時，這些案例也指引了一個「反造城市」的方向，城市造反不只是為反對而反對，更重要的是重新營造一個更多元、開放的城市。我們將在下冊以臺灣本地的案例進行更完整的詮釋與提論，請拭目以待。

■ 謝誌

本書的完成首先得感謝「左岸文化」黃秀如總編與林巧玲主編的支持與協助，此外也特別感謝吳比娜（原書的作者之一）著手進行最初的翻譯工作，讓本書的編寫踏出第一步，之後更感謝綠點讀書會成員——鄧佑生、顏寧、賴彥如與施佩吟的熱情參與，讓繁重的翻譯工作得以延續，以及吳瑟加在校閱與翻譯上的協助。在本書的籌備過程中，台大城鄉所的張聖琳教授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同時，也感謝張鐵志與吳瑪俐抽空給予評論與指正。最後也感謝Routledge出版社的Alex Hollingworth與 Louise Fox兩位主編在原書的編輯過程中，給予重要的協助與信任，讓「反叛的公共空間」一詞透過出版成為重新思考公共領域營造的語彙。此外，Candy Bird的原作與黃暉鵬的設計為這兩本書（本書與另一本姊妹書《反造城市》）的主題與精神做了最有力又貼切的詮釋。

參考書目

- Bishop, L. and Williams, L.(2012), *The Temporary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ayden, F. and Temel, R. eds. (2006), *Temporary Urban Spaces: Concepts for the Use of City Spaces*. Basel, Boston, Berlin: Birkhäuser.
- Holston, J. (1998), Spaces of Insurgent Citizenship. In Sandercock, Leonie, (ed.)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A Multicultural Planning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u, J. ed. (2010), *Insurgent Public Space: Guerrilla Urbanism and the Remaking of Contemporary C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iraftab, F. (2009), Insurgent Planning: Situating Radical Planning in the Global South. *Planning Theory*, 8(1): 32-50.
- Perera, N. (2009), People's Spaces: Familiarization, Subject Formation and Emergent Spaces in Colombo. *Planning Theory*, 8(1): 51-75.

1

在北京街頭跳舞

城市系統裡的即興演出

DANCING IN THE STREETS OF BEIJING

IMPROVISED USES WITHIN
THE URBAN SYSTEMS

CAROLINE CHEN 陳樂倫 —— 文

吳比娜 —— 譯

在一條高速公路路橋下，車水馬龍的北京市中心有一塊水泥孤島，四十位六十到七十歲的女性，身穿著對襟開的絲綢上衣，寬鬆的綢緞褲，緩慢的揮動著手裡綠色的手帕，把蓬鬆的豔粉色、白綠相間的羽扇高舉過頭（圖 1.1）。她們隨著波浪隊形的轉圈，分成兩列，然後又合而為一，她們各自站立，沒有舞伴，隨著五個敲鑼打鼓吹號男樂師的拍子移動。在這個城市臨時的舞台，這些樂師們穿深色大衣、戴毛線帽，圍著厚圍巾，陰沉的站在一旁，時而看向舞者，時而對彼此示意節拍，用音樂圍起了一方天地。

這是早上七點，中國北方的深冬，路橋下的水泥空地，在此刻屬於這些跳著「秧歌」的舞者，她們無視於來來往往的巴士，按著喇叭的計程車，和掃街清道夫的存在。一直到九點，

這些舞者會突然停止跳舞，閃身離開，消失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有些人甚至不會停下來說再見。除了在休息時間，地板上留下的幾個瓜子殼，這塊水泥地上沒有留下任何她們聚集的蹤跡。來往車輛的噪音，隨著尖峰時間來臨越來越大，把這個舞台重新變回它原來的樣子——城市裡不起眼的所在。這樣的演出，每天早晚都會發生。

北京市的地景是變動不息的，在這個有著一千五百萬官方人口，外國社群蓬勃成長的城市，北京見證著如紐約、倫敦的都市願景，在一座古老城市的軀體上一夕誕生，狹小的胡同巷弄消失，大型的都會公園興起，活躍的北京市民開始為他們的活動尋找新場所，隨著城市密度越來越高，開放空間逐漸減少，他們照舊跳秧歌，下象棋，也衍生了許多新活動，像是溜冰、慢跑，跳老人迪斯可，只是現在他們得在城市裡的零碎空間做這些活動，例如大馬路的分隔道、高速公路交流道中間的水泥地、公園圍牆外，體育場、學校，當然還有一般的公園裡。北京市民為了要適應新的城市變化，發展出像是 Michel de Certeau (1984) 所說的「戰術」(tactics)，他們使用新空間去從事舊習，有意也或許無意的發展出一系列混合性的空間使用，這種概念上的創新，國際設計師往往視而不見，而中國規劃師更直覺的感到頭痛。

許多北京老百姓看著他們日常生活的地景在一夕間改變，但他們可不願意默默離去。就像那些跳秧歌的舞者，老人們捍衛著他們僅存的空間，他們眼見以往的練舞場所成了馬路、需要入場券的森林公園。捷運站、商業區、歌劇院，或是公寓大廈則住滿新搬來的人，但這些新住民常抱怨他們的音樂舞蹈聲過吵，心裡希望自己是與北京綠化口號中，那種安靜的草地、

樹木為鄰。

「鬆動」

任何對北京市民如何在城市過活感到好奇的人，都會注意到Karen A. Franck所說的「鬆空間」：居民把原本精心設計的公園、廣場和停車場，不按牌理出牌的使用，鬆脫原有的功能，賦予新的用途（Franck and Stevens, 2007）。在北京，有不計其數的人把高速公路下的空地、非商業時間的停車場、夜間的建築工地、人行道挪作己用，為數之多，令人側目。這麼多豐富的活動，究竟代表著市民的活力和創意，或者是，在對現有的都市設計提出反思？

Leanne G. Rivlin把「尋獲型」(found)空間和「設計型」(designed)空間的屬性作出區別：

尋獲型的空間多半是城市裡小孩和老人使用的戶外空間……，（他們）是自發性的形成，使用者多半自己發現這個地方，拿來做設計目的以外的用途……，它們是城市公共生活裡的替代空間，因為使用者自行帶來了各式各樣的需求……，這些活動看起來和一般休閒空間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卻有不同的初始點與意義，它們的環境特性也不一樣。」（Rivlin 2007: 39）

所謂城市的鬆動，表現的是使用者的慾望——像是那些老人的慾望，通常被設計者和規劃師所忽略。在鬆動的空間裡，人們得以表達他們對太極拳、秧歌這種日常空間的需求，也讓原本沒有機會介入城市規劃程序的人，挪用這些開放性的空間。



圖 1.1

「大秧歌」舞者已經在明光橋下跳了十二年，這是一個在北京三道環內的剩餘空間。

(Caroline Chen 攝)

這個「尋獲型」空間和「設計型」空間只是為了討論的簡易分法，它可以再複雜一點，如同Rivlin所說的，這關乎最初的動機和意圖。即使是「設計型」的空間，在北京的公園廣場，和在歐美的公園廣場，有所不同。在歐美，公園、廣場的起源，是為來到城市工作的鄉村人口提供一個可以社交和放鬆身心的場所，而許多北京大型的公園，則來自另外一個的體系，它們是由前王公貴族的宮廷花園、祭殿，改建為城市規劃中的公園。

這麼看來，北京很多大型的綠地公園也是「尋獲」的，他們原本為皇宮貴族使用，現在則由政府轉為「公共」。我把「公共」兩個字加上引號，因為嚴格來說，許多這類的公園曾經不是免費供大眾使用的，它們需要門票，即使學生和老人可以買整年度的打折年票，居民還是寧可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尋找自己可以免費進去的地方。相反的，觀光客，則不受門票影響，遊覽車一輛接一輛來到這些景點。想要迴避這些觀光客的當地人，只好早上去公園，或是選擇「鬆動」城市裡的其他地方，爭取他們自己的底層空間，遠離觀光客，也不受開關門時間的影響。

■ 土地上的日常生活

為了要了解北京老百姓的所欲所求，以及他們自己對「公共空間」的定義，我們將視線從高高在上的天際線，轉向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¹。從二〇〇四到二〇〇七年之間，我們研究了

1 Hanchao Lu (2004: 21) 力倡：「在用任何理論的框架來描述中國歷史的屬性前，我們需要有一個更細微老百姓日常生活圖像」。

好幾個北京市居民戶外活動的場所²，在這篇文章裡，我們主要討論來自四個地點的發現：（一）頤和園，一個在北京城郊西北角的大型公園；（二）北海，一個小型位於市中心的公園；（三）德勝門，一個被高速公路環抱的大型綜合廣場與圓環；（四）明光橋，一個在城市西側，高速公路路橋下的水泥鋪面。儘管「大型公園」、「廣場」與「都會公園」，是設計者所熟悉的類型，但是那種交流道圓環公園，和陸橋下的空間，則較不為人所知。

► 地點一：頤和園（新夏宮）——
一個在北京郊區的大型公園

在北京外圍的頤和園，占地超過七百畝，是前王公貴族休閒遊憩的所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個公園被打開，對大眾開放，現在成為著名的旅遊勝地，也是世界遺產景點。面積比紐約的中央公園略小，頤和園以那靜止、有倒影，占地五四〇畝人工的昆明湖著稱，小巧的亭台樓閣依湖

2 作者希望對以下北大的助理致謝：Xiang Yunke, Han Yanfei, Zhang Yuping, Zhu Min, Liu Haofei, Minyu Fang, Deng Tingting, Xu Jingsi, Hou Anyang, Xu Liyan, Peng Siyuan，感謝他們的努力與洞察力。另外也感謝 Xu Zhiyi, Shen Fanbu, Zhao Zhigang 即 Hu Jiawen 在 2004-06 以及 2007 年夏所提供的協助。特別感謝 Dihua Li 與 Kongjian Yu 以及 Carl Steinitz and Peter K. Bol 的引介。作者也感謝美國 Fulbright 基金會、女性地理學者學會與 the Beatrix Farrand 基金的贊助，還有 Laurie Olin, Ron Henderson, Betsy Damon, Randy Hester, Louise Mazingo, Galen Cranz, Karen A. Franck, John Radke, Mirka Benes, Jurgen Steyer, Dan Abramson, David Nasatir, Freda Murck, Masami Kobayashi, Jeff Hou 以及我的父母的支持。最後還有我的指導教授 Michael Southworth 的信任與支持，並跟我分享音樂家的智慧與橡樹的秘密。David Nasatir 在線上和柏克萊的咖啡廳裡給予我的鼓勵，同時也堅持一定要有四百份以上的採訪樣本。

而建，為了欣賞湖光山色而立。人行步道曲折而上，來到可以眺望整個公園的山丘。人工島、小橋、有覆頂的迴廊，妝點了大自然的美景。這個公園需要門票，並在晚上關閉。

許多當地人說他們偏好在早上使用公園，因為喧鬧的觀光團體在中午過後就會湧入，持續一整個下午。公園裡的人，包括了一群比較安靜的居民，他們在靠近昆明湖的樹蔭下舞劍、打太極。這些頤和園裡的小團體大概都是十人以下，比我們待會兒要看到市中心地點的團體要小得多。受訪的居民大多都住在公園的兩公里範圍以內，步行而來，只有一位女士，她每星期有三次，會搭超過一個小時的公車來到這個公園。她告訴我們，這樣遺世獨立、安靜、深邃的湖景，讓她不虛此行，這是在城市的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感受。

► 地點二：北海——一個在北京市中心的都會公園

這個占地一七〇畝、位在市中心的公園，前身是個御花園，裡頭有個面積九十六畝的湖，是皇宮園林系統裡的一個節點。如頤和園一般，北海也以湖水作為整體的視覺中心。湖旁，由亭台樓閣所圍繞，奇石、亭坊、小橋和湖中的小島，都成為熱門景點。北海比位在郊區的頤和園擁擠多了，在這裡，我們遇到的居民團體人數可以高達三十人，從跳現代舞到打太極，從事各式各樣的活動。我們訪問一些在公園裡練習的秧歌舞者。當一個舞者說，她對這個公園的設計感到滿意時，其他人馬上指出，可是這裡的空間不夠，不敷使用。「遊客太多，而且公園缺乏管制」，一名舞者一面抱怨著，一面指向經過的、川流不息，舞著鮮艷旗幟的觀光大軍。我們問她們有哪些地方沒有這麼多遊客，不用跟觀光客搶地盤，他們說像是社區公園，紫



竹公園。

在北海，我們也發現了所謂的「遛鳥者」，老人提著他們飼養的鳥，帶牠們來遛一遛、「透透氣」³。這些男人把鳥裝在用藍布罩蓋起來的籠子裡，走路或是騎自行車來到公園，找一處有低垂枝桠的樹，把布罩拿掉把籠子掛在上面。然後，在草地上獨自或三五成群的，或蹲或坐，聽鳥唱歌⁴。像是那些舞者一樣，這些遛鳥者也抱怨公園的人數太多，希望公園能加強管

3 我未曾見過女性的「遛鳥者」。

4 我們在德勝門與頤和園也發現有遛鳥者，Galen Cranz 分別於一九七七年在香港、二〇〇七年在南京看過。

圖 1.2

樂師在德勝門下為大秧歌暖身。

(Yunke Xiang 攝)

制，減少公園的擁擠程度。當問他們還有哪些其他地方可去，他們提到香山公園，一個位在山坡上，北京近郊的公園，靠近頤和園。這些遛鳥者提到聽鳥唱歌所帶給他們的喜悅。這些人似乎喜歡不受注意，靜靜的蹲在草地上，從旁觀察公園裡的其他人。當我們趨上前去，對他們提出問題時，他們像是被我們的出現所打擾，有些甚至不想和我們說話。

► 地點三：德勝門——一個混合式的圓環廣場

德勝門有一個巨大堡壘式的高牆，佇立在一個被公車停車場、廣場和公園三等分的空間。這個多功能的空間，坐落在八達嶺公路和二環道的交叉口，之前是北京城牆的一部分，一端是城門和塔樓，三面由多線道的高速公路所環繞。儘管在這個圓環廣場的北端，有一些裝飾性的草地、植栽、花園，整個廣場還是像被淹沒在川流不息的車陣裡。

白天，這個瞭望塔是個旅行團小型的參訪地點，在建築物背後是混亂的巴士停車場，及胸高的分隔島把停車場和廣場分隔開來。從遊覽車下車的遊客在此停留，到德勝門頂上眺望城市景色，拜訪錢幣展覽館，還有城牆裡的紀念品專賣店，然後離開。當地的北京市民在白天也會來到德勝門，他們從事完全不同的活動，像是北海那些年老的「遛鳥者」也來到這裡，穿著毛澤東時代深藍色軍裝，我們看著他們手提鳥籠，在高速公路上的卡車、公車、汽車間奔跑，來到這個大交流道中間，他們的目的地是：廣場北端一處有低垂枝桠的樹叢。在這裡，鳥的鳴聲清晰明亮，即使在車水馬龍中，仍不可思議的能被聽見。

靠近傍晚，隨著遊覽巴士紛紛回來停放在德勝門過夜，那些遛鳥者回家了。但在六、七點時，漸漸地，其他形形色色的

人開始出現，從推著娃娃車的母親到老人，從老北京市民，到剛從鄉下來的移工，從蹦蹦跳跳到坐輪椅的人，北京的各色人等聚集在廣場上，走路、騎自行車、坐公車，就像早上那些遛鳥人一樣，他們紛紛穿過多線道的大馬路，攜帶著顏色鮮艷的扇子、粉紅色的圍巾和手帕，汽車、卡車、公車司機對他們大聲的按喇叭。終於，第一個秧歌舞團的鼓手抵達了，架起了她的鼓，開始敲打，很快的，第二個團體的鼓手也來到，鄉下來的非法移工，混在人群裡，也穿過馬路跑來加入，觀眾已經到場，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及胸高的牆上以便看得更清楚，他們把上衣拉到胸口，雙手環抱膝蓋，等待夜晚免費餘興節目開始（圖 1.2）。

德勝門的音場環境特別適合秧歌，一個舞者解釋道，指著德勝門高高的瞭望塔，指出這個巨大的結構如何將大鼓隆隆的聲音與節拍，反射到舞者身上，這讓他們特別高興。原本廣場上只有一個舞團，但人數太多，後來一分为二，每個團有五十個成員。當兩個團體同時在打鼓和跳舞時，打擊樂的震動不僅聽得到，連身體都感覺得到，早上還那麼明顯的車輛喧囂聲，現在已經被震耳欲聾的鑼鼓聲蓋過：這是秧歌舞者專屬的音樂。

► 地點四：明光橋——公路橋下的水泥鋪面

有如德勝門，明光橋下的空間也為喜歡熱鬧的秧歌舞者提供理想的音響環境，大大的水泥柱撐起了高架快速道路的底盤，為樂師和舞者提供了一處寬敞、平坦的避蔭。緊鄰著這塊水泥地，是一個沿著前北京城牆所建的線形公園，雖然有很多人在那裡舞劍和打太極，秧歌舞者指出，他們團體人數太多，根本不可能在那裡練習，那個公園的空間不是被占滿了，就是



圖 1.3
跳秧歌理想的場地設計：
寬敞、有鋪面、開放空間，
有樹蔭遮蔽。Tang Kem-
ing 在領導新秧歌舞者為
二〇〇八年的北京奧運演
出練習。
(Caroline Chen 攝)

不夠大。

從早上七點到九點，退休的北京女性來這裡一起跳秧歌。當他們結束之後，這個空間慢慢被流動理髮師、下象棋者與退休人士所占據，他們整個下午在這裡徘徊。到了晚上，七點到十點，成雙成對的年輕情侶、中年夫妻，來到水泥柱的北側跳起探戈，而年輕一輩的少男少女，則在水泥柱的南端，跟著中國流行音樂的節奏跳舞。清晨三點，一對中年男女騎著腳踏車來到無人的空地，他們的自行車後面，綁著一個移動式的爐

具，和一口大鋼鍋，當這輛腳踏車停下來，就變成深夜的餃子攤，為停在這裡的晚班計程車司機服務，這些司機們拿出自己帶的小矮凳，蹲坐著享用碗裡熱騰騰的餃子。這一切，都在明光橋的保護下。

丨 移工的城市入口

秧歌的鑼鼓聲和鮮艷的羽扇，總吸引了一大群觀眾。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找到秧歌要在都市發生的四種要素：領頭人、音樂、一個適合跳舞的空間與觀眾。這裡，我們將簡單的討論一下這些觀眾是誰。

在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開始的前幾年，大量來自鄉村的非法移工湧入北京。人類學者Li Zhang(2001)指出，北京市需要勞工去建造奧運的運動設施，但勞工們卻常常被排除於城市日常生活之外。計程車司機通常很瞧不起移工，拒絕搭載他們，怕他們會弄髒了車座；餐館老闆常拒絕他們上門。我們所訪問的北京市民，也對他們充滿疑懼。秧歌似乎暫時性的讓這些移工參與在城市活動，即使我們沒有看到很多移工直接跳舞，他們通常在旁邊看，秧歌是免費在戶外就可以欣賞的表演。儘管至少有一個以上的舞者，說她不喜歡「在跳舞時被奇怪的人盯著看」，但是也有不同的情況，像是德勝門的秧歌隊，就讓移工參加，她們日曬光裸的臂膀，可以在隊伍中被一眼辨認出。在所有不需要門票的場地，觀眾群裡都可以看到移工。

Stavros Stavrides曾描述，行走和觀看能創造出所謂的「門檻」空間，創造新的關係，而不複製原有區隔的秩序和階級結構，

「門檻」是製造改變機會的記號，它是創造或代表通往未來的可能通道。藉由對「門檻」的認知，浪遊者（flâneur），和作為浪遊者的居民，可以理解城市是由許多不連續體所組成，是一連串交叉口所湊成的網路。這些門檻所構成之無法預期的連結之中，「差異」出現了，但它不只是威脅，也是一種希望。（Stavrides, 2007: 177）

由此來看，秧歌舞為城市新來的移工創造了一個「門檻」，他們在白天為奧運建設而工作，晚上則成為秧歌的觀眾，混入成為城市的一部分，欣賞北京的秧歌奇景。當他們回到家鄉的村莊時，他們將訴說什麼樣的城市傳奇？北京城裡的人晚上在馬路上跳舞的畫面，可能是他們流傳給子孫回憶裡重要的篇章。

■ 秧歌有什麼特別？

秧歌是一種發源於中國北方農村的舞蹈，傳統上在特殊農曆節慶時才有表演（Holm 1991）。在毛澤東的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把這個傳統的舞蹈變成政治宣傳的工具（Holm, 1991; Hung 2005），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男女老少都熱衷於跳秧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秧歌和其它的表演藝術遭到禁止。直到一九八〇年，鄧小平放寬了對人民生活和休息時間的規範，秧歌才重新在老一輩的中國人之間興起。他們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現在他們有了空閒時間，想要找一種活動保持健康（Chen 2003, Faquhar and Zhang 2005, Gerdes 2008, Graezer 2004），這個舞蹈不但讓他們回憶起自己年少自由的時光，也讓他們用熟悉的舞步，輕鬆的來做有氧運動。此外，秧歌也是反映著北方中國自信和驕傲的舞步，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的初期，毛澤東以此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在二〇〇六年，中國也將這個舞蹈指定為國家無形文化資產（ChinaNews.cn 2006）。

然而在未來，秧歌舞者在現代化的北京城中，要找到他們在文化和空間上的立足之地，恐怕不太容易。我們訪問到的許多年輕人，對學秧歌沒興趣，認為這種舞「是給老年人跳的」⁵。城市裡新設計的空間，通常大小都不足以容納一般秧歌隊伍的團體。舞者和中國政府都曾企圖讓秧歌可以在城市裡發展，在城市的底層，舞者們努力尋找「鬆動」的空間；在另一個層次，中國政府曾推動一種叫做「第三套秧歌」的新舞蹈，有更繁複的動作，和用預錄好的音樂，取代了原本伴奏的鑼鼓。老秧歌（我稱之為「大」秧歌）和政府所推動的第三套（我稱之為新秧歌），形式不同，它們面對城市環境的限制與挑戰也不太一樣。

■ 秧歌的空間類型

我們在二〇〇四到二〇〇六年間所訪問的都是跳「大秧歌」的舞者⁶，新秧歌舞者的經驗（在二〇〇七年訪問到的），我們會在別處討論。一九九〇年代末，當秧歌開始在城市普遍時，Florence Graezer 寫道，這種本來在鄉村，農民歡慶收成的舞蹈，一旦來到城市後，成為一種截然不同的舞蹈（Graezer 2004）。在鄉下，這種舞蹈是一種豐富的慶祝活動，跟村莊的自尊和驕傲息息相關，但是在都市，這種舞只是一種例行運

5 不過，近年來中國的初中也開始教學生跳秧歌與其他舞蹈，主要為了因應中國所面臨的一項新的問題：兒童過胖。但這對秧歌未來的發展會有何影響，還有待觀察。

6 我在二〇〇七年後的研究開始包含北京的新秧歌，觀察大秧歌與新秧歌之間在空間上的競爭。

動，就像是美國人上健身房一樣，舞者是為了健康理由參加，或是為了找個藉口，離開家去見見朋友。雖然有些舞者的確在少年時代跳過秧歌，對這種舞有些鄉愁，但多數的人只是因為看到別人在街上跳舞，看起來自得其樂，所以一起加入。

跳舞的人對空間是有些要求的：跳大秧歌的理想場所是：(一)平坦有鋪面的地板；(二)要有照明，所以夜間還可以跳舞；(三)要有遮蔭，才不會被太陽晒黑了；(四)一個大到可以容納三十到六十人的場所；以及(五)跟住宅區和商業區要有些距離，確保跳舞的鼓聲不會吵到痛恨吵鬧音樂的鄰居(圖1.3)。

新秧歌是被政府刻意創造出來的簡化舞步(China Daily.com.cn 2004)，但我們在路上和公園所訪問的舞者，都認為新舞步其實更複雜。雖然許多人承認它比較符合國際水準，一名舞者說：「新秧歌的舞蹈姿勢比較正式，它適合展現給外國人看舞者的精神，比較生動、年輕，也比較有朝氣」。另外一個舞者告訴我們這種舞比較難，需要準確的肢體動作，「新秧歌很美也很高雅，當你跳的時候，你可以在心中感受到它的美，它是一種全身性的運動，適合在舞台上演出，也適合在公園裡跳」。新秧歌所需要的空間跟大秧歌差不多，但不一樣的是，它沒有前面所說那種大聲吵鬧的現場音樂，新秧歌用旋律比較優美的預錄製音樂⁷。

■ 噪音問題

大秧歌的舞者常有困難找到 Michael Southworth 所說的「城市裡的音場」(Southworth 1969)，舞者們常被迫放棄他們

7 不過，雖然新秧歌較能因應高密度的都市環境對音量控制的要求，它卻有大秧歌所沒有的困擾：找不到播放錄音機的電源插座。



的舞蹈空間，因為臨近高樓大廈裡的居民或是上班族，抱怨他們的伴奏太吵。這產生了兩種情況：（一）遷徙：舞者們自願離開，去尋找新空間，不管是因為他們的團體規模太大，現有空間容納不下，或者發現一個更好的新空間；（二）被驅逐：舞者因為外在因素被逐出，原因包括原有的空地要蓋建築物，在都市綠化下要種花種草，或是居民對噪音的抱怨。

鄰居的抱怨是秧歌舞者被驅逐的主要原因，而世代間的差異似乎是導火線。我們發現到許多中年有小孩的居民，常常抱怨這些退休的大秧歌舞者的存在，因為他們吸引了熱情的圍觀

圖 1.4

在明光橋下打鼓、敲鈸、吹喇叭的樂師，蓋過了交通的音量。

（Caroline Chen 攝）

民眾，過往的行人還有移工都會紛紛停下來看他們跳舞，父母親抱怨，這些吵鬧的秧歌伴奏，會干擾他們孩子要準備大學考試的專注（圖 1.4）。有時，這些衝突是透過妥協來解決，某個秧歌團體保證在大學入試的前幾週不跳舞。但是，有些團體遇到的衝突不那麼容易解決，某位舞者說他們這樣對付挑戰：

附近社區居民已經來抱怨噪音許多次了，他們甚至叫警察，當警察來時，我們就說：「如果你可以幫我們這些老人找到可以跳舞和運動的地方，我們就搬！」這些警察都不想惹上麻煩，只好離開。

我們想問為什麼這些人不去公園跳舞呢？根據北京的公園管理處規定，只要買票，沒有人可以被排除在北京的公園之外。但是，根據對大秧歌舞者的訪談，他們說他們被禁止買票，因為他們的音樂聲干擾了其他人，許多舞者對於他們自己的存在也感到不安，「病人和老人來公園是享受寧靜的，我們的音樂和舞蹈會吵到其他人，鼓聲對有心臟病的人也不好」。這些大秧歌舞者自我隔離，繼續在城市裡尋找他們可以「鬆動」的空間，在那裡，可以繼續製造噪音，但是不會干擾到其他人。

■ 空間難題

音量的問題不只是大秧歌舞者所面對的唯一挑戰，不管是大秧歌或新秧歌，舞者都需要寬敞、有鋪面的地板。現代公園裡有鋪面的空間通常對舞者來說太小了，而且在配置上對年老的舞者不友善，為了散步而設的公園，不能容納集體的舞蹈，蜿蜒的步道和沒有遮蔭的大草原，對三十個人以上的舞群，不

太夠用。還有，北京的公園在晚上關閉，而大秧歌的舞者喜歡在晚餐後跳舞，「幫助消化」，但他們指出晚上還開著的公園通常不大安全，舞者所指的不是怕有壞人，而是坑坑洞洞的鋪面有可能讓他們跌倒。然而，當別無其他選擇時，舞者還是會在公園裡跳舞。

大秧歌和新秧歌的舞者都需要在北京尋找更適合跳舞的空間，他們夢想一個靠近他們居住場所的空間，顯然，這將會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許多大秧歌的舞者是六、七十歲的退休女性，她們通常被賦予了照顧兒孫的責任，還有，幫他們已經成年在工作的孩子們掃地和煮飯，她們想要靠近家的「方便」場所，她們能夠不必花很大力氣出來跳跳舞，見她們的朋友。因此，她們理想中的舞蹈場所是要離家近，所以她們可以趕快回去做家務。問題是，如果這個地點要對她們很方便，它們通常會靠近有學童的住宅區，但噪音在那裡不被見容。

跳舞的權利

我們所訪談的舞者，常常提到「跳舞的權利」，跳舞應該是人人都可參加的活動，就像Susan Brownwell (1995) 研究上海女性迪斯科舞者的案例。一名北京秧歌舞者指出「身體健康和朋友是最重要的事」，跳舞是基本人權，屬於所有年齡的北京居民和訪客共有。許多舞者指出，新秧歌的難度通常排除了比較羸弱的人，許多大秧歌舞者說，他們記不得新秧歌裡比較難的新舞步，有些人說他們沒有力氣把手高舉過頭，這是新秧歌裡面的一種新動作。我們很驚訝的發現，許多舞者用大秧歌來治療他們的疾病，秧歌是他們自力救濟的方式，我們也學到，秧歌的樂師許多都是殘障的退休老人，玩音樂是他們僅有



圖 1.5

從橋下到舞台：北京的市民透過挪用都市的剩餘空間，爭取他們對城市的權利。
(Caroline Chen 攝)

參與公共生活的方式，透過在街上敲鑼打鼓，他們可以克服身體的限制，保持活躍。一個樂師就告訴我，他沒有多少活動可以參與：

這個活動對我很好，我有糖尿病，我的視力衰退，身體虛弱，我的體重從七八·五公斤降到五十四公斤，二〇〇三年，我跌倒，摔斷了我的腳，結果，我沒有辦法再參加其他的活動，除了這個——吹噴呐。

我們發現沒有換跳「新秧歌」的舞者，不是只包括那些喜歡吵鬧現場音樂的人，還包括了那些記憶有問題的、身體障礙者，換句話說，這些大秧歌舞者也是比較脆弱的一群，他們卻必須離開他們的家，到最遠的地方去尋找跳舞場地，他們不能去鄰里公園，也不能在家裡近處跳舞，因為怕吵到鄰居。

形式跟隨文化⁸

這是一項進行中的實驗，轉變中的北京城市地景，提供了居民可以即興創造與改變的空間，讓他們從事他們不願放棄的活動（圖 1.5）。百折不撓、充滿適應力，秧歌在充滿限制的都市環境中，仍生生不息。但是不言而喻的，老百姓在馬路上跳舞，顯示了現代城市是怎麼樣被想像和建構，還有這個城市是怎麼實際被運作的。北京居民自發性的修改了這個城市，來符合他們日常生活的節奏，創造一個適合老人、年輕人、運動者和殘障者的城市。城市要合用，城市的紋理勢必要有可調整的柔軟度，這些現實中的「鬆」空間，顯示了北京居民自行創造的隱性城市，他們在面對巨大社會和都市變革時，不自覺的找

8 這句話來自於作者與 Timothy Duane 在柏克萊的對談。

到延續生活的方式。也許在隱微之中，即興的舞者在表達一個細膩而隱藏的訊息給都市設計者：這是我們舞者所喜歡的空間，即使我們現在所掌握的空間還不是很理想！讓我們希望，在中國工作的規劃者和設計師，能學習到這種自發性創造的重要，它們正在從底層，一點一滴的改變城市。

參考書目

- Brownell, S. (1995)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n, N.N. (2003) *Breathing Spaces: Qigong, Psychiatry, and Healing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ina Daily.com.cn (2004) *It's Time to Bring Out the Dancing Shoes*.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4-08/03/>

- content_357306.htm (15 March 2007)
- Chinanews.cn (2006) Yangge *Dance Chosen as Intangible Heritage*.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ipr.gov.cn/ipr/en/info/Article.jsp?a_no=10428&col_no=99&dir=200608 (2 May 2007)
-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ranz, G. (1982) *The Politics of Park Design: A History of Urban Parks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_____ (1979) 'The Useful and the Beautiful: Urban Parks in China', *Landscape* 23, 2: 3-10.
- Davis, D.S. et al. (1995)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ng, M.Y. (2003)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rquhar, J., and Zhang, Q.C. (2005) 'Biopolitical Beijing: Pleasure, Sovereignty, and Self-Cultivation in China's Capit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 3: 303-27.
- Franck, K.A. and Stevens, Q. (ed.) (2006) *Loose Space: Possibility and Diversity in Urban Life*, London: Routledge.
- Gehl, J. (1996) *Life between Buildings: Using Public Space*, Copenhagen: Arkitektens Forlag.
- Gerdes, E.V.P. (2008) 'Contemporary Yangge: The Moving History of a Chinese Folk Dance Form', *Asian Theatre Journal* 25, 1: 138-47.
- Graezer, F. (2004) 'Breathing New Life into Beijing Culture: New "Traditional" Public Spaces and the Chaoyang Neighborhood Yangge Associations', in Feuchtwang, S. (ed.) *Making Place: State Projects, Globalisation and Local Responses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Cavendish.
- Holm, D. (1991)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ung, C.T. (2005) 'The Dance of Revolution: Yangge in Beijing in the Early 1950s', *China Quarterly*, 181: 82-99.
- Mitchell, D. (2003)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Rivlin, L.G. (2006) 'Found Spaces: Freedom of Choice in Public Life', in Franck, K.A. and Stevens, Q. (eds.) *Loose Space*, London: Routledge.
- Southworth, M. (1969) 'Sonic Environment of Citi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 49-70.
- Stavrides, S. (2006) 'Heterotopias and the Experience of Porous Urban Space', in Franck, K.A. and Stevens, Q. (eds.) *Loose Space: Possibility and Diversity in Urban Life*, London: Routledge.

2

洛杉磯的拉丁城市學

城市再造的新典範

LATINO URBANISM IN LOS ANGELES

A MODEL FOR URBAN IMPROVISATION
AND REINVENTION

JAMES ROJAS 文

鄧佑生 譯

拉丁美洲的居住文化，正催化著洛杉磯城市面貌的轉變，為原本頹敗的市區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他們的文化與生活習慣¹，讓這個為汽車量身打造的城市，變得對行人更友善。像很多其他的移民族群一樣，拉丁裔移民來到洛杉磯時通常身無一物，唯有的是他們的軀體與勞力，他們散佈在城市的細縫中生活，定居在那些經濟落後，缺乏公園綠地或妥善規劃的住宅區裡。然而，他們不畏艱苦，努力修補這些被城市遺忘的空間，建造出屬於他們的生活天堂。例如將老舊的加油站改造成墨西哥餐廳，將雜草叢生的廢棄鐵道當成是休閒公園，大型的廢棄工廠被轉變為雜貨市場，把房子的前院當作是聚會的廣場。拉丁裔

¹ 本文的拉丁裔族群泛指有拉丁美洲血統的美國移民與後裔。

人把一個陌生的都市，透過他們的生活習慣與創意，改造成他們所熟悉的環境（Rojas 1991）。

■ 流動與相遇

先從交通運輸來講，成長中的洛杉磯拉丁裔人口，依照他們的日常生活文化，為當地創造了一種草根性的交通系統。為了省錢，大部份拉丁裔人習慣走路、騎腳踏車、或搭大眾交通工具。這些看似平淡的日常活動，卻是把群眾的關係連結起來的關鍵，同時讓他們生活更為機動而隨性。在洛杉磯，很少看得到標誌系統或是明確地標，告訴你拉丁裔區的確切位置。但當你無意間闖入有人群在戶外聚集的地方時，你知道這就是拉丁裔人的地盤。在一般洛城的社區中，很難在戶外街道上看到人的蹤跡，但對拉丁裔人而言，街道卻是社區紋理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但讓社交活動更為自然與便利，也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丁裔人變成了珍雅各（1961）所謂的「街道的眼睛」。不論是居民坐在前廊上休息，或是在路旁修車，他們的目光提供了一種安全感，讓在街道上走路變成一種更為合適與令人安心的交通方式。結合了交通與社區的需求，拉丁族裔創造了一種永續的交通系統。它不需要汽油，朋友或鄰居在路上不期而遇的期待感，就是啟動這種交通工具的燃料。

拉丁裔的家長每天早上都走路送小朋友們上學，跟路旁賣著 Champurado（一種由巧克力跟玉米做的，濃稠的墨西哥飲料）的小販打招呼。大家都走路來採購玉米餅皮或尿布等日常用品，沿路會經過許多小巧且色彩鮮艷的柑仔店。許多鄰近拉丁社區的超級市場，甚至提供免費的接泊巴士，以吸引更多顧客光臨，因為他們知道這比尋找失竊的超市手推車來得省錢多了。

圖 2.1
Cesar E. Chaves 紀念廣場
(Antonio Castillo 攝)



拉丁社區裡大量的步行人口，促成了各式各樣交通工具的使用，從腳踏車跟非法的私人小巴士，到公車與鐵路。在洛杉磯，每天都可以看到許多的拉丁裔男人，在繁忙的街道上，騎著鐵馬上下班，或牽著腳踏車搭乘公車。在市中心的百老匯街或其他道路上，常常可以看到成群的工人們，下工後等著俗稱 Pesetas（一披索）的非法交通車載他們回家。

在洛杉磯市裡，拉丁裔搭乘捷運、公車、與鐵路等大眾交通工具的比例是所有人口中最高的。這樣的使用量提供了捷運系統發展所需要的高需求量。以「紅線快捷巴士」為例，共有二十八條路線與一些特定巴士站，在洛杉磯城區中構成一個網狀的運輸系統，每天服務著許多上下班的人群。

絕大多數中產階級的洛杉磯人，可能都認不得自己居家附近的巴士站，但對拉丁裔人而言，巴士站卻是社區活動的主要



節點，附近盡是行人、乘客，還有數不完的路邊攤。不管是賣芒果的還是烤玉米的，他們都在巴士站附近擺攤，讓顧客可以便利的購物，還可以打發等車時的無聊時間。這種有趣的經驗在洛杉磯其他一般的市區完全無法體驗到。大部份的公車站都缺乏便利設施，有些甚至是設在空蕩蕩的加油站前面。

Cesar E. Chavez 紀念廣場是一個著名的大眾交通站，位於一個低收入社區附近，也是聖費南度市勞工階級引以為傲的社區活動中心。透過藝術創作和社區整合的計畫，這個廣場從一塊在鐵路跟主要道路間的小空地，轉變成一個受全國注目的

圖2.2

這家汽車修理店外的道具、圖案和壁畫創造了社區裡獨樹一幟的角落。

(James Rojas攝)

案例(圖2.1)。

這個紀念廣場是由一座噴泉、Cesar E. Chavez的銅製雕像、一百英尺的壁畫，和總面積有二千三百平方英尺的公園所構成。這些元素加總在一起，構成一個具有教育意義的空間，讓人們得以反思Chavez一生的貢獻。這個廣場是美國國內最大，最仔細規劃，紀念勞工階級領袖與人權運動者Cesar E. Chavez的廣場。這公園被視為一個社區與地方政府合作的良好典範，以社區利益為出發點，創造出的一處有意義的公共空間。

拉丁裔居民把原本單調的、為汽車打造的都市郊區，用合法或非法的DIY都市設計巧思，融入商業或住宅街道，使它轉變成活潑的「商業中心」。移動式的傢俱(道具)和彩繪，為拉丁裔社區的地景添加了一層服務居民活動的建築。這些添加的街道傢俱，一方面讓居民能在街道上坐著交談、玩耍；使居民們可以更具彈性、自由地運用他們的戶外環境。從塗鴉、商店招牌到壁畫，建築立面的彩繪讓拉丁裔居民以便宜的方式妝點自己的地盤，抒發自我。這些彩繪為都市注入一股視覺能量，房子因為華麗與鮮艷圖像而活了起來，許多房子甚至從頭到尾都被彩繪所蓋滿(圖2.2)。這些裝置、彩繪與壁畫，使一個為汽車規劃的巨型都市，有了行人的尺度。

丨 街道與創業精神

洛城的街道為拉丁裔人提供了創業的機會與空間，販售他們的商品或勞力，使他們得以在都市中存活下來。他們以在家門口賣衣服或出售勞力的方式，模糊了住宅與商業活動的界線。大多數的洛城人只會利用街道來開車，拉丁裔的攤販卻聰

明的把街道轉變成熱鬧的商業地帶，他們有策略的找尋十字路口，並巧妙把空地、人行道、或路緣改變成行人的臨時市場。路邊小販為都市帶來一種動感的節奏，不斷的改變著都市既有的外貌。當交通規劃師在設計洛杉磯著名的高速公路系統時，他們未料到有人會在交流道的出入口販售橘子，但是拉丁裔人這麼做了，為這種公共設施帶來一個新的使用可能。路邊攤被視為洛杉磯拉丁裔社區的重要文化，臨時性的特質把人與地方連結在一起，這些在住宅區路邊或商業大道上的攤販活動，讓都市景觀變得更為豐富而有趣。

Mariachi（墨西哥街頭音樂）廣場位於第一街跟波義耳街的交叉口，也是一處音樂、文化，與商業的交匯點。在這裡，一家不起眼的甜甜圈店，是墨西哥音樂演奏者尋找工作機會的非正式場所，他們常在這裡等待被邀請到地方派對或是社交場合表演。這家甜甜圈店，後來被墨西哥哈利斯科州捐贈的美麗石製涼亭所取代，成為波義耳社區的地標，每年傳統的墨西哥音樂節，都在這裡舉行。

在南洛城，大部份的廢棄工廠都被改造成社區的雜貨市場，提供修鞋子或印製聖誕卡片等各種千奇百怪的服務。老舊歪斜的金屬工廠，被色彩鮮艷生動的招牌與壁畫裝飾。工廠裡面的小攤販列隊排開，賣的東西從CD到農產品都有。生日宴會彩球、結婚禮服等種種商品，與廠房的老舊結構形成強烈對比。蔬果區擺設著來自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式色彩鮮艷的農產品。工廠外面的空間被轉變成戶外餐廳、兒童遊戲區與休憩廣場。廣場上的舞台穿插著樂團表演或教會彌撒。以「阿拉米達交易市集」(Alameda Swap Meet) 為例，它坐落在輕軌藍線捷運旁，是個橫跨數個街區的巨大商場(圖2.3)。另一處「Los



Amigos購物中心」，則被漆成薰衣草淡紫色，室內空間被安排的像是一座小村莊，裡面以墨西哥的著名街道和地名來命名。

在東洛城，許多廢棄的加油站，被改裝成墨西哥捲餅餐廳。店家只是在原有的加油站裡添加了一些桌椅，並在結構上做了一點點的修改。巨大的加油站招牌上原本寫著Shell（殼牌）或是Arco，現在則寫著「捲餅大王」或其他店名，原有的加油箱被排列整齊的桌椅所取代。在這裡吃飯或休憩的人們，跟街道建立了視覺上的連結，也成為街道活動的一部分。

圖 2.3
阿拉米達二手商品交換店。
(James Rojas 攝)

I 拉丁裔住家

現有拉丁裔社區的房子都是過去其他族裔的人蓋的，隨著生活習慣的轉變，這些房子最後都被拉丁裔文化給同化。每個小小的改變，都有其意義與目的，譬如把客廳沙發搬到半戶外的門廊、在原來的護牆板上塗上灰泥、用鮮艷的顏料粉刷牆面，或把瓜達盧佩聖母雕像立在戶外的前院，這些行為反應了生活的掙扎、勝利的喜悅、或是拉丁裔勞工階級的生活習慣。拉丁裔居民結合了兩種建築語彙，創造了一種具有拉丁血統與傳統美國文化的混血建築。

門廊是拉丁美洲住宅的重點，而在當今的美國文化，門廊的使用已逐漸失去其重要性。拉丁裔人的門廊，相對因為族群的日漸茁壯而更密集的被使用，重要性更為提升。居民在門廊休息，躲避夏日熱浪，或跟家人、朋友與鄰居閒話家常。車道跟前院，同時也是他們舉辦派對或工作的好所在。

及腰的圍籬在拉丁裔的住宅區裡隨處可見，這個圍籬界定了空間的內外，人們在圍籬上晾衣服、販賣商品、或隔著它跟鄰居閒談。圍籬在家庭空間與公共領域之間扮演一個好角色，它雖是界線，但也把人與人的關係連結起來，並重新定義了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屬性。圍籬營造了人們聚集的場所，把原有的空間界線給打破。相反的，一般美國郊區的中產階級鄰里，卻鮮少在前院聚集，這塊寬闊的土地在典型美國郊區被視為精神的圍籬，把私人的宅地與街道的公共空間完全隔離開來。

在洛城，沒有一個像拉丁裔社區這樣把前院使用的淋漓盡致。在典型的中產社區裡，前院是一個沒有人使用的地方，從來看不到居民的蹤影，甚至他們留下來的東西。但前院對拉丁

裔家庭來說，卻表現了他們生活細節的縮影。根據每個住戶不同的需求，前院被佈置的多彩多姿，有的是懷舊且精緻的拉丁美洲風格庭院，有的則是小孩玩耍的地方，或是大人的工作空間。美國的中產階級家庭總習慣把日常活動藏在後院裡，拉丁人卻在前院辦趴、工作、或與朋友家人閒話家常。他們喜歡在公共空間舉辦活動，這反應了他們的文化價值觀。拉丁裔風格，在美國郊區的前院得到良好的運用。

由於住宅短缺與房價昂貴，洛杉磯許多獨棟與複合住宅的使用密度，也隨著提高。數以千計的低收入家庭與他人分租著房子或公寓，甚至許多社區把車庫非法改建成居住空間。住宅的後院變成了小小的村落，大家非法的分享著居住設施，並建立了彼此的社交網絡。因為是違建，這些建築的改建並沒有遵照安全法規，因此許多的居住單元與車庫，其實是不安全的空間。除此之外，許多住在這類型住所的居民，每天都活在可能被鄰居舉發的恐懼之中。

典型郊區中產階級住宅和街道的關係，總是有明顯的界線，而拉丁裔人卻是把家庭大方的延伸到整個街道上。前院佈置的小巧思與圍籬的使用，讓每個家庭與街道開始對話。封閉的前院使行人來去匆匆的街道轉變為交談的廣場。典型的拉丁美洲與歐洲廣場，大多是由厚實的圍牆所界定出來的，與這裡的廣場雖然形式不同，卻有著相同的社交活動功能，居民可以在自家前院舒適又安全的加入街道上鄰人的對話。

公共和宗教生活

拉丁裔人的社交活動與慶典，為郊區鄰里帶來創新的公共空間使用方式。拉丁裔居民的社交活動非常豐富，從一般的生

日派對到 Quinceaneras ——一種慶祝女孩十五歲生日的成年禮，通常都在公園、前院、甚至車道上大肆舉辦。每逢週末，出租桌椅的商人便在拉丁裔社區裡，忙著服務這些大大小小的慶祝活動。

羅馬天主教是拉丁裔人主要的宗教信仰。他們對宗教的熱愛是顯而易見的，在市區中隨處可見到祭祀瓜達露佩聖母（墨西哥的庇護神）的空間。這些祭祀空間的大小及形狀各異，從門廊的小角落、花園裡的祭壇、牆面上的壁畫、或是公共停車場角落旁的神龕。在每年十二月十二日，代表聖誕季節開始的瓜達露佩聖母慶祝日，街道成了舉辦一系列慶典的主要場所。在這天，拉丁裔社區都會在他們的街上舉辦小小的慶典。小朋友們穿著傳統服飾，在爸媽與爺爺奶奶身旁以及攤販間穿梭。之後還有夜間遊行，鄰里都會來共襄盛舉。

製作 Nacimientos，即耶穌誕生景物的擺設（圖 2.4），是許多拉丁裔人的傳統。這些景物會從聖誕季節一直展示到隔年的一月六日，即三王降臨的「顯現節」。拉丁裔居民全家大小出動，他們花非常長的時間佈置前院、門廊、屋頂、還有室內空間。Nacimientos 的創作非常多元，大小、細緻度、創意，每家不盡相同。從簡單的聖母馬利亞、約瑟夫、耶穌的人物佈置，到精心製作的亮彩帶瀑布、閃爍的聖誕燈泡、數不清的細緻小裝飾品。每一個 Nacimientos 的創作，都反應了居民對聖誕節，以及居住環境的熱愛。

■ 休閒開放空間

在洛城，許多拉丁裔人均住在高密度且缺乏公園的鄰里裡。由於缺乏公共休閒設施，小孩與青少年們只好在街道上

圖 2.4
Nacimiento 耶穌誕生的
佈置。
(James Rojas 攝)



或廢棄的空地裡玩耍，並找尋其他的場所來運動。「長青墓園」(Evergreen Cemetery) 周圍的慢跑道(圖 2.5)即是一個創新的案例，展現拉丁裔居民如何把一個墓園周遭損壞的人行道，轉變成 PU 慢跑道。這項設施不但提升了居民的社交活動與社區形象，並同時提倡運動所帶來的好處與健康。半世紀來，數以千計的社區居民曾使用著這個原本破損的人行道，當作慢跑路線，因為這裡真的非常缺乏娛樂性的公共設施。

這條慢跑道的興建是由居民組織，透過市政府協助實現。每天都有成千人在這裡慢跑，變成了一座為社區居民服務的線形廣場。年紀較大的老人家喜歡一大早起來去散步，年輕的小伙子們則在傍晚時分出沒運動，晚上就輪到婆婆媽媽推著娃娃車上路，享受涼爽而寧靜的夜晚。當然也少不了洞察商機的小販們，策略性的選擇時間與地點在慢跑道旁擺攤。社區居民為這條跑道感到驕傲，它是一個多用途的開放空間，公共的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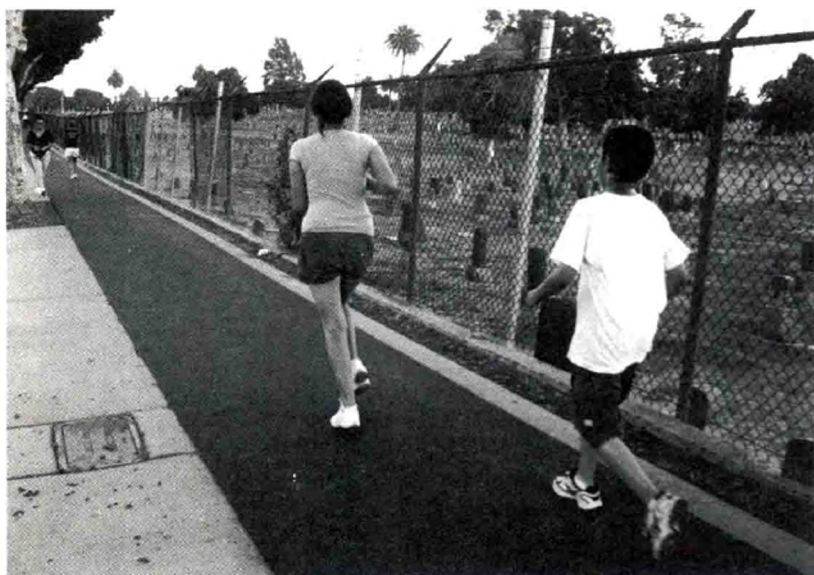
道，同時也是都市的綠色走廊。

缺乏開放空間及公園，已變成洛城拉丁裔市民所關注的一大環境正義議題，「玉蜀黍田公園」案的爭議即印證著這個議題的重要性。這個公園原本是一座面積有三十二英畝的廢棄鐵道機廠，經過地方社區居民與市政單位的一場惡戰，終於得以實現此公園的建立。這塊土地是洛杉磯鬧區中僅存的幾片大型空地之一，被市政府視為一處大型工業發展區。其周遭的社區居民，包含洛城裡頭文化最多元但卻不受政府重視的社區，組成了「中國城鐵路機廠聯盟」，提倡作公園用地使用，試圖阻止工業區的開發。結果當然不必多說，社區居民獲得了最終勝利，由加州政府買下該地，預備將其改建成「洛杉磯州立歷史公園」。

每年都有數以千計的拉丁裔人，從拉丁美洲的偏僻農場或小村鎮，湧入洛杉磯市區，尋找更好的生活。然而，許多拉丁裔人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以面對城市生活的挑戰。洛杉磯這個城市沒有為這些二十一世紀的農民留下多少土地，他們只好把院子與空地轉變成生產食物的農園，然而在一個擠滿房子的水泥城市裡，這樣的空地顯然不足。於是社區農園成了救星，他們讓居民可以取得新鮮與便宜的蔬果，同時也提供了無毒、無幫派、無塗鴉，可以和家人與朋友一起放鬆休閒的場所，也是讓人心靈平靜的都市花園。社區農園創造了強大的社交網絡，並提升家庭的和諧。爸媽與祖父母會帶著他們的孩子或孫子共同享受耕種的樂趣，同時讓家人間的關係更加親密。

占地十四英畝的「南中央農園」(請參考本書第八章)，雖然現在已經關閉，卻曾經是一處因應洛城成長中的拉丁裔居民需求而生的開放綠地典範。另外，位於市中心區的Projecto

圖 2.5
長青墓園慢跑道。
(James Rojas 攝)



Jardin (「花園計劃」) 則是一座社區草藥農園，同時也被附近居民當作露天教室來使用。

結語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一場大遊行 (Gran Marcha)，有超過五十萬的移民者與他們的支持者，走進洛杉磯市區，抗議一項法案，這項法案將對非法移民，還有幫助沒有身分證文件並提供其工作者，施以更嚴重的刑責。長久以來，洛杉磯一直因為缺乏公共的聚集空間而為人詬病，但這場遊行在幾個小時內，使整個洛杉磯的大馬路都成為所謂的公共空間，民眾與攤販在馬路上自由亂竄。在一個人口密度不斷增高與文化不斷拉丁裔化的城市裡，市中心也成了社區的核心。這場遊行呈現了拉丁裔族群，如何從大大小小的事情上，轉化了洛杉磯的都市紋理。

洛杉磯與日俱增的拉丁裔人口，正在將原本依汽車規格所建設的城市，轉變成行人取向的悠遊空間。舉凡走路、騎自行車、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至街頭販賣、或與朋友閒晃，拉丁裔人轉化了現有的都市環境，進行各種他們喜愛的街頭活動。不依賴政府或專業者的介入，這些平民都市設計師用DIY的方式，搭設了他們的前院圍籬，在牆上畫上壁畫，並為家屋增加門廊。所有的這些行為，都改變了街道原本的生態，讓它變成社交活動熱絡的鄰里廣場。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加州政府正面臨一項都市發展的兩難：發展密度較高的市鎮該保存尚未發展的地區，抑或讓都市無止盡地擴張。在這同時，拉丁裔族群的都市哲學已為城市的發展做了一個良好的示範，都市空間的即興發揮與再造，呼應著永續、公共生活、社會正義，與社區經濟發展的概念，這些文化多元的城市居民，為了他們自己的家庭與社區的福祉，每天所做的小努力，啟發了我們：城市的永續與創新，其實可以從最基層也最基礎的小事務做起。

參考書目

-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Rojas, J. T. (1991) *The Enacted Environment: The Creation of place by Mexicans and Mexicans/America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MIT.

3

占用一下

Rebar 無厘頭的都市寬厚戰術

TAKING PLACE

REBAR'S ABSURD TACTICS
IN GENEROUS URBANISM

BLAIN MERKER —— 文

顏寧 —— 譯

二〇〇五年十月的某個晴天，一個由藝術家、行動者和設計師組成的團體 Rebar，在舊金山市區的路邊租了付費的停車格。他們在停車格的白線裡創造了一個有草地、遮蔭樹和公園長椅的臨時公園（圖 3.1）。在合法的「租用」時段中，他們重新界定了公共路權的定義：這處位於舊金山市區公共開放空間的地方，這兩小時內不再只供私家汽車停放使用，七乘以二十二英尺的街道空間成了休息、緩和和社交的場所¹。一開始，路過的民眾混夾著冷漠與好奇，但終於有些人進入「公園」，他們坐著並享受草地與樹蔭帶來的涼爽舒適。有些陌生人開始交談，分享不在原定計畫的社會互動，有些人趁機在此休息或閱讀。

1 舊金山規劃局的市中心計畫中的遊憩與開放空間圖，指出城市中開放空間不足的區域。Rebar 選擇了這些區域中其中一塊，一個在市中心十分明顯的空間，作為第一次車位公園計畫的理想實驗場地。



兩小時，與兩萬四千「平方英尺／分鐘」後，Rebar 拆除了臨時公園，「還原」為原本用途，留下照片和影像紀錄。我們將這些發表至網路上，作為實驗的紀錄。

短短幾週之內，這些照片出現在許多網站和新聞報導中。半年內，Rebar 接到上百封信件，詢問這個被命名為「車位公園 Park(ing)」的行動。從停車格變成公園的形象，加上簡單易懂的名稱，「車位公園」迅速在電子媒體間播送，成為直入

圖 3.1

Rebar 第一個 Park(ing) Day 的實驗行動，很快便占據部落格版面，消息迅速傳播各地，成為競相仿效的行動。

(圖片來源：Rebar)

人心的概念。不需要太多解釋，其他也經常從事都市游擊行動的團體，很快擷取了 Rebar 使用的基本戰術。即使如此，Rebar 還是收到一些詢問操作的要求，所以我們在網站上發佈一份簡短的「How-to」手冊，幫助其他人起步。戰術的精髓是使用公園中代表性的元素，如樹、草地和長椅，合法使用停車空間。Rebar 把這個想法當作開放資源，並採用創用授權條款（Creative Commons）：只要不是用於營利，我們鼓勵人們複製並重新詮釋。²

隔年，Rebar 組織了一個單日的全球活動。由大部分來自舊金山，以及美國和歐洲其他城市的團體一起參與，將平時的停車空間轉化為臨時公園。這次的共同行動動員了更多的群眾，以眾人之力重新定義都市的停車空間。二〇〇六年，在四十七個響應「車位公園」中的每一座城市，參與者各自協調各地不同的法規，像舊金山的交通規則就有異於倫敦、紐約或威斯康辛的歐克萊爾。但不論在哪裡，當地群眾的裝置，像自助檸檬水站、雨水示範花園，到種子樣品的贈送等等，都沒遭到反對或取締（圖 3.2）。

這些行動，有效的在都市裡原本不被重視的縫隙中實現，

2 根據 Wikipedia (2009a): 「創用授權條款」被當作「免費版權」運動的先鋒，支持創造更豐富的公共領域…。[有些人]認為「創用授權條款」使智慧財產權的議題上引起關注，促進在「資訊年代」中重新思考「共有 (commons)」的角色。此外，創用授權條款提供了一套「體制、操作和法律支援，讓個人和團體能更自由地進行文化的溝通與實驗」。創用授權條款挑戰了壟斷和日益嚴格的規範文化。根據創用授權條款創辦人 Lawrence Lessig，這是「一個創造者只能從事權力允許的創作，或是被過去創造者所主宰的文化」。Lessig 宣稱，現代文化往往被控制傳統內容業者所主宰，以維持他們在文化產物上的市場獨占性，包括流行音樂與電影，而「創用授權條款」可以做的就是脫離這些限制，提供另一個選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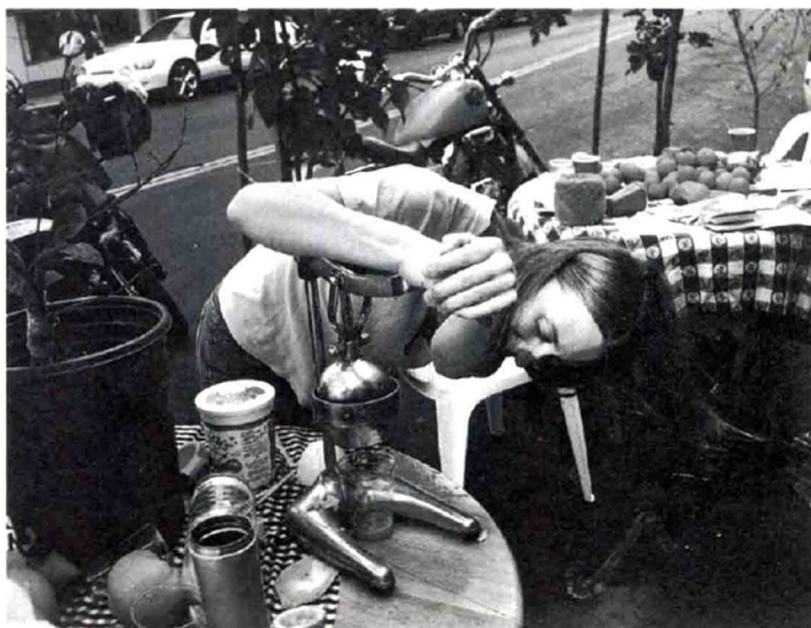


圖 3.2

早期草根性的「車位公園」行動，在以往用來服務汽車的空間上，進行創意裝置。「公園」裡有檸檬樹和榨汁機，讓民眾自製檸檬水。

(圖片來源：Rebar)

並成功的發掘了法令的漏洞。它們雖是基進的戰術，但表面上又對該行動所批判的空間商品化系統不構成威脅³。停車位經常是一座城市裡爭議最多的議題，人人對停車收費、對象與地點斤斤計較。但「車位公園日」選擇用幽默的方式，並老實的付停車費，像是購買公開交易公司的股份一樣，消除了可能的反彈。「車位公園日」的參與者，跟一般人一樣，付費租下停車格，他們只是採取另類的選項，沒有在他們所暫時租用的土地上停放車輛。

二〇〇七年，持續擴展的「車位公園日」，從舊金山蔓延至歐洲和北美洲其他城市，讓我們得以組織一個規模更大的活動，讓全世界的人都能暫時將停車位變成公園。藉由其他夥伴

3 在這件和許多其他案例裡，我們受到其他投入都市裂縫空間運動的藝術家的啟發，尤其是Gordon Matta-Clark的「假房產」(Fake Estates)計畫。



圖 3.3

「公園腳踏車」：結合儲水表層與發動燈光和剎車皮的太陽能板，車輛幾乎全部使用回收材料製成。雖然需靠著腳踩踏板移動，但沒有使用腳踏車的組件。（圖片來源：Rebar）

組織「公有地信託」(The Trust for Public Land) 和「公共建築」(Public Architecture) 的幫助，Rebar 設定活動日期，組織上百個志工參與，在舊金山各地舉辦社區會議，並在網路上發佈 how-to 資訊。Rebar 自己建造了公園腳踏車 (Parkcycle) (圖 3.3) —— 一個用人力運轉、二百五十平方呎的開放綠地，可以依照駕駛的想法隨意停在任何地方。我們在當天拜訪舊金山五十八處停車格公園的其中幾個。



總體而言，到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為止，共有超過兩百個公園誕生。這些公園全部出自志工之手，在全世界超過五十個城市發生。空間的裝置無所不包，從晚餐派對到槌球場、狗公園、按摩坊、社區健康診所，以至都市微型農地。某些參與者在裝置中放入暗示性的廣告和商業促銷（像在佛羅里達，有家星巴克也設計了臨時公園）。但在多數車位公園裝置的共通點是幽默感，以及提倡某種藝術、生態、社會或文化的想法（圖3.4）。從二〇〇五年首度行動開始，這種好玩而熱情的特質，每年仍持續在各地發酵。

但除了好玩之外，這些行動在更廣泛的脈落和都市地景結構，以及所謂的公共領域裡，究竟產生什麼效用？我們如何開

圖3.4

這是一個由志工創造的公園。二〇〇七年舊金山的參與者發展了許多相同主題的裝置，他們採用互動性的元素（例如本圖中的圖書館），鼓勵更多社會互動。

（圖片來源：Rebar）

始將這些行動和事件，作為重新建造當代城市地景的方法和手段？Rebar提的戰術運用和特殊事件，是否有可能成為一個轉捩點，使人們習以為常的公共空間有機會朝向更大的轉變？

本章藉由檢視Rebar計畫的某些核心主題，包含「車位公園」和其他藝術作品，來探索以上問題。特別是，本章將把這些案例連結到我們對於公共空間的理解，以及我們自身的作用力。

I 縫隙空間 Niche Space

至今仍不斷演進的「車位公園」計畫，可說是Rebar最經典的行動方式：活動發生在不被人們重視的「縫隙空間」，或是在人們評估為不具活動潛力的空間。我們相信一旦人們明白這類計畫，將能透過創意行動，對這類空間展開新的評價。占停公園計畫，確立了停車格可成為都市地景中的縫隙空間，並為停車空間重新定義，使它成為促發創意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實驗的沃土。唯有透過其他人複製和採用戰術，才能生產出一種新的都市空間型態，就像這兩年接續Rebar車位公園實驗的其他行動。當Rebar「允許」其他人的參與，新行動者蜂湧而至，挑戰這些不起眼、日常生活空間所鑲嵌的既存價值系統時，停車空間成為一個具有潛力的場域，一個讓任何政治、社會或文化意圖得以彰顯的介面。藉著提供城市裡任何未被滿足的需求，停車空間成為重新定義「需求」的工具。在此，用創意「占用」空間，等同宣示占領了一處社會和藝術實踐的實質領域。

作為藝術家，車位公園現象點燃我們對於街道的好奇心。我們看見街道可以包容比原本想像更多的不同利益。在之前，

唯有暗自貶抑某些活動（像是玩耍、吃吃喝喝或是社交）的價值，其他活動（如停車或駕駛）才能存在。車位公園建立了一個先例，以活動介入這場空間價值的競爭，提出一套新的評價系統。以縫隙空間為基礎，我們發展出我們作品中的三項核心要素：戰術、寬厚、無厘頭。

■ 戰術都市主義 Tactical Urbanism

Rebar 將「戰術都市主義」定義為溫和或暫時性的都市空間重塑，以開啟結構性的環境改造。我們所用的戰術，是基於我們相信深層的社會、文化、經濟與其他結構與實質環境之間，有著雙向關係：兩者皆生產環境，也經由環境再生產。Rebar 一直對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所提出的「慣念」(doxa) 與「習癖」(habitus) 理論感到興趣，用於解釋我們如何認知被高度規範化的地景。依 Bourdieu 所言，「每一種存在的規則都會以許許多多不同的程度與方式，把自身的武斷合理化 (Bourdieu 1977: 79)。這些「慣念」是深層、自我驗證的信念，不只解釋世界運作的方式，也由實質環境和我們在其中的運作（也就是「習癖」）強化之。「習癖是一種普遍化的調解過程，在沒有清楚原因或明確意圖的情況下，習癖引發個人的行為，讓這些行為看起來變得『明確』與『合理』」(Bourdieu 1977: 79)。「慣念」強化了現有的權力關係，而這個權力關係也營造了城市的地景，地景表面的中立性需要透過慣念來合理化。因此，當 Rebar 考慮到一個停車位、人行道上空間或設施配置、一個封閉的企業大廳，或是城市裡的符號與材料的語彙，我們把它當成與「慣念」的對話。環境和「習癖」是被封鎖在相互強化與自我參照的迴路當中，這也是「戰術都市主義」

用來中斷「習癖」操作的環境。

「慣念」也常被政府或企業等體制或行動者所強化。Michel de Certeau比照了兩種權力在空間中操演的方式：戰略（strategy）與戰術（tactics）。戰略「在看似客觀計算的同時，隱藏了與權力的連結，而這個權力的連結，維繫了它們在『適當』環境與體制中的存在」（de Certeau 1984: xix）。戰略的成品，舉例來說，包括了道路上所漆的交通記號、無形的財產界線，以及都市分區管制，用來決定一個地區是住宅、工廠，或色情產業。換言之，戰術是投射在地景中的權力結構，而這個權力結構形塑了慣念並強化了城市地景表面的「中立性」。在戰略投射權力的同時，它亦需要遮蔽權力的來源，因此它需要仰賴一個令人信服自我驗證環境。

相反的，戰術是「獨立的行動或事件，它們存在於戰略系統裡的空隙…，戰術充分運用著這些空隙與機會，來營造新奇又有創意的效果」（Wikipedia 2009b）。戰術（當利用縫隙空間時）「巧妙地、斷斷續續地滲入（戰略的）環境，既無全部占用，也無法完全脫離」（de Certeau 1984: xix）。採取戰術意謂「必需小心翼翼利用權力監控的裂縫，偷偷侵入，製造意外」（de Certeau 1984: 37）。由此一來，戰術中斷了人們的慣念，暫時在空間中投射一套新的價值系統。Rebar的戰術，即通常選擇了在現有的官方系統中，重新混合環境的號誌與符號。

■ 寬厚都市主義 Generous Urbanism

當代工業社會已普遍漠視公共空間中，即興且豐富的社會互動，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商業化的模式。在這種商業模式中，人與人的對話僅存在於經濟交易的符號和產物。當交易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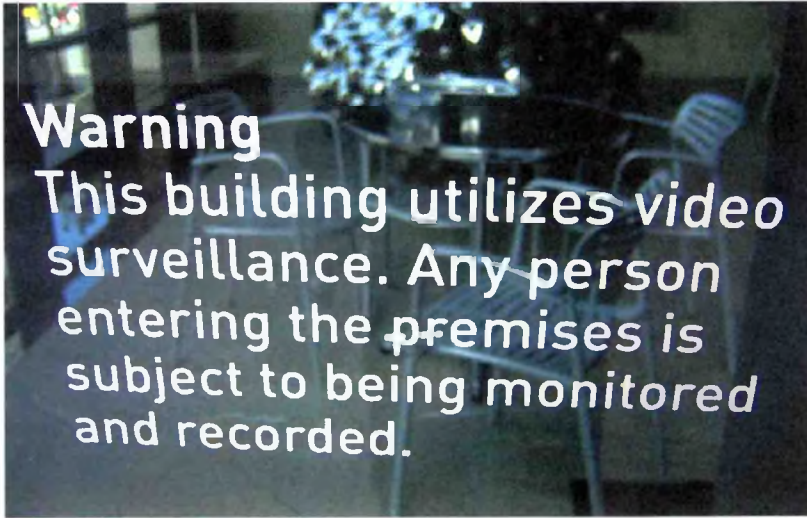


圖 3.5

C-Net 總部大樓的企業大廳提供室內的座位給公眾使用，但公眾使用的權利伴隨這個警告：「老大哥正在看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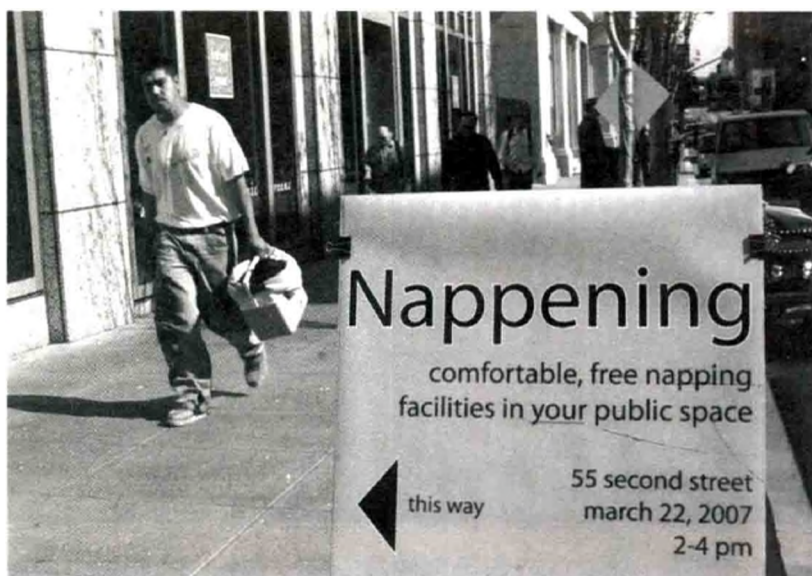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Rebar)

買賣雙方的連結也隨之中止，雙方不受約束的各自離去。在北美城市裡，跟商業交換或經濟生產無關的大眾行為，基本上有兩種類型：遊蕩或其他非法和擾亂性的活動，以及事先經過嚴謹規劃和重重申請許可，在官方認可下的集會、慶典和文化活動。(所謂的「休閒」是一個可能的例外，但在過程中不一定會使陌生人之間建立關係。) 當一個未規範的寬厚活動，突然在這類商業環境下發生時，通常會引發認知上的錯亂，像是「對帝國的反抗」(“blow against the empire”)(Purves 2005: 22-44)。提供公眾某種東西，卻不期待有任何回饋，是一件乍看令人感到顛覆、可疑，但也可能是深奧與具有轉變性的。脫掉了商業的包裝，「寬厚」的公共行動所強調的是：這是可能的，而且不用買也不用賣。

Rebar 將「寬厚都市主義」定義為發生在陌生人之間，不涉及商業交換，並能生產新文化價值的公共場域的營造。這並不是說在執行過程中完全沒有金錢涉入，畢竟主辦者仍然需要

圖 3.6

Rebar 在街上設「來打個盹」的廣告，也在擁有私有開放空間大樓樓上的法律事務所發送傳單。這個免費活動很快「銷售一空」，許多參與者詢問是不是能變成一項永久服務。（圖片來源：Rebar）



購買材料，和取得經費與贊助。但最終的價值是脫離商業而獨立存在，我們可以稱這樣的活動為「藝術生產」，（「藝術」是文化產物的一種便捷類別，最終目的是藝術），但在這種藝術形式下，沒有絕對的「消費者」或「生產者」，只有參與者不同層次的情境參與。這類的文化實踐，已經在舊金山構成一種血統，包括像提供免費食物的 Diggers 劇團、免費商店運動和最近在金門公園的免費夏日藍草音樂節。寬厚都市主義一個知名的例子是 Critical Mass，一開始是一個即興、自發性的自行車遊街行動，將街道占領，這項行動在過去十五年來，已擴張為每月一次的全球性活動。但寬厚情境的形式越成功，就越有被主流文化氛圍吸納的危險，而一旦被吸納，變成熟悉的、可接受的，甚至有商業行為的節慶或景象時，原有批判的面向就消失了。

Rebar 的第二個主要都市提案「公用空間」(Common-



圖 3.7

Rebar 在一個私有的公共空間辦了猴舞工作坊。這個地方是由私人保全維護，不鼓勵公眾逗留。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法律觀察員也在一旁觀看這次活動。

(圖片來源：Rebar)

space)，是企圖在舊金山私有的公共開放空間 (POPOS) 中，採用寬厚都市主義，製造八種實驗行動，介入這些空間。我們猜想，人們對於寬厚都市主義某些程度的容忍，將是真實公共空間的酸鹼試紙，讓我們能進一步探索這些私有的公共開放空間，究竟有多麼公共與開放 (圖 3.5)。從繪製舊金山規劃法規一三八條所規範的空間著手，我們開始這個長達十八個月的計畫。該法規規定新的開發案需提供百分之二的面積，「以滿足公眾對開放空間和遊憩使用的需求」(San Francisco Municipal Code Sec. 138)。這些空間實際上包括了屋頂平台、企業中庭、廣場和走廊，甚至是一些奇怪形狀、一般「大眾」可能不會留意，甚至也不大需要的畸零地。我們大致將我們的方向定位為情境主義 (Situationist) 傳統中所謂的「翻轉」(detournment)，即用熟悉元素進行創意的重新定調，進而生產新的意義 (跟我們過去做的「再混合」沒有太大差異)。

我們在網路上進行實質空間和心理地理的問卷調查，發

展一系列活動：公眾導覽、在屋頂放風箏、「刺客」的互動遊戲、設計給睡眠不足的上班族和其他參與者的「來打個盹」（圖 3.6）、回應監視器的「反監視」遊戲，還有教導巴里島猴舞的工作坊（圖 3.7）。每個活動中，我們鼓勵民眾事前和活動過程中的參與。我們視這些活動為重新定位空間的機會，重塑那些企業空間與私人領域。這些寬厚行動，回應了我們在繪製地圖裡所找出的尚未滿足的需求（像是休息、遊戲或社區的需求），同時也創造了「預期和未預期之間的斷裂」，使參與者能有機會體驗「不同的意見，以及同時支撐不同世界觀與現狀的架構」（Purves 2005: 28）。

這種主動的、寬厚的城市營造作法，跟在舊金山第二大街二三五號私有公共空間上告示牌上表現的父權式「寬厚」，是完全不同的。告示牌這樣寫著：

「此廣場與建築內部的座椅空間，是為了大眾的休憩所提供與維護。室內座椅對外開放的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八時至下午六時。注意：本建物裝有監視影機，任何進入的人士都將受到監視與紀錄」。

我們發現近來很多對這些私有公共空間的批評，不是沒有道理的——「體制化的寬厚顯示當贈與的行為不只是被強制，而且是被理性化時，公共領域只會是空洞的符號」。這些空間都被高度地規範化，沉浸在慣念中，「任何事情都不該發生，或許除了讓我們思考現代生活如何將人們置入扭曲的形式外」（Fowle and Larson 2005: 23）。

我們也發現，私有公共空間的社會互動是複雜且多變動

的，正如公共空間不同的管理機構和多元的使用民眾一般⁴。大多數私有公共空間是由大樓雇用的私人保全人員在管理，而他們也是我們通常辦活動時交涉的對象。我們認知到，他們也是我們試圖動員的公眾的一分子。有些保全人員曾懷疑我們的活動，甚至不知道該大樓有提供開放空間的義務，但也有些人對於我們活動的寬厚精神給予正面的回應。事實上，我們對活動的「免費」定位，常令人出乎預料，進而讓管理人員逐步能接受在商業空間裡從事非商業行動。

在寬厚都市主義的行動中，Rebar的創意受到某種程度的真實性和街頭智慧的啟發。但把寬厚當成是強大並具有改變性的戰術的同時，並不表示我們是以諷世的態度來行動。Rebar多數行動的地方不是藝廊，我們活動的空間脫離了支持藝術、設計與都市基礎建設的傳統價值體系。我們將我們的作品免費給人使用（營造給人們使用和享受的場景，或達成未被滿足的需求），讓任何鄰近的人都能體驗，這樣的作品對我們來說才是「完成」的作品。這些作品的主要使用對象，是公共場所的經常使用者，但也有更多人是透過影像和活動的描述，來經驗這些非商業的交換。對於我們試圖達成的目標而言，這種次要的間接經驗可能更重要。簡單的傳達這些活動的發生，這些訊息將影響人們對於公共空間的理解：什麼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接受的，遠超過活動當時所能傳達的訊息。如果寬厚都市主義是這類工作的媒介，則媒介將成為訊息。最近有很多人開始以Rebar的行動為基礎，發展對於私有公共空間的不同詮釋。例如：舊金山都市研究協會（San Francisco Urban Research

4 換句話說，每一個私有公共空間均有著獨特的治理生態，有待發掘，而不像正式的城市公園，其規則是公開、系統化與相對一致的（見Amoss 2007）。

Association, SPUR) 正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空間評估，並舉辦關於城市公共空間網絡的公共論壇。其他個人和團體也發展他們改造私有公共空間的活動，像是午餐時間的野餐，和免費人像素描課。

無厘頭都市主義 Absurd Urbanism

Rebar 認為，在每個維持社會和諧的理性系統深處，均存在一種假設，而這個假設的邏輯本質常常是荒謬的。也因此，它們是藝術探索的富饒之地。財產所有權可以說是無厘頭的概念之母，它也成了 Rebar 的第一個計畫「櫥櫃國家圖書館」的靈感來源。二〇〇三年，《櫥櫃雜誌》(*Cabinet*) (一份非營利的藝術與文化季刊) 在以「財產」為主題的春季刊上，刊載他們在 eBay 以美金三百元購買了一塊沒人看過的半畝土地。這塊地原本是一九六〇年失敗的「陽光小鎮蘭伽特」住宅發展案的一部分，現在是新墨西哥州德明市郊外，一塊遍布沙漠荊棘的荒地。《櫥櫃雜誌》把這塊他們新買的地命名為「櫥櫃大地」(*Cabinetlandia*)，並把它分為幾個小單元：讀者區、編輯區、偏愛區等等，他們也提供讀者租用雜誌大小的土地，一分錢美金即可租用九十九年。

在閱讀「櫥櫃大地」的報導時，我們突然想到：櫥櫃大地顯然需要一個「櫥櫃國家圖書館」(來典藏櫥櫃當季和所有過期的期刊)。有什麼會比設立資料庫來建立一個文明社會更好的方法呢？(圖 3.8) 我們很幸運成為第一個向《櫥櫃雜誌》提出這個構想的人，雜誌編輯在第 12 期 (2003-2004 冬季) 上刊出我們的圖書館計畫和草圖。從一開始，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是，這個計畫必須是一個真實可用的圖書館，而不僅是靈光一



現和紙上彈兵。最關鍵的是，這個計畫的每一個細節，都應該展現它圖書館的特質，這個想法引導了接下來的每個步驟。我們將以三個抽屜的檔案櫃來呈現這一座「櫥櫃國家圖書館」：

- 上層抽屜：索引卡、訪客留言簿、訪客服務。
- 中層抽屜：藏書（過期的櫥櫃雜誌）。
- 下層抽屜：零食吧台。

在Rebar的一連串行動裡，無厘頭通常是行動的照明燈。自圖書館計畫實行以來，它吸引了朝聖的人、批評的人和甚至

圖3.8

Rebar的成員馬修檢查「櫥櫃國家圖書館」的收藏，裡頭有留言本、零食吧，和所有過期的《櫥櫃雜誌》。

（圖片來源：Rebar）

是來亂的人。⁵

在二〇〇六年的夏天，Rebar以「罐裝」計畫進軍體制內的藝廊。「罐裝」是一個表演裝置，是舊金山南晒藝廊（SoEx）「牆壁之間」展覽裡的一件作品。南晒藝廊是一家擁有三十四年歷史的非營利藝術空間，因長期支持舊金山的前衛藝術而聲名遠播。「牆壁之間」是二〇〇六年藝廊為了防震裝修工程而結束營業前的最後一個展覽，也因此，藝廊將整個室內結構提供給藝術家作為創作的對象。牆、地板與室內空間成了創作的素材，鼓勵參與的藝術家思考遷徙、轉換、即興和社群等作為創作的概念。

為了回應展覽的概念，並慶祝南晒藝廊在這個空間的豐富歷史，Rebar在藝廊裡搭建了一條臨時的罐頭生產線，將藝廊的牆壁採收、加工並製成罐頭。Rebar有系統的鑽取藝廊牆面，進行分解。然後，在開幕夜和閉幕夜的活動上，以傳統的生產線，將鑽好的牆塊裝入鐵罐。接著，鐵罐被貼上標籤並販售，販售的所得則用來支持SoEx和Rebar。罐裝計畫的概念來自於藝廊地點的歷史脈絡：南晒藝廊座落在一個舊工業區，從前這裡有一家美國罐頭公司（American Can Company），而SoEx的前身就叫做「美國罐頭合作社」（American Can Collective）。

把藝術創作的商品化推展到它無厘頭的結論，Rebar企圖

5 二〇〇七年春天，來自新墨西哥大學和德州大學的學生，為了在基地上建立他們自己的藏書空間，對「櫥櫃國家圖書館」發動攻擊。但後來他們被當地季節常有的驟雨所驅離，詳見Taylor（2007）。在二〇〇九年七月，Rebar重回櫥櫃大地，修理與擴張因暴雨毀損的圖書館，還加了一個抽屜大小的白牆藝廊，供巡迴展使用。在這趟訪問的旅程裡，Rebar還嘗試實驗性的投影，在晚間的新墨西哥沙漠由上吹拂的沙塵中，投射圖書館的理想世界。我們利用高強度的投影機，帶有建築思考的破碎畫面被投射在風中不斷攪動的沙粒上，創造沒有重量的、稍縱即逝的圖書館幻景。

將藝廊藝術的生產方式工業化，同時翻轉傳統藝術圈的商業交換行為：在罐裝計畫中，雖然產品的外觀被包裝成大量製造的平凡商品，但鑲嵌在裡頭卻是藝廊所包含的文化價值。裝罐計畫，打從骨子裡反對傳統藝廊，那種讚揚神祕、無所依據的評價方式，以及對於消費至上的遵從。因此，罐裝計畫的設計，是將藝廊簡化為隨時可被取代的商業單元。

在這個計劃中，我們可以嗅出些許反叛的氣味。罐裝計畫企圖以無厘頭的遊戲方式，在霸權的體系中，擠出民主的裂隙。Rebar 將藝廊牆面以及連帶的文化價值一起收割，並透過罐頭這種廉價與方便運送的方式，加以包裝，分售大眾。一個買家說：「我一直想在南晒藝廊辦展，這個週末我將開放我的工作室給民眾參觀，到時我要把一幅攝影作品掛在我從罐裝計畫買下的藝廊牆上。這會成為我第一次在南晒藝廊的個展！」

結 論

這篇文章中我們指出 Rebar 過去至今工作的關鍵主題，但老實說，這些多是事後的解釋。除了在舊金山 Mission 區酒吧裡，直到深夜的一些直覺討論之外，我們無法說在這些行動開始時，已有任何明確的想法。不過現在回頭看看，這些曇花一現的行動概念其實是始終如一的：無厘頭、寬厚和戰術，是 Rebar 行動計畫目前為止的品質保證。但我們在行動之前很少先作試驗，事實上，主導我們做法的，比較多來自於縫隙、漏洞和機會這樣的概念。這些是都市結構中必要的成分，也是吊人胃口的缺口。只要是由霸權所支配的結構還存在，它們還會吸引我們繼續行動。只要我們還擁有看見這些空間的雙眼，系統中的裂縫仍會繼續勾引我們的好奇心。都市地景是讓人們玩

弄空間和結構的實驗場，實驗的最終結果能讓我們得到更寬廣的結論。

最後，讓我們回到本章開始的一個問題：行動的結果是否能成為挑戰結構的轉捩點，而非只是公共空間裡的無厘頭案例？我認為評斷的方法不應該只是計算參與複製這些空間行動的人數，而是看是否任何人都能將公共地景，視為實驗與遊戲的場域。這場遊戲的規則是公開的祕密。

參考書目

- Amoss, Marianne (2007). 'Challenging the Commons: A Yearlong Experiment Tests a new Breed of Urban Public Space in San Francisco'. *The Next American City* 16: 11-12.
- Boudieu, Pierre (199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Nice, R.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 Certeau, Michel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owle, Kate and Lars Bang Larsen (2005). 'Lunch Hour'. In *What We Want Is Free*, edited by Ted Purv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17-26.
- Kayden, Jerold (2000).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The New York City Experience*. New York: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 Najafi, Sina, ed. (2005). *Odd Lots: Revisiting Gordon Matta-clark's Fake Estates*. New York: Cabinet Books.
- Purves, Ted, ed. (2005). 'Blows against the Empire'. In *What We Want Is Free*, edited by Ted Purv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oach, Christopher (2008). 'Urban Guerillas: Streets and the Sociopolitical Architecture of the Public Realm'. *On Site* 19: 27-33.
- Sadler, Simon (1999). *The Situationist City*. MA: The MIT Press.
- San Francisco Planning and Urban Research Association (2009). *Secrets of San Francisco: Where to find our city's "POPOS" — privately owned public open spaces*. <http://www.spur.org/files/popos-guide.pdf> (retrieved 15 Sep 2009)
- Taylor, Chris (2007). 'Projecting ARTLIES Into the Void'. *ART LIES* 53: 40-45.
- Wikipedia (2009a) 'Creative Commons'.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eative_Commons (retrieved: 20 July 2009)
- (2009b) 'Tactic (Method)'.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ctic_\(method\)](http://en.wikipedia.org/wiki/Tactic_(method)) (retrieved: 1 Dec 2009)

4

eXperimentcity 城市實驗室

柏林「自由空間」的永續發展

EXPERIMENTCITY

CULTIV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BERLIN'S FREIRÄUME

MICHAEL A. LAFOND —— 文

賴彥如 —— 譯

城市實驗室 (eXperimentcity) 描述的是一個具批判性、以文化為取向的都市發展方法，但或許更重要的是，它描述了在柏林眾多「自由空間」(Freiräume)¹上所推動的城市永續策略，這個策略深具實驗性。二〇〇三年，非營利組織「創造性永續協會 id22」(<http://www.id22.net>) 體認到永續發展的論證迫切需要結合實作，因此開始所謂的「城市實驗室」計劃。城市實驗室的交流平台重視自發性的空地和建物再利用，例如生態建築、另類文化中心，以及社區農耕計畫，使人們注意到結合閒置空間和市民社會的巧思，進而產生都市空間營造和管理的新方法。在柏林，這類由下而上的努力，逐漸使所謂「非正式規劃」得到了更多的支持：推動土地再利用的市民組織，漸漸被

1 Freiräume 指的是空地或未被開發的公有土地，在柏林數量龐大，參見 <http://www.eXperimentcity.net>

視為城市發展的夥伴。

■ 柏林：充滿政治與可能性的首都

在後柏林圍牆時期與後工業的柏林城市地景裡，有著超過五千處的閒置空間²。有些人視這些空間為眼中釘，但也有許多人視它們為機會，例如越來越多的文創工作者，包括成千上百的學生、工作不穩定的藝術家，和放蕩不羈的文化人士，他們不只是把這些閒置空間當成遮蔽之處而已，還設法在其中試驗他們的願景³。

今日柏林的特色，不僅在於廢棄的老房子，還有老化卻又多元的人口、逐漸停滯的經濟及可觀的債務。「不富有，卻很性感」，是魅力十足的柏林市長克勞斯沃維萊特（Klaus Wowereit）對這個城市的評語。儘管這可能不過是個宣傳手法，但這番量少質精的溢美之詞中，是否也有些進步的思維⁴？

柏林的建築環境充斥著大量的空地，這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接連而來的冷戰時代的產物。二戰期間，柏林有一半以上的建築毀損，一九六一年建造的柏林圍牆，把西柏林圍成東德中央的一座孤島，無數人被迫離開柏林。到了一九七〇到一九八〇年代間，東、西柏林的規劃者都選擇了都市更新和興建高速公路，結果不經意創造了更多空地。這段期間出現許多遊行

2 柏林的都市發展局和柏林區政府共同負責都市中建築空地的宣傳。建築用地管理服務提供超過一千筆建築用地的資訊。詳見

<http://www.stadtentwicklung.berlin.de/auen/baulueckenmanagement/>

3 有關柏林文化部門和創意工業的網頁「創意之都柏林」

（<http://www.creative-city-berlin.de/>）

4 作者另一篇關於柏林創意永續的評論〈城市星球〉，請見：

<http://www.worldchanging.com/archives/006497.html>

與倡議，反對這類摧毀城市原貌、菁英化的都市更新，當時在西柏林出現了幾百個占屋的行動。柏林「自由空間」的行動者，幾十年來仍持續致力於當年開始的抗議行動，例如近年有人為了位於克羅伊茨貝格（Kreuzberg）和弗里德里希海因（Friedrichshain）兩個社區之間的斯普雷河（Spree River）周邊河岸空地，爭取這空間的公共性與平價使用的可能⁵。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後，緊接而來的一九九〇年前期，在前東柏林有數百個占屋與占地行動。九〇年代德國首都遷回柏林，點燃了人口與經濟成長的希望。柏林市府和許多投資客懷抱著成長大夢，不過剩餘的工業沒有急起直追，人群和工作機會也不斷流失，造成更多被遺棄的荒地、經濟崩跌，城市瀕臨破產。

柏林的另一個問題，是它的所在區域面臨了「城市萎縮」（Shrinking Cities）的現象，不僅經濟蕭條，人口也不斷縮減（<http://www.shrinkingcities.com>）。但對這個大都會來說，經濟危機已不是什麼新鮮事，而柏林也沒有在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下遭到淘汰。柏林很幸運的並沒有真的面臨萎縮，至少還能穩住陣腳。以往開發市區閒置空地的方法，多半是跟國際投資客合作，進行大規模建設，但現在這個方法行不通了，都市規劃單位只好另闢蹊徑，轉而思考如何與市民社會中的小型「開發者」共同合作。不同於土地炒作，這些團體的興趣在於充分利用這些土地，以符合自己的需求。此外，近年來文化經濟及都市創意工業的重要性已逐漸受到重視。因此，柏林的規劃者抱著希望，努力研究文化和都市發展之於地方經濟的關係。在

5 「斯普雷傳媒區沉沒」（Mediaspree Versenken）計畫是市民自組的行動，抗議地方政府和投資者擬定的河岸開發規劃。（<http://www.msversenken.org/>）

此同時，柏林自從一九九〇年代晚期出現了許多非正式、時而「反叛」的規劃及空間生產，包括各種小尺度的「自由空間」利用計畫，包括所謂的「暫用」(zwecknutzungen)，以及長期的再利用。

透過這些方式，柏林已逐漸成為「永續發展文化」的實驗室。所謂的「永續發展文化」意即透過合作與參與式的計畫，共同創造與維護都市空間，進而民主化規劃和發展的過程，並提升地方能力。

不過在「貧困但性感」的柏林，四處仍可看到閒置的土地與建築，甚至是在市中心區，它們不僅容許大型購物中心的設置，也提供無數小型活動的暫時性使用，如地下電音俱樂部、綠色游擊和沙灘排球等。像是另類的創新住宅等永久性的建物也逐漸蓬勃，人們不再渴求有著車庫和草皮的郊區房屋，而是在自主的都會生活之中尋求認同感。

這個城市裡，有超過十萬間的空屋被荒廢，還有成千閒置的辦公室、商店和廢棄工業建築，甚至連整個機場都得關閉，因此引頸期盼新的利用方式。柏林絲毫沒有一丁點房地產開發的壓力，新的開發雖然進行着，但更著重某些新品質，表達新認同，例如：生態、自主設計、自主管理、創意、永續等。住宅形式(Wohnkulturen)回應了人口結構、生活型態，還有文化、社會、生態和經濟上的變化。

柏林傳統上是一個租屋者的城市——少於百分之十四的人擁有自己的房子，從無政府主義的拖車族，到生態型的合作公寓等形形色色的形態皆有。在這個住了三百五十萬人口的「後意識形態城市」，人民追尋的不是一種完美的住宅形式，而是更多元的居住形態。

id22 + 城市實驗室：溝通式的使用 + 閒置空間

id22 與它的城市實驗室計劃共同起源於烏發工廠 (ufaFabrik)——一個一九七九年出現的反叛文化生態城市村莊 (urban village)。當時一群人在被默許的情況下，非法占領了德國影視公司 (Universum Film AG，簡稱 UFA，見 LaFond 1999) 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七〇年代使用過的建築物。id22 從一九九九到二〇〇七年在烏發工廠運作，於二〇〇八年搬進 MARIE Baugemeinschaft，這是一處在荒廢數十年的空地上所自力建造的生態住宅⁶。這個造屋計畫的靈感來自於鄰近寬敞的市區公園 (Ein Platz für die Marie)，這個公園是九〇年代晚期該地的房子被拆除後，由附近的居民與上班族共同爭取與設計的。這塊新誕生的公共「自由空間」裡，設有社區花園、運動設施與遊戲場，是市民與地方政府聯手完成的空間生產典範⁷。

id22 的文化規劃者主要活躍於柏林，但同時也參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規劃案。像台北的寶藏巖和大理街的都市空間再發展提案，就是 id22 和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OURs) 共同合作的成果⁸。

- 6 關於 MARIE Baugemeinschaft 的簡介，詳見 WOHNPORTAL 頁面：
<http://www.wohnportal-berlin.de/marie-marienburger-strasse-40berlin-prenzlauer-bergluxus-des-weitblicks-wohneigentum-zum-selbstkostenpreis-im-vordergrund-steht-wohnen-fuer-die-familie-sowie-die-einrichtung-verschiedener-gemeins/>。
- 7 更多關於市民創造的城市公園 Ein Platz für die Marie，見：
<http://www.stadtentwicklung.berlin.de/wohnen/freiraume/de/buergerengagement/platz-marie1.shtml>。
- 8 關於 id22 和台北的 OURs 合作的寶藏巖案例，見 LaFond (2008)。亦可參詳台灣台北的 OURs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的網頁 (<http://www.ours.org.tw/>)。

「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21)直到二〇〇六年才正式被採納為柏林未來發展的永續願景，而早在二〇〇四年，「城市實驗室」就被視為實踐「二十一世紀議程」的模範計畫⁹。二〇〇九年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更認可「城市實驗室」為「歐洲創新暨創造年」(Year of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最佳實踐案例(http://create2009.europa.eu/projects/participating_countries/deutschland_germany.html)。

「城市實驗室」是一個行動的呼籲，從以往的計畫中吸取經驗，推動新一波的都市空間永續再利用和再發展方案。近幾年，城市實驗室已吸引、評論與串連數百個的相關方案，並且直接提供協助。這些方案每個就像是小小的實驗室，研究各種進步的都市另類行動。「創意永續」在此意味著，以不會造成快速締結化的方式來發展地方及社區。它的重點是該如何用最少的資源，透過市民社會的集體參與和培力，進行都市空間的設計與管理，同時讓地方政府肩負維護空間品質的責任。城市實驗室和進行中的都市再生並肩作戰，希望重新發掘柏林或其他歐洲城市的生活品質。這裡所指的「永續」是質重於量的，比如說增加地方的認同和安全感，減少空氣、水、噪音等汙染，縮短通勤時間，以及透過改造生活環境來表達自我。在這個方案中，一個重視溝通、看重文化與過程的取徑，取代了科技的途徑。

創意力量和行動者不僅來自藝術家和建築師，地方民眾在這個方案中也扮演要角，包括在社區裡協助辨認、形塑並溝通

9 柏林二十一世紀議程的英文摘要見<http://www.stadtentwicklung.berlin.de/agenda21/en/service.shtml>；完整的政府宣言見<http://www.berlin21.net/fileadmin/pdf/d15-5221.pdf>



有創意且合適的計畫。在這過程中，城市實驗室負責串連、支持和宣傳許多「空間回收」的計畫和藝術介入的行動。

作為一個在理論和實踐之間游移，強調創新都市空間再利用的「開放式平台」(open source platform)，城市實驗室以支持「永續都市發展的文化」為目標，工作包括研究、比較、連結與宣傳各個行動計畫，架設網站和網路平台，向外界聯繫並尋覓對特定計畫的支持。

城市實驗室還組織一些活動，像是每年的「實驗日」(EXPERIMENTDAYS)，邀請許多行動計畫一起參與，動員人力及資源，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活動。二〇〇九年十月的某個週末，「第九實驗日」(EXPERIMENTDAYS 09)在柏林的Uferhallen藝術區舉行。Uferhallen藝術區原先是一棟大眾運輸系統的維修廠房，後來被轉化為一個兼容並蓄的文化中心(圖4.1)。在那兩天的活動裡，大約展示了一百個計畫，參與者和來賓加起來超過兩千人。「城市實驗室」的活動，相當程度是志工努力的成果，但柏林市政府、各個進步組織、銀行、門票收入和各

圖4.1
在位於柏林威頂區(Wedding)的Uferhallen藝術區舉辦的「第八實驗日」(EXPERIMENTDAYS 08)。
(Robert Knobloch攝)

界捐款，也確實為這些活動提供了資金。

■ 範例 + 實驗

以下簡述幾個住宅和文化計畫，說明城市實驗室所支持、宣傳的倡議方案¹⁰。首先是柏林最迷人的文化與永續城市再生案例之一：烏發工廠。id22和「城市實驗室」都對烏發工廠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烏發工廠是一項有創意與非營利的空間再生計畫，廠區建築與空間長久以來為UFA影像公司所用。UFA一向被譽為德國版的夢工廠（<http://www.ufafabrik.de>），佛列茲·朗（Fritz Lang）的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就是在此製作、放映和收藏。一九七九年，一場西柏林最受矚目的占屋行動後，一個另類的社區便在這裡形成。占屋行動者從一開始就採取激進立場，主張占領烏發工廠並非為了一己私慾，而是要開放作為公眾使用。他們花了三十年從文化、社會與生態的角度，測試、論證地方和地方資源可以有什麼作為。三十年後，鄰近地區、城市，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使用烏發工廠這個「自由空間」，每個人都被邀請一同生產、享受這裡的文化（圖4.2）。因為烏發工廠有著有機麵包店、另類的「免費學校」、太陽能和共生能源系統、社區中心、國際文化中心等各種有趣的小型計畫，所以被聯合國人居署（UN Habitat）肯定為改善都市環境的最佳行動方案¹¹。

10 其他與eXperimentcity在柏林的相關計畫，見LaFond（2007）。

11 關於聯合國人居署最佳行動方案對烏發工廠的介紹，見
http://www.bestpractices.org/database/bp_display_best_practice.php?best_practice_id=1454

圖 4.2
羅米和賽巴斯汀在柏林騰
柏爾霍夫的烏發工廠。
(Michael LaFond攝)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下，這道隔開東西德鐵幕的土地，終於能夠迎接和平。在牆倒下的幾個月內，重獲新生的「死亡帶」(Death Strip)上出現了許多新用途，譬如藝術家帶著他們的旅行拖車和推車，占領原先是荒地的一角，形成幾個旅行拖車組成的社區，它們在東柏林一條分隔特里布托區(Treptow)和克羅伊茨貝格區的運河邊安頓下來。二〇〇九年本文正在寫作時，洛赫穆勒總體藝術社區(Gesamtkunstwerk Lohmühle)仍被地方政府所默許，也很受社區歡迎。他們提供了公眾可接近的文化與生態實驗，還有一個可供住宿的地方(<http://www.lohmuehle-berlin.de/>)。其中一位蹲踞在這裡超過十八年的獨立靈魂，洛赫穆勒的區長曹許(Zosch)，自從柏林統一後就一直在追尋他的夢想，一個具實驗性的藝術、生態、文化連結的生活方式。曹許和朋友在多年非法居住後，終於得到一張允許他們留在這裡的官方許可，至少可以留到二

○一二年。所有藝術家和行動者都可以來洛赫穆勒參觀、居住和工作，這裡最有名的就是夏日爵士嘉年華和生態實驗。夏天時，這兒的活動拖車群聚起來，好似一座大型遊戲場，但冬天時必得在拖車裡堆上足夠的柴薪才得以過冬（圖4.3）。

另外一個案例是位於前東柏林的「太陽屋」(Sonnenhaus)，這是一個自力營造的住宅計畫，靠著所謂的血汗產權(sweat-equity)和非營利組織的支持，購置、翻修了城市邊陲一隅一座年久失修的建築(<http://www.sonnenhaus-berlin.de>)。這座房子已不是房地產市場的標的物，前幾年這裡以生態手法被整修成跨世代公寓，裡頭有機咖啡店和店舖，一樓還有公共會議空間，其目標是為面對失業族群或新納粹分子等問題的社區，找尋另一個和平的出路和空間。圖4.4的廣場裡，柱子上的海報輪流為極右派的德國國家民主黨以及綠黨的宣傳。

ExRotaprint 合作住宅位於貧窮的西柏林威頂區(Wedding)，是前工業區進行社會文化再生，將私有空間開放出來的著名案例之一(<http://www.exrotaprint.de>)。歷經多年籌備，一小群藝術家在建築師和非營利組織的幫助之下，終於將這裡的歷史建築買下，而且將其永久從房地產市場移出。ExRotaprint 位於一個以移民和失業族群為主的社區，此計畫承諾長久提供空間給各種藝術、小生意、教育和文化提案，它重新取回Rotaprint 公司之前的印刷廠房，並加以修復，其建築別具一格，充滿各種可能性，加上位於社會邊緣區域，本該回應在地需求，故它本身既是美學，也是社會政治行動。(圖4.5)

目前柏林的空間再利用面臨最大的挑戰——同時也是珍貴的機會——就是騰柏爾霍夫機場(Flughafen Tempelhof)的改造(<http://www.berlin.de/flughafen-tempelhof/>)。這個市內機



圖 4.3
位於柏林特里布托區·洛
赫穆勒總體藝術社區的實
驗住宅。
(Michael LaFond攝)

場之所以有名乃是因為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間，西柏林地面遭蘇聯封鎖，美國和英國為了維持西柏林的物資供給，使用運輸機組成的「空橋」(Luftbrücke)空投食物和其他物資，即是利用這個機場。騰柏爾霍夫在二〇〇八年十月底停止營運，有些人樂觀認為這也是機場空間「開放」的契機。一九三〇年代騰柏爾霍夫建成時，其建築規模為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的五角大廈。這個空間被軍航和民航公司占據了一世紀的時間，過去幾乎不對外開放，還配備高度的安全警戒，現在人們期待把這裡開放出來給公眾使用。



圖 4.4
太陽屋和柏林特里布托區
的政治海報。
(Michael LaFond 攝)

因此，關於騰柏爾霍夫該由誰重新掌管、又該如何利用的討論正沸沸揚揚地進行著。因為目前沒有大型投資者接管機場，柏林市更加關注小型行動者如何涉入這個營造的過程，除了以往常見的密室協商，還向國際徵求意見並舉辦競圖，尋覓適合的空間再生提案。

id22 和柏林藝術與設計學院 (Berlin-Weißensee School of Design) 空間策略學程的學生¹²、柏林工程應用科學大學 (the Beuth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夏令營¹³，以及其他團體正一同推動機場的「開放」。空間策略學程 (RaumStrategien) 是個跨領域的碩士課程，結合了建築、規劃、公共藝術和其他創意領域，期望探究以文化為基礎的都市再利用和再發

12 見 <http://www.kh-berlin.de/index.php5?groupID=20&Action=showGroup&locale=en>

13 見 <http://www.summer-academy.architekten-tfh.de/>



圖 4.5
id22 的 Michael 和 Lena
與 ExRotaprint 的兩位藝
術家 Les 與 Daniela 進入
ExRotaprint 計畫的工作
室裡。
(Michael LaFond 攝)

展策略，特別是藝術和藝術家的發展可能。夏令營則是為期四週的密集課程，供來自柏林、紐約和其他地方的學生，學習永續設計和土地再利用的方法。

| 危機 + 實驗、文化研究 + 發展

城市實驗室從事對都市再發展的研究與支持，特別是針對柏林的「自由空間」。六年多來，隨著世界局勢變得更加艱辛，城市實驗室也提出新一波的實驗計畫。前述案例只是柏林創新地景的一小部分，目前還有數十個計畫正在進行，每個月也不斷出現新的計畫。雖然本文著重在都市空間再利用的「積極面」，但

也不能忘了柏林長久以來有一種對抗的傳統，例如抗拒可能導致繙紳化或公共空間私有化的都市更新和菁英式的空間生產。但這些以保存為初衷的抗爭，往往衍生出下一步行動的靈感，邁向更好的發展。

不過，歐洲、北美，和世界其他地方面臨城市萎縮或停滯的問題依舊，資本式的城市發展策略，包括評估、使用、再使用土地的方法，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在當前的危機下，我們看見其他更有效率、更公平、更吸引人的方法來組織自己。科技創新很重要，但更關鍵的是透過溝通與合作的過程營造地方感。透過這個實驗，文化上的永續規劃、以社區為主體的空間營造和新管理方式，將有機會誕生，克服對暴力和恐怖攻擊的恐懼。

即使我們的都市不再成長，低迷的經濟和異質的人口仍需要空間／地方營造的策略，來發展閒置空間。其目標在於選出這些空地、把握這些空屋所隱藏的機會，增加對非正式及民主方法的理解和支持。

雖然透過合作的方式來設計與管理我們自己的公園或家屋並不容易，但它是辦得到的，它提供我們貼近真實的研究和發展場域——一個從事城市永續再設計的踏板。最後，我們面對的不只是像紙類或寶特瓶回收這類生態的挑戰，更重要的是土地與建築能重新設計、保護自然資源、促進更多溝通與營造更多公共空間，在過程中表達自我，並一同打造永續文化。

參考書目

- LaFond, M. (1999) 'From Century 21 to Local Agenda 2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cal Urban Communities in East and West Berlin (Germany), and Seattle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2007) 'Experimental Homes', *EXBERLINER: The English-Language Paper for Berlin*, May: 14-16.
- (2008) 'Berlin Taipei Round Trip: eXperimentcity Meets Treasure Hill', *Umelec*, 1: 51-53.

5

東京・城市再生

營造都會建築的公共性

RE-CITY, TOKYO

PUTTING "PUBLICNESS" INTO
URBAN BUILDING STOCKS

饗庭伸、西田司——文

賴彥如——譯

自一九九〇年代晚期開始，「永續」這個名詞在日本都市規劃專業中，已經是個常用的關鍵字，而實現都市永續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建築再利用」，特別是在城市的老舊區域，透過改造、重整、更新現有的建築結構。一九九〇年代和二〇〇〇年代初期的日本正逢經濟不景氣，開發者和市民對於投資新屋興趣缺缺，「建築再利用」又再度成為市場經濟裡實際可行的選項。在某些案例裡，拆舊屋蓋新屋的花費和風險比直接利用舊有建物還高。經過眾多對可行與否的研究，好幾個舊建物再利用的計畫已開始動起來了。

不過，約莫在二〇〇五年，市場的努力和政府政策鬆綁開始漸漸發生效果，房地產景氣好轉。因此，舊建物再利用被暫擱一旁。經濟復甦首先發生在都市中心地價高的區域，然後才是週邊地區。除了備受矚目的再發展方案如六本木新城、神保

町三井大廈，各地也都有不少小型開發，相形之下老舊建物再利用就顯得不那麼突出。難道「建築再利用」已是末日黃花，衰敗經濟下「窮人」不得已的選擇？

要解釋舊建築再利用為何重要並不困難，它就像是古蹟保存與垃圾減量這類的全球環境議題一樣重要。不過要發展舊建物再利用的這個願景，卻充滿了挑戰。目前大多數的努力，還是把重點放在增加這些建物的「市場性」，而不是改善它們的「公共性」，例如提昇歷史價值、都市環境績效，以及市容的和諧。雖然「市場性」和「公共性」並不見得衝突，目前日本幾乎還是沒有出現成功整合兩者，以改造舊有建物的實例。我們（首都大學東京的團隊）從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七年針對東京都核心區域的建物再利用進行研究和實驗方案，即期望為再利用的建築注入公共性。本章呈現的就是這四年來的成果。

■ 目標區域：東京神田

我們選擇神田作為研究區域，主要是它因為東京市中心高度開發壓力，而同時面臨許多問題和機會。位於東京的下町，神田區是江戶時代（一六〇三—一八六七）商人、工匠聚居的地方，整個區域被切分成小塊，以便於建造小型的房子。但是整個神田區在關東大地震（一九二三）時被燒毀，後來將此區規劃成棋盤式的街道，為這裡帶來現代化。在這八十多年裡，神田成長為日本的中心商業區，各式新舊建築櫛次鱗比。

一覽神田區，說好聽點這裡的建築豐富多樣，但也有人認為這裡簡直一團糟。神田的土地使用密集，土地型態及建物高度決定了建築的樣態。這兒的空間樣貌之所以如此複雜，乃是由於這裡在地震後，為了城市重建能容易些，每個搭滿災民臨



時棚架的街區，內部都還發展出密集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因為這些暫時搭建的棚架，以至地震前原先的土地單元（原本大片土地被分割成小塊出租）依然保持不變，於是造成許多小面積土地的私人買賣。由於這個背景，加上路況良好，神田發展成東京都內高密度、高樓層的區域，不同面積大小的土地造成區內建築形式各異。（圖5.1）

■ 建築活化年代的都市設計手法

建築再利用的目的，是在不拆除的前提下，更新、重新使用現有的建物（Aoki，2001；Matsumura等，2007；Kobayashi等，2008）。目前一般建築的重建、活化和更新常常是各自為政，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都市設計手法，來幫助管理並

圖5.1
神田鳥瞰圖（使用3D-GIS
繪製）。
（圖片來源：
饗庭伸、西田司）



圖 5.2
社區工作坊一景。
(饗庭伸攝)

整合舊建物的再利用？這邊要特別說明：通常日本的建設活動都是由私營公司、公家單位、或個人獨立進行，而都市設計是要從城市整體的觀點來指導、統合，以提升建設的品質，但該怎麼做呢？在這個計劃中，我們將過程分成四個階段：

▶ 1. 資訊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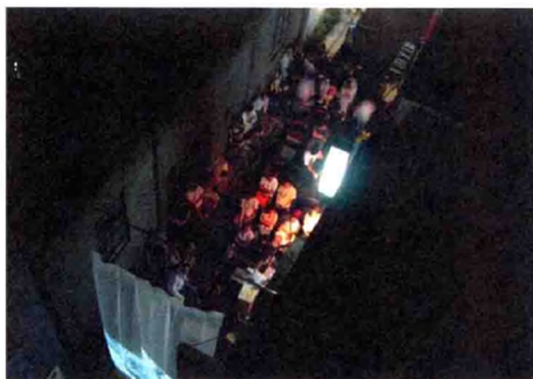
進行規劃之前，首先必須要了解區域中建築物的狀態，分析它們之於城市的功能，並與居民分享這些資訊。

▶ 2. 空間圖像和財務資訊的分享

大部分的建築物都屬私人所有，而意識的提昇需要花費許多精神和時間。光是一般資訊的分享，並不足以觸發市民的建設活動，還需要提供給市民更多詳細的資料，像是空間的圖像和財務分析。

▶ 3. 個案建造

當第二階段引發了各式活動，就來到第三階段。例如某些建物的空調需要更換，還得改善周遭的都市環境；另一些建物則要改變使用方式，以和周圍地區取得更好的平衡。都市規劃者必須針對這些建設活動提供建議或做出調整。



► 4. 建設的評估和回饋

第四個階段是評估和回饋，從地區的觀點重新評估每個建設活動，來看整體區域的表現是否進步，以及這些建設活動應該如何進行。重複第二、三、四階段將可以生產更多協調性強的城市空間。

■ 神田區的實驗

計畫的第一步，我們調查了神田區的建物以確實了解這些建物的狀態，並收集每棟建物地震風險的資料。之後我們舉辦了工作坊，和市民分享資訊，同時也向市民說明現有建物若經

圖5.3
街道再生：將街道巷弄轉化成活躍的社交空間。
(西田司攝)



過整修和短期計畫注入，將能夠為都市開創寶貴的空間¹。

► 地震危險性的訊息分享

我們印製了神田區的各種地圖，包括：地震圖、基地年代、預估的地震強度、不同建物的分布圖、建築年代、外牆材料分

1 這個計畫是首都大學東京的建築與營造工程學系「都會地區建物活化再生之科技發展」研究計畫的一部分，該計畫是由日本中央政府教育、文化、運動、科學與科技部（MEXT）名為「打造世界級的研究教育基地指標計畫（卓越中心，也叫COE）」所補助。本計畫另一部分的經費則是由住宅總和研究財團（Housing Research Foundation, HRF）提供。（詳見<http://www.comptmu.ac.jp/4-met/il/>）

圖 5.4
空地+：將注意力帶到舊建築的立面，將街角轉化成活躍的公共空間。（西田司攝影）

布圖，以及道路障礙的模擬圖。我們也發行了一本手冊，以簡易的方式呈現相關資訊。我們還舉辦工作坊，向神田區的居民協會說明手冊內容（圖 5.2），簡報舉行的地點正好地況良好、建物穩固，參加簡報會的居民似乎也對他們的地區和建物感到十分驕傲。

► 空間圖像和財務資訊的分享

我們蒐集、分析了每棟建物的資料，並彙報給居民之後，緊接而來的問題是：「這些努力如何改變都市？」、「這些資訊將如何促成建物再利用？」我們所分享的資訊可能某種程度使居民的意識有所轉化，但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居民意識，並付諸實際的行動，真正進行空間的利用。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一般資訊分享的階段，進到空間圖像及財務資訊分享的階段。

神田大部分的建物都是私人擁有的，因此要改變建物需要耗費極大的精力。我們從稍微不同的角度著手，透過社會實驗，稍微改造介於私有與公共之間的空間，營造一個新的「空間圖像」。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們舉辦了三場學生工作坊：

1. 「街道再生」(Re-Street)。首先，我們舉辦了一個叫做「街道再生」的工作坊，來研究現有建物之間的小巷。在概念發想及與在地居民溝通之後，學生們決定實行一個行動方案，把小巷鋪滿木板、舉辦兒童工作坊以及巷弄電影院（圖 5.3）。巷弄間的橫條木板勾起不少人的懷舊情感。學生們邀請許多不曾在巷弄裡玩耍的小孩來參與，把畫布掛在巷弄裡，大人也很高興看到他們的孩子樂在其中。很多人發現大型畫布可以用來暫封巷道以舉辦活動，也在影片放映活

動裡認識了街區的歷史。這個活動顯示，即使只是一點點的改變，巷道也能變成精彩的都市空間，上演有趣的事件。

2. 「空地+」(Kuuchi+)。接下來的工作坊叫做「空地+」，著眼在現有建物周圍的空地。學生和居民討論之後，進行三組行動計畫(圖5.4)，包括組織一些臨時活動等。

第一個計畫是「看板建築的看板」，在一條高樓之間巷道狀的空地，舉辦舊神田區的建築展覽。所謂「看板建築」指的是關東大地震後蓋的商用建物，為了防火在立面加上門牌裝飾，看起來很像招牌。這些等比放大的建物照被裝設於夾在兩棟建築之間的開放空間，呈現了城鎮的過往。這個方案有兩層意義：第一，這些看板再現了神田時代藝術的重生與魅力。第二，這些看板展現了公共開放空間裡頭，現有建築外牆可以如何利用。

第二個計畫「條板學院」(Batten School)，是利用體育館前一片空地作為試驗點，四十年前這裡是一所小學。這個計畫是要創建一所夜校，總共有九位講師，教授與神田傳統相關的「人物」、「歷史」、「技術」三個科目。此區依然瀰漫著當代人早已遺忘的溫暖及歷史感。當我們一邊介紹這個學院時，神田的部分面貌也逐漸明朗。

第三個計畫「足浴咖啡館」，是利用一棟建物前方的花園空地來做足浴。這裡雖被稱為咖啡館，但還比較像是美食廣場，人們可以從附近的速食店、路邊攤和書報攤買到食物和飲料，然後把鞋脫了享受足浴。這個計畫大獲好評，很多人在每天營業時間都固定來報到。

3. 「町奧」(Machi-oku)。最後一個工作坊「町奧」是在現有建物的屋頂舉辦，學生們進行了兩個計畫(圖5.5)。屋頂



是建物距離街道最遠的部分，通常只會用來當儲藏空間，這個工作坊則展現了屋頂作為公共開放空間的可能性。第一個計畫是「屋頂電影院」，提出一種享用屋頂、神田區和都市景觀的新方法，學生們把光和影像投影在鄰近的建物上，將它們轉化為另類的銀幕。屋頂上的投影令人嘖嘖稱奇，孩童追著這些光影跑，左鄰右舍則一起舉行盛宴。第二個計畫則是個稀奇古怪的裝置叫做「屋頂洗衣房」，用直徑十五公釐的金屬棒做成晒衣架，它們被彎曲、焊接、上漆，好用來吊掛T恤。大量吊掛著的T恤隨著風的吹拂，不斷改變屋頂上的風景，微風展現市中心地表難得一見的舒適自然景象。那個禮拜有超過一百二十人前來參觀，這個活動提供人們機會，體驗屋頂上精彩非凡的空

圖 5.5
町奧。(西田司攝)



圖 5.6
整修過後的樓梯間和屋頂的表演。
(西田司攝)

間，和日常「地面」生活截然不同。

讓我們思考一下這三個工作坊之間的關聯。巷弄只是都市空間的一部分，人們可以隨時出入，但是建築物內的閒置空間卻如同禁區。舉個例子：我們必須先穿過建築物才能抵達屋頂。這一系列的工作坊首先是在建物之外舉辦，之後才往建物內移動。換句話說，我們從街道開始逐漸挪移到建物裡，來檢視再利用私有建物作為公共用途的可能性。

町奧在屋齡二十年的辦公大樓屋頂上舉行，這個實驗能完美達成，不只是辦了工作坊，還有建築物本身的活化與再生。本文開頭我們談及以「公共性」為建物再利用的目標，而這個計畫正是條出路。在這個案例裡，該建築物的屋主也是神田的居民，工作團隊之前曾在神田舉辦工作坊，簡報地震危險性的資訊，一段時日後，這位屋主跟我們聯繫，希望為大樓做個耐震診斷並翻修大樓（之前都作為商用），開放給居民，以符合他個人對未來生活的規劃。

經由耐震診斷確認這棟大樓有足夠的抗震能力之後，整修工作就開始了。大樓裡有兩處尤其需要整理：一是屋主的居住空間，二是樓梯間和屋頂。此外，大樓裡還有出租辦公室，屋主想要打造吸引租戶的樓梯間以提高承租率，還要在屋頂上創造一個半公共的開放空間，讓社區居民都可以從樓梯爬到屋頂上來。

我們更換燈具和牆壁材料，翻修樓梯間和屋頂，然後邀請一位藝術家在樓梯間和屋頂展示他的插畫。配合這些展示，我們舉辦了活動，藝術家的朋友還來樓梯間表演音樂，到屋頂上表演現代舞（圖 5.6），這些表演以各種不同方式呈現，有些和

作品有關，有些以作品作為背景。藝術家的作品，強調樓梯作為人和表演的媒介。在町奧工作坊期間，藝術家和學生認真討論如何利用屋主的頂樓，充分實踐這個計畫的原意。從那時起，許多市民紛紛前來參觀樓梯和屋頂。這雖然只是個小計畫，卻在建物再利用公共化的一事上別具意義。在推動都市建物的再利用中，有必要先讓許多人對這種計畫起共鳴，進而發展出類似的方法，來利用他們自己的屋子。

■ 結論：建物的活化與再生

以建築的再利用來創造都市空間，不應該只把注意力放在建物的「市場性」，也要同時注重提升建物「公共性」的方法。在這個為期四年的計畫裡，我們首先對東京神田區的建物做了仔細調查，然後向市民報告所獲的資訊，讓他們知道這個地區每棟建築物的重要性。接著我們舉辦社會實驗性質的工作坊，向市民展現即使只是小小改變，也可以成就一個美好的公共都市空間；如何透過建築物公共性的提升，增進區域和城市的價值。這個計畫只是個開始，它幫助我們想像出更多元更豐富的方法，透過現有建築的再利用，進而活化都市的公私領域。

參考書目

- Aoki, S. (2001) *Refine Architecture: Shigeru Aoki Complete Works*. Tokyo: Kenchiku Shiryo Kenkyusya.
- Kobayashi, K., Mitamura, T., Kitsutaka, Y., and Toriumi, M. (2008) *Architectural Conversions in the World*. Tokyo: Kajima Institute.
- Matsumura, S., Shinbori, M., Seike, T., Satoh, K., Wakiyama, Y., and Tsunoda, M. (2007) *How to Lead Building Regeneration: Building Engineering Primer in Stock Age*. Tokyo: Ichigaya.

6

在私人住家裡營造的
新公共領域MACHIZUKURI HOUSE
AND ITS EXPANDING
NETWORKMAKING A NEW PUBLIC REALM
IN PRIVATE HOMES

林泰義——文

施佩吟——譯

在日本，所謂「社區營造之家」(Machizukuri houses)是一類以社區為基礎的非營利組織，它們的發展主要是透過許多參與式的活動，來不斷累積。這種現象的出現，可以說是始於六〇及七〇年代的基進主義及市民行動主義下社區營造運動的結果。一直到二〇〇〇年初起，或可推到更早以前，許多像這樣的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頭來。社區營造之家的活動擴散的同時，適逢日本「新公共」(new public)概念的浮現，對地方社區累積社會資本來說，產生推波助瀾的效用。

本文以世田谷地區——一個位於東京都西邊歷史悠久的住宅區為例，說明社區營造對社區的重要性。究竟，這些以社

區為基礎的非營利組織，如何轉化社區中公共領域的主張？故事就從九〇年代以後，在世田谷發生的幾個關鍵的社區營造案例說起。

■ 社區營造在日本：九〇年代以後的擴張和轉變

「社區營造」(即町造)，最早由市民用來描述他們改善社區鄰里環境的努力，現在已成了日本的一個常用詞。六〇年代，市民活動倡議者以社區營造這個概念，來動員群眾、抵抗那些由政府 and 財團聯手推動的開發案。到了七〇年代，它成為進步的專業者和創新的地方政府用來鼓勵市民參與地方規劃的方法。神戶的真野與丸山地區，以及名古屋的榮東地區便是這類的案例，他們是集結市民共同提出鄰里改善計畫，實踐地區環境改造的先驅者。在此之後，許多地方政府漸漸開始接受這種做法，並執行這些經過市民參與而形成的提案。

日本的社區營造到了八〇年代以後，開始遍地生根。社區營造專業逐漸成形，各式各樣的方法被不斷實驗。從無到有，參與式的工作坊也開始普遍起來。「社區營造工作坊」的方法，轉化了日本傳統以來「垂直化」的人際關係，朝向「水平式」(或對話式的)的發展，這種前所未有的突破，帶出了許多社會新的可能性。工作坊的形式至今已被日本社會廣泛接受，進而使社區營造開展成為全國性的活動。

日本中央政府在八〇年代引進了「細部計畫系統」的做法，這是一個以民眾參與的方式，將基礎設施整備和細部計畫整併在一起的市區計畫體制。為了使具有質感的小區域環境可

1 借鏡於日本推動社區營造的運動，南韓、台灣也陸續浮現相似的概念。

以形成，這個系統賦予地方政府額外的權力，用以落實社區規劃。回應社區營造的普及化趨勢，有些地方政府在細部計畫系統之外，還特別訂定了社區發展條例。以神戶市和世田谷地區為例，就是因為有了自訂的社區營造條例，鄰里規模的社區空間可以以市民參與的方式進行規劃，影響所及，鼓舞其他地方行政區也加以仿效，陸續創生出了更多相似的實驗案例。此後，由各種基金、地方政府和政府機關所支持的不同獨立系統，以多元化的社區營造面貌展現在世人眼前。儘管如此，至目前為止，日本政府仍未制定綜合性的基本法來支持社區營造。然而，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也正是因為沒有法定上的實質規範，各種多元的社群團體才能有彈性的提供各種服務，讓市民從中參酌選擇。

九〇年代發生了兩個全國性的事件，關鍵性的促成社區營造運動如野火遼遠般蔓延。首先，一九九四年，上百位的市民和專業者，因為對於參與式規劃的共同興趣，聚集於河北町，一個位於高知市的小鎮，參與「ワクワク全國工作坊會議」。兩年後，第二次的活動於北九州舉行，聚集了全國各地上千人的參與。這兩場活動是劃時代的里程碑，社區營造和工作坊的方法此後在各地推展開來。

這股運動的流行反映了日本當時社區危機感的浮現，包括全球經濟力量的滲透，所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自九〇年代以後，「社區營造」被廣泛的用來描述各種為了重建地方社區鏈結的市民活動。社區營造的概念可以廣義的來理解，包括，社會福利、健康、運動、文化、公共關係、資訊服務、歷史保存、環境保護、小型的鄰里商業活動、無住屋問題和社區再生等。

在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以後²，從日本各地蜂擁而來，超過一百萬的志工集結起來協助受災者重建家園。這個現象對於日本社會來說產生了一個極大的衝擊。它激發了活躍的市民運動，從而促使國會於一九九八年制訂「非營利組織法」。這個法案正式認可了非營利組織（NPO）的地位，為社會帶來了重要的改革。二〇〇九年秋天，估計日本全國有三萬八千八百個非營利組織，從事各式各樣的活動。其中大約有百分之四十將「社區營造」登記為活動項目之一。

自從政府失敗的經濟政策導致八〇年代的經濟泡沫化，以及九〇年代持續性的金融蕭條，日本民眾的意識已從依賴大政府的思維，轉向市民社會和公部門的合夥模式。九〇年代期間，行政改革和權力分配仍在進行當中。從二〇〇〇年起，政府瘦身的政策加速了NPO、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合作。社會福利領域中的「醫療保險制度」（Care Insurance System）的提出促進了NPO的參與，便是其中一個案例。約有百分之六十的NPO將社會福利做為工作任務的一部分。除了中央政府以外，地方政府也將NPO採列為可承接計畫業務的承辦單位。有關政府和NPO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掀起了激烈討論。

隨著NPO數量的成長，有越來越多的基金會及私人企業，提供NPO從事社區營造活動的相關支援。這些支援計畫逐漸帶動民眾和社區營造工作者的參與，以及組織的獨立運作。有了NPO法、社會改革及來自民間基金會和企業的支持，公民倡議的理念在九〇年代以後逐漸廣為接受。發展所及，皆促成社區營造活動在日本各地的成長。

2 阪神、淡路大震災（又名神戶大地震）發生於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將近有六四三四人死亡，三十萬人因此流離失所。

表 6.1 社區營造和法制化都市計畫的比較表

社區營造	Vs.	法制化都市計畫
市民治理	Vs.	依法行政
以社區為基礎	Vs.	單獨個體
人性本善	Vs.	人性本惡
多數非專業者	Vs.	專業技術者取向
水平化，優先考慮社區	Vs.	垂直化，優先考慮專家
由下而上	Vs.	由上而下
案例法則和協議	Vs.	強迫管制
普通法	Vs.	成文法
漸進主義	Vs.	結構主義
具原創性	Vs.	跟隨慣例
透明化、慎重的	Vs.	合理公平的
個人主義、彈性的	Vs.	標準化、硬性的
開放而率直的	Vs.	封閉的
主張朝向最高的	Vs.	傾向保障最低的
採取綜合方法	Vs.	採取分析方法
市民的倡議	Vs.	市民參與

資料來源：西村幸夫等，(2005)。

在過去將近半世紀以來，社區營造的特色已經趨於明顯。社區營造不是一個由法制系統所推動而成的運動，而是市民為了改善日常的生活和環境所從事的活動集成。反觀，擁有近百年發展歷史的日本都市規劃實踐，卻是由專業者和政府官僚所建構的體制。社區營造的特殊性可以在這兩種體系之中被清楚的看見。關於這份比較，可以參考由西村幸夫(2005)所整理的表 6.1。

I 世田谷的社區營造發展

東京都會地區目前擁有將近三千萬的人口，世田谷位於東京的西南方，是東京二十三個行政區之一，人口數約有八十萬人。世田谷的西南區長久以來是以中老年人口為主的中產階級住宅區。世田谷的東北區，由於是地震和火災經常發生的風險地區，屬於相對高密度的集合式出租住宅區，人口以年輕的白領勞工及大專院校的學生族群為主。六〇年代以後，世田谷陸續出現各式各樣的市民活動。八〇年代時期，世田谷區政府制訂了社區營造條例，並設立了都市設計部門。透過不同的工作坊及參與式設計的方法，許多小型公園和社區街道的專案計畫，成為了社區營造的實驗場。

因為有了八〇年代末的參與式規劃的經驗，區政府在一九九二年提出了「社區營造中心計畫」，此外，還創設了社區營造基金來支持相關的活動，由督導委員會來監督基金的運用。社區營造中心的設立，主要是為了支援參與式規劃的操作，中心主要由具有德國與美國經驗的專家們經營管理，他們研究並實際體驗過該地的都市設計和民眾參與。中心提供市民許多機會，去研究工作坊的操作模式，以及參與社區設施的設計。

為了鼓勵在地的市民積極倡議，社區營造中心運用這筆基金，主持「提案徵求計畫」。提案/開放競圖徵件的方法自此以後在全國廣為流傳，成功為市民打開了一扇可以提出自己願景的機會之窗。這個計畫下的財務支持體系，和階層化的政府行政體系有很顯著的不同。每年在世田谷約有二十個提案受到支持，每一個提案都可以得到連續三年的資金贊助。一般來說，有一半的組織縱使贊助結束後，相關活動仍會持續；這個計畫

圖 6.1
玉川日照之家。
(林泰義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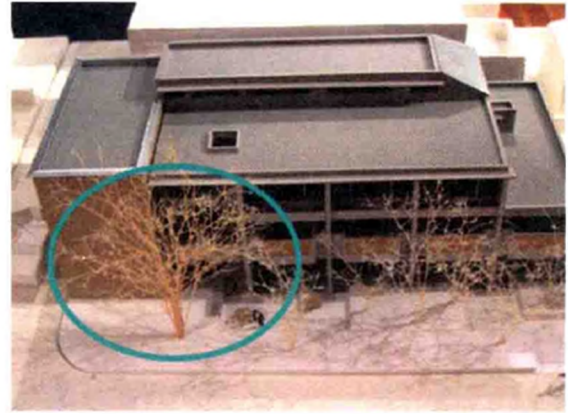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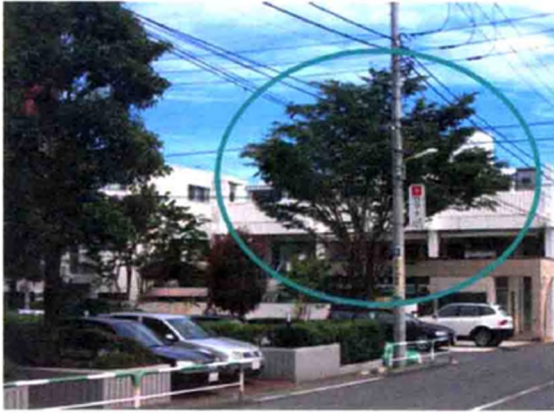


成立推動以來，大約有一百八十個組織持續進行活動。這些活動連帶發展出聯繫區域內外豐富的社會網絡。不只是如此，透過參與式的專案計畫，專業者彼此間也產生了聯繫，在世田谷地區形成綿密交織的社會和專業者網絡。

隨著社區營造活動的擴張，人與人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也因為各式各樣的網絡關係而相互受惠。這種網絡關係也就是所謂的「社會資本」。進一步，網絡關係所形塑的社會資本，擴大了日本人對「公共領域」的概念。接下來，我會以玉川社區營造之家，說明活躍的活動與網絡對於日本社區層次的公共領域概念所發揮的影響。

■ 玉川社區營造之家

玉川社區營造之家（Tamagawa Machizukuri House；以下簡稱TMH）是一九九一年的春天，由三位專長於社區設計



的專業者所成立，他們同時也是世田谷玉川地區的居民。玉川市是一個擁有二十萬居民的住宅區。過去十五年來，TMH 聚焦在其所在約九百戶的鄰里社區。這個社區過去是一個東京標準的中高收入戶為主的住宅區。九〇年代初期，許多房地產開發商開始投資購屋，並細分產權後轉手。由於建地尺度以及綠地的萎縮，社區鄰里的環境品質很快地惡化；惡化後的社區環境引起了在地居民的關注。TMH 成立的使命就是要維護鄰里生活環境品質，增進社區福利。

首先，TMH 的第一項工作是從事一處小公園的居民參與式設計（1992-1994），並在過程中促成一個市民志工組織來維護管理公園。隨後，TMH 將社區的一處市有地打造成為社區園圃（1992-1998）；並在同一地點上，促使市政府以市民參與設計的方式建造了一所日間照護中心（1995-1998），並促成志工組織來支持日間照護中心的運作（1998-）。

同時，為了防止地產開發商細分產權後買賣投資的行為，TMH 透過舉辦市民會議討論生活環境的種種議題（1997）。會議中制定了對土地使用的建議及地區建築的管制規則，並將相

左 | 圖 6.2

在綠色共用地的構想中，在地居民希望保存這棵櫟樹（見圈選處）。（林泰義攝）

右 | 圖 6.3

綠色共有地發展的模型，新計畫把樹木（見圈選處）重新植栽於路旁廣場。（林泰義攝）

關成果提交給市政府。市府辦公室不久之後便在都市計畫法的基礎上採納了此提案作為地區計畫（2000）。一九九五年，TMH為了幫助阪神、淡路大震災的重建工作，決定將活動延長至一九九九年；同時間參與了推動將NPO法引進日本的運動。這個法案於一九九八年正式生效，而TMH於二〇〇〇年時也因此被認可為一個非營利組織（NPO）。接下來我挑選了一些專案計畫，進一步說明像TMH這樣的非營利組織，如何擴張日本社區層級公共領域的概念與實踐。

► 玉川日照之家 Day Home Tamagawa

玉川日照之家（1998-）（圖 6.1）是由地方政府透過市民參與所發展出來的社會福利設施。這個空間不僅只是提供銀髮族日間照護的功能，其他一般市民活動也可以使用。一樓的空間給市民活動使用，玉川社區營造之家每年春天會在這裡舉辦義賣活動（2005-），收集家庭不需要用到的二手餐具、飾品及書籍等資源，義賣資金即用來支付TMH經營管理的一部分費用。活動一方面提供地方居民彼此之間資訊交流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協助綠色公地基金的募款活動（參見下文）。這些活動有助於將一般的社會福利設施，轉化成為社區的新公共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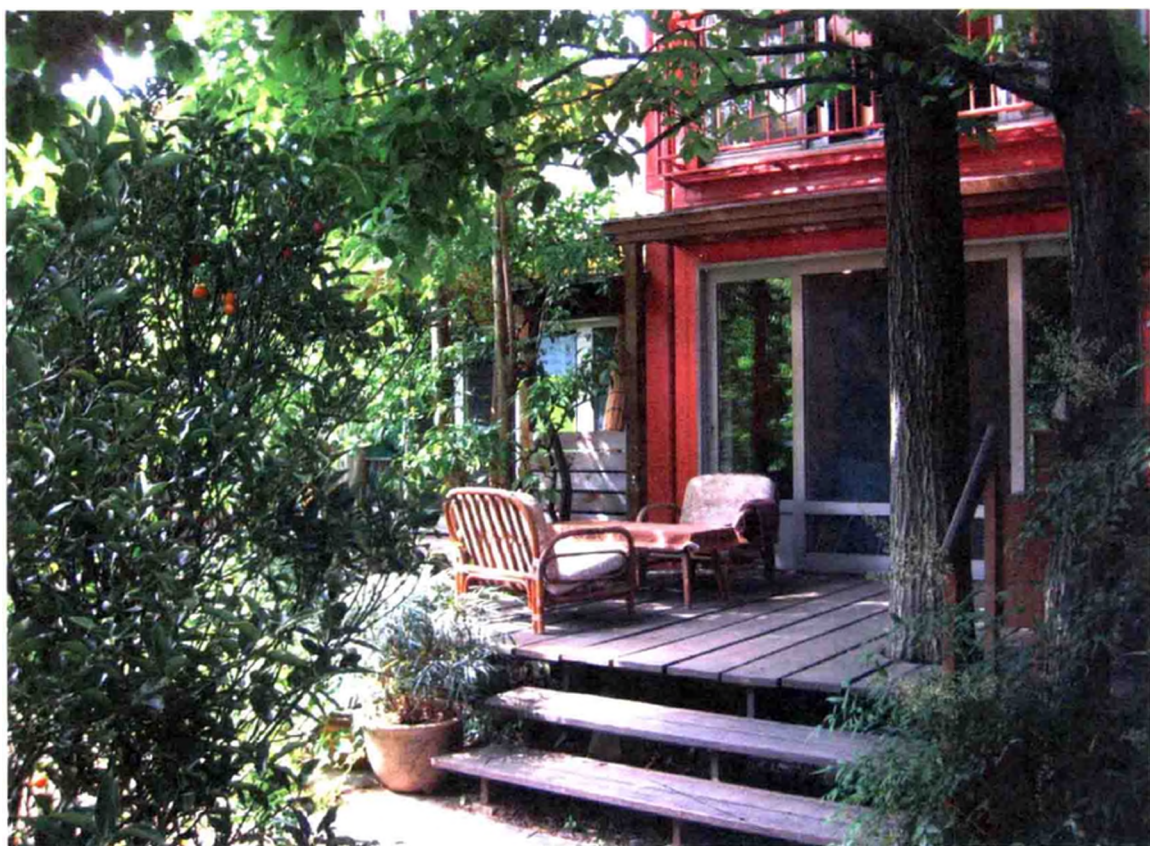
► 宮本三郎紀念美術館 Saburo Miyamoto Museum

二〇〇三年，TMH參與了世田谷藝術博物館的附屬建築物——宮本三郎紀念美術館的設計，美術館的設計就是透過地方社區的參與而完成的。在過程裡，TMH協助博物館拓展社區的網絡，以及幫忙博物館協調並落實相關市民的提案。以其中一個提案為例，社區裡的古典音樂愛好者於二〇〇七年組成

了一個歐洲歌劇音樂俱樂部，並主辦過幾場活動，除了社區內的成員，外地民眾也前來參加。透過參與，博物館本身成為提供多元文化活動的新公共場域。除了個案式的專案計畫外，博物館也支持社區鄰里團體舉辦會議。社區網絡擴張提供更多社區營造衍生的機會。

▶ 綠色共有地計畫 Green Commons

TMH於二〇〇七年開啟了「綠色共有地」的活動。這個計畫始於保存社區中一處被地產開發商買下的土地所做的努力。八年來，在這裡已有八十棟房子被重建，在日本現有體制下，一旦土地財產被賣掉或是要進行重建，基地上的樹木往往會被砍掉。這個保存活動一開始是為了拯救一棵位於即將開發基地上的櫟樹而進行的努力。在地居民將櫟樹視為記憶的一部分（圖6.2），於是，居民聚會討論，認為應該改變地產變賣後砍樹進行開發的陋習。為了要實踐這個願景，居民進行募款活動，創立社區的「綠色公地」基金，目的在於保存二十公頃私有土地上的樹群。這筆基金在居民、原地主及開發商之間的協作機制下，被運用於樹木保存的工作。隨著這個計畫的開始，該開發商成為TMH的成員之一，也對募款做出了貢獻。後來他們發表了舊建築物改建的修訂計畫，按照這個新計畫，樹木將會被移植到緊鄰道路的廣場，獲得保存（圖6.3）。由於「綠色共有地」計畫的關係，TMH目前正在發展「庭園樹共有」的構想，目標是設計一套辦法，讓居民所珍愛的庭園樹木成為社區的公共財。



► 社區緣側咖啡座 Community Café Engawa

TMH的第三類工作主要致力於打開鄰里內的私人空間，為社區創造小型的聚會場所，我們稱之為「社區緣側咖啡座」（圖6.4）。「緣側」是傳統日式房子的開放式露台，是人們輕鬆自在休憩聊天的地方。在這個計畫中，TMH在組織的所在地，搭建一個木平台和室內的咖啡廳相連著，平台成為社區活動的場所，許多非營利組織甚至喜歡將它充作會議空間。舉例來說，世田谷市的非營利組織網絡會議就是在這裡舉辦的。更常

圖 6.4
社區緣側咖啡座一隅。
（林泰義攝）



圖 6.5
在「美甘」閱讀會館，地
方的婦女團體聚在一起從
事工藝活動。
(林茶義攝)

發生的是，咖啡座提供社區民眾安靜的聚會空間。有了社區緣側咖啡座的前例之後，二〇〇六年，鄰近一間叫做美甘（Mi-kamo）的書店將租來的房子開放給社區使用，將它稱為「美甘閱讀會館」，讓喜歡閱讀和分享彼此興趣的社區居民使用。書店的安靜環境讓民眾和訪客有一個放鬆且往往可以滿載而歸的時光（圖 6.5），同時也成為社區裡小型的聚會之所。為突破私人空間的使用限制，世田谷社區營造中心成立了一個「智慧和實踐小組」，來推動私有空間的保存與再利用。

■ 社區資產和新公共領域的開創

在日本社會的觀點裡，「公共領域」指涉的是公家行政機關所擁有、興建或管理的公共設施。在歷經了社區營造過程以後，新的公共領域型態正透過兩種機制出現：第一種型態是透過市民參與及共識，將現有政府管理的空間轉化為由市民共同管理與使用的「共用財」（common properties）；第二種則是

鼓勵市民和企業自行採取行動，將他們私有的空間開放出來和社區分享。在前述的兩種情形中，市民行動都扮演了開創「新公共」不可獲缺的角色，也成為社區營造的重要目標。

從玉川市的案例中我們看到，社區營造是一個可以創造社區聚會場所和「共用財」的活動。在這裡，市民們可以悠遊其境，並自在的與人交流。這些活動不僅形塑出社區內的網絡，同時也 and 外界產生聯繫。社區營造運用了市民手邊的既有資源去改善環境，解決他們日常生活中面臨的問題。這些成果不僅對硬體的環境有貢獻，另一方面也成為當地的社會資產。舉例來說，小公園的參與式設計，除了改善鄰里空間的設計與使用，還刺激孩童的創造力與對空間權屬的感知力。這些小型計畫推動的過程，建立了社區裡的新網絡，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成果。這些新開創的網絡關係可以培養民眾具有承擔更多活動和發聲的能力。參與活動及倡議行列的民眾可能因此發展彼此的社會關係與互信，而後提高合作的可能性。有別於傳統的鄰里社區，連結這些擁有不同專業知識與資源的族群，將對他們在做的事有所幫助。這些源於地方的網絡、關係和資產，就是社區的力量。

參考書目

- Nihimura, Y., Minohara, K., Kubota, H., Isikawa, M., Kitazawa, T., Murosaka, Y., Hayashi, Y., and Jinnai, H. (2005) *Cities as Public Space*. Tokyo: Iwanami Press.

7

西雅圖夜（市）未眠

搞活動與公共空間的再造

“NIGHT MARKET”
IN SEATTLECOMMUNITY EVENTSCAP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JEFFREY HOU 侯志仁 —— 文

賴彥如 —— 譯

從小吃、盜版商品到街頭表演，無論是台北、香港、曼谷、孟買或首爾，夜市是亞洲城市熙攘都市生活裡的關鍵元素¹。以台北出名的士林夜市為例，街道攤販把原本的住宅道路變成了蔓生的戶外市集，各式小吃、異國美食、服飾、玩具、小玩意和飾品令人目不暇給，將整個街道擠得水洩不通。每晚數以萬計的遊客、購物者、觀光客和小販搭地鐵、開車、騎機車或走路來到這兒。肉包和烤香腸的香味，與擴音器傳來的叫賣聲與舞曲混雜在一起。在這裡，青少年、大學生、一家大小、外國觀

1 夜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八、九世紀中國晚唐時期。現今的夜市在華裔群聚的國家特別受歡迎，像是新加坡、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Yu 2004）；墨西哥、土耳其，甚至法國也有夜市的存在（Jordan 等，2004）。和其他種類的市集比起來，夜市更具休閒、觀光導向（Wu 2005）。

光客和外籍勞工，彼此摩肩擦踵，從這一攤走到下一攤。

有著廉價的食物和商品，夜市傳統上是勞動階級的聚集地，尤其是大城市裡生活必須量入為出的移工（Yu 2004）。就像其他類型的市集，夜市為小本生意提供了賺錢的機會，同時也是地方經濟的重要環節²。由於在夜晚營業，像士林夜市這般的夜市空間，使得都市的社交、商業生活，延伸到「正規」營業時間之外。同時，透過占據原為其他用途的街道，夜市在規律的都市裡創造出「鬆空間（loose space）」（Frank與Stevens 2007）。作為事件與活動，夜市具現了所謂的「暫時性都市主義」（temporary urbanism），挑戰傳統都市規劃的思維（Temel 2006）。

基於夜市本身流動的性質，它們長久以來都被視為是一種晦澀、甚至是有問題的公共空間。雖然夜市一直是地方流行文化的重要部分，它們的存在長久以來卻一直被邊緣化（Yu 2004）。夜市的攤販常被指為製造交通堵塞、噪音和衛生問題，而且占據公有地。基於這些亂象，夜市攤販經常遭地方政府取締。夜市的非正式性與暫時性，挑戰了法規的執行以及一般對公共空間的定義，它的暫時性對抗著公共空間與永久性的連結。在台北的士林夜市，上百個小販占據了狹窄的住宅街道，但當警察現身開單時，又神奇的瞬間消失。這齣戲每晚上演了數回合，也成了士林夜市特殊的景觀與經驗。

儘管在制度上被邊緣化，夜市在亞洲卻十分受歡迎。在台北，傳統菜市場早已不敵有著涼爽空調的大賣場、超市與便利商店，但相對的，夜市卻依然興盛。在這裡，大部分小吃攤賣

2 見Brown（2006）。街道和公共空間對許多人的生活至為重要，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的還是傳統地方美食，不過跨國企業麥當勞與肯德基也摻了一腳。由於夜市的高知名度與特殊的文化氣息，近年來它們被行銷成國際知名景點；儘管如此，它們還是具備跨越公共與私有、暫時與永久、正式與非正式兩者間的過渡特性。其中各種流動、衍生的活動挑戰了既有的時空疆界，它們本質上就是所謂「爭議性的地景」(contested landscape)，不斷上演著各種權力、空間、活動及意義的協商，也提供了一種反叛的可能——以個人的力量，改變傳統以來對公共空間的想像、生產與利用。

■ 夜市在美國？

近年來，北美西岸幾個城市也出現了夜市，顯現了亞裔人口在北美洲的成長所帶來的影響。然而，這裡的夜市不像亞洲的夜市僅是受歡迎的休閒商業活動，它們還被當成是社區營造與活化的工具。一九八九年一場地震摧毀了舊金山的市區公路，導致大量觀光客和商業活動流失之後，夜市活動被規劃為重振華埠社區的活動。舊金山的華埠夜市位於花園角廣場 (Portsmouth Square)，夏秋夜晚原本空蕩的公園搖身一變，成為熱鬧的市集與適合闔家娛樂的場所。在加拿大，溫哥華的老中國城，為了重振社區商業，在奇化街 (Keefer Street) 上，夏日每週末的晚上也都有夜市，標榜著亞洲傳統手工藝品、流行小物和風味小吃，夜市成為當地一系列活化地方的節慶活動之一，包括農曆年的遊行與端午節的慶祝活動，試圖吸引被郊區亞裔賣場拉走的消費及觀光人潮。

北美的最大夜市就出現在郊區，這反映了新移民人口的習性。在英屬哥倫比亞省的列治文市，有超過一半的居民都是一

九九七年之前，從香港來的移民。夏季的時候，數以千計的觀光客、居民及攤販湧入位於工業區的夜市。他們來這裡吃東西、購物與遊玩，在這裡他們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亞洲飲食與商品。列治文夜市不僅吸引了亞裔移民，也吸引了加拿大當地的白人，市政府甚至在這裡設了一個資訊站。因為有著不同族裔背景的小販與觀光客，頗負盛名的列治文夜市具現了加拿大都市人口轉變和多元文化的成長。

從舊金山、溫哥華，到列治文市，夜市作為一種族裔活動，轉化了美國城市傳統上利用與創造公共空間的方式。在舊金山，夜市將公園轉化成臨時的市集，挑戰美國公園長久以來被理解及制度化的方式³；在溫哥華，夜市將華埠的商業活動由商店拓展到街道，反轉都市場景裡，商業活動被侷限在建築物內的作法；而列治文市的夜市則將原本水岸的工業區改造成後工業、多元文化的事件地景。

■ 西雅圖的夜市

西雅圖的華埠／國際區和舊金山及溫哥華的中國城有很多相似之處。在西雅圖，以夜市來活化地方的想法已醞釀許久，社區組織工作者也把鄰近的溫哥華和列治文市的夜市當成是社區經濟發展的成功案例。二〇〇六年，夜市終於出現在華埠中心的慶喜公園，但推動此次活動的主力並非是經濟利益，而是企圖藉夜市來活化社區公園和開放空間，解決一般市中心公園所面臨的犯罪與治安的問題（Bedard 2007）。二〇〇五年秋天，華盛頓大學社區設計實習課與當地的青年團體WILD（城

3 美國都市公園的傳統裡，向來反對非相關的設施被納入公園用地（Cranz 1982）。

圖 7.1
移民青少年在西雅圖華埠
／國際區的設計工作坊
中，發想改善地方公園的
點子。
(侯志仁攝)



市荒野領導培植計劃 Wilderness Inner-city Leadership Development) 合作⁴，舉辦了一場跨世代設計工作坊，邀請國際區的青少年和年長居民參加。工作坊的目的是要構想如何來改善社區開放空間，以鼓勵居民使用。其中一個青年小組提出引進小吃攤的構想，以吸引人們到公園來。工作坊之後，WILD 其中一支青少年小組發展出夜市的構想，並開始著手這個計畫，要在社區創造一個實驗性的夜市(圖 7.1)。

這個計畫一開始是以問卷向社區和地方商家徵求意見，這些青少年成員還去了列治文夜市觀摩真實的夜市是怎麼實際運作，有些小時候在亞洲長大的青少年，也從對家鄉夜市的回憶中得到靈感。為了規劃這個實驗夜市，他們比較了社區中不同的地點，慶喜公園由於地點適中，經過和其他社區組織討論過

4 WILD 是國際區內的一個青少年領導力發展培植計畫，主要從事各種社區營造以及與環境正義議題相關的工作，參與者多為高中年紀的學生。



後，最後雀屏中選作為夜市的地點⁵。

在二〇〇六年八月，青少年籌辦的夜市初次登場，與社區的守望相助之夜（National Night Out）活動相結合⁶，當晚吸引了數百位居民和觀光客湧入公園看表演、玩遊戲、購物、吃東西。活動佳評如潮，也鼓舞了參與籌辦的團體進行下年度活動的規劃。市府經濟發展辦公室目睹了夜市的商業潛力，提撥了一筆經費支持夜市的商業計畫；社區也成立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社區主要組織的代表。幾個社區組織經過數個月的合作與準備，隔年又舉辦了兩場夜市活動，至今每年的夏日夜市已成為國際區的主要活動之一。

西雅圖的案例十分有趣，因為它建構在其他西岸城市的夜

左 | 圖 7.2

慶喜公園的涼亭搖身一變，成為夜市卡拉OK大賽的舞台。

（侯志仁攝）

右 | 圖 7.3

老人與小孩在慶喜公園一起打麻將，這是夜市活動其中之一。

（侯志仁攝）

5 其他考慮的地點包括：巴士站廣場以及五號公路底下的一個停車場。最終選定慶喜公園，有部分是因為它位於整個地區中心的黃金地段。

6 守望相助之夜是個防治犯罪／毒品的活動，鼓勵北美的鄰里社區共同組織起來打擊犯罪。見 <http://www.natw.org/nno/about.html>（資料取得：2009年6月21日）

市模式上，扭轉了北美城市裡公共空間制式的功能及意義。西雅圖的夜市，有別於典型美國市中心再發展所營造的充滿異國情調、節慶式的主題化市集空間（festival marketplace），相對的，它有著草根、社區營造的過程，它的社會性、政治性與跨文化的營造過程，促成了許多團體與個人的參與，跨越了既有的空間與體制的界線。本章接下來就來探討這個過程如何發生，以及相關成果的含意。

■ 夜市作為一種社交空間

長期以來，北美城市鄰里公園的設計典範，雖然以公眾為服務對象，但實際的設計卻多僅針對個人健康和身心發展的休閒活動（Loukaitou-Sideris 1995；Cranz 1982），而非以社交為目的，商業活動和大型的聚會尤其不受鼓勵，甚至遭到壓抑。而鄰里公園設立的初衷，即是要讓孩童和大人遠離街上的商業和社交活動（Cranz 1982）。一直到最近，為了把民眾帶回荒廢的都市公園，各種活動的規劃才陸續出現。

從規劃的一開始，西雅圖的夜市即企圖營造社區居民社交互動的機會，除了商業發展及公共安全的考量外，透過社交活動進行社區營造更是主要的目的之一。為了讓夜市成為成功的社區活動，WILD的青少年精心設計了一系列好玩的遊戲，以吸引不同年齡、族群的觀光客和居民的參與，使夜市成為一種社區聚會的場合，這些活動包括：社區居民所熟悉的麻將、算命、撈魚與套圈圈的遊戲，也有西洋棋、圍棋、書法、武術，甚至烹飪示範，還有充氣蹦床讓小孩玩耍，活動最後的高潮則是大人小孩都能參加的戶外卡拉OK大賽（圖7.2）。透過這些活動，居民和觀光客除了能在夜市享用美食與撿便宜之外，還有

機會和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的人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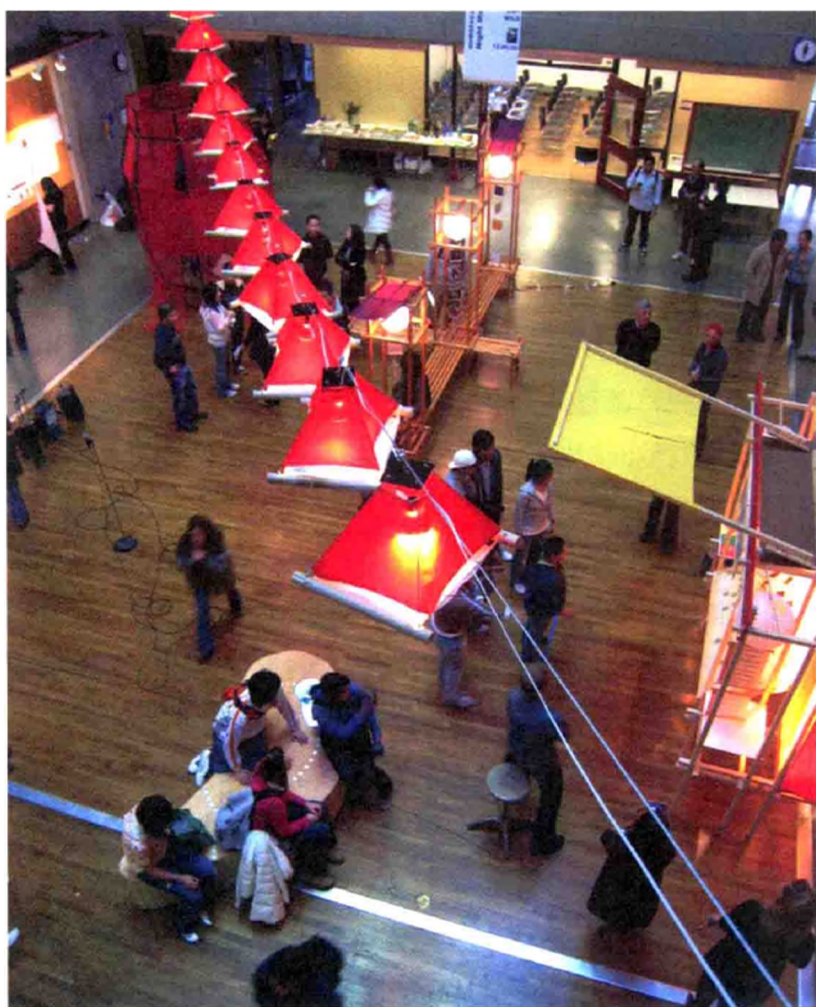
夜市的活動眾多，可以看到小孩和老人在公園打麻將的奇觀，不同種族背景的成年人可以彼此挑戰棋藝，移民家長可以教孩子他們童年的遊戲（圖 7.3），外來觀光客向在地人士詢問這些遊戲和食物的由來。社區裡外的歌手們各個胸懷大志，在卡拉OK大賽中彼此競技。這些活動轉變了公園過往的使用（或不被使用），以及人們彼此互動的方式。它活化的不僅是這個空間，同時還有其中的人際關係。西雅圖夜市的社會面向，也許是與其他西岸城市及亞洲夜市之間的最明顯的差異。

■ 夜市作為一種政治空間

如同許多歷史悠久的社區，地方政治決定了社區內的關係與界線。「西雅圖華埠／國際區」這個混血名稱，一方面就顯示了社區內部兩種不同的觀點與政治傾向：習慣用「國際區」的民眾普遍關心泛族裔的集體性和歷史包容性，習慣用「華埠」的另一方則較關注特定族群的認同。這兩種力量又參雜了對經濟發展及社會結構的不同觀點。一般而言，社福組織傾向照顧地區低收入戶的居民，但傳統的宗親團體與商業組織，則傾向市場導向的發展（Hou and Tanner 2002; Abramson et al.2006）。

西雅圖夜市成功的主要關鍵，在於它跨越了社區裡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差異，促成了不同個人及團體間的合作。一方面，夜市牽涉的議題廣泛，包括經濟發展、治安、社區營造和日常休閒，足以吸引不同議題團體的參與；另一方面，發動計畫的WILD青少年團隊也扮演關鍵的角色，促成不同團體的參與，包括非營利的社福組織、商會、政府機關如西雅圖警察局、公

圖 7.4
由WILD青少年和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景觀建築系學
生共同設計、建造的夜市
裝置。
(侯志仁攝)



園局、鄰里局等。活動的贊助者也包含當地的一家亞洲超市，甚至地產商。WILD相對的中性角色，是這些團體願意加入的原因之一。

每個團體在整個活動的籌備與執行上，角色雖不同卻同等重要。完成商家意願調查之後，WILD青少年團隊提出夜市具體的執行計劃，並由中華商會協助、爭取地方商家的支持；另



圖 7.5
油紙傘下方描繪民間故事，表達西雅圖國際區裡多元的文化。
(侯志仁攝)

一個團體「社區行動計劃」則負責整個活動的公共安全規劃；負責組織每年夏季慶典的「西雅圖華埠／國際區商業促進會」也居中協調活動物流。活動舉辦之前，WILD 團隊在其他的社區活動中設立募款攤位，宣傳公共安全的資訊，並挨家挨戶邀請商家加入。

不同團體與個人的通力合作，是這個活動成功並獲得持續支持的關鍵，不但整合了不同的資源及專業，過程也確保社區中每個社區成員都保有其自主性，而且對活動感到滿意。夜市活動的成功為這些團體後續的合作打下了基礎。雖然沒有完全轉化社區內部的政治結構，夜市的活動與籌備工作，在社區裡創造了一個新的「公共領域」，使具建設性的對話、合作和協商得以發生，無形中強化了社區的治理能力，進而

面對許多挑戰。

■ 夜市作為跨文化空間

華埠有著色彩鮮艷的招牌、寺院屋頂、中式牌樓，這樣的族裔群落 (ethnic enclave)，長久以來即被投射了許多文化想像和偏見。這些視覺元素將文化的多元與複雜性，化約為顯而易見的圖騰。從華盛頓首府到奧瑞岡州的波特蘭，以及加拿大卡加利，北美洲許多華埠的再發展過程中，都可以看到刻板的文化想像不斷被強化的例子。西雅圖夜市也不免俗地有著舞龍舞獅、功夫表演、中式小吃等圖騰性的活動與商品，但夜市的活動與籌備過程，卻也提供了許多互動、跨界與深入理解文化多元性及複雜性的機會。

二〇〇六年實驗夜市之後，華盛頓大學的社區設計實習課，即把將夜市做為一個跨文化的空間當成設計課的題目。藉由與WILD團隊的合作，華大學生與社區青少年合力研究如何設計與建造一些具有文化意象並符合夜市功能需求的裝置⁷。學生團隊透過每週的工作會議，設計、完成了六座裝置，從座椅、照明物，到遊戲攤都有(圖7.4)。為了促進文化間的彼此理解，每座裝置都涵蓋了某些敘事元素，呈現移民社群的生活及歷史。

對學生而言，這個合作設計的過程本身即是跨文化的學習，他們必須處理各種自身的文化偏見和障礙，用設計作品來詮釋社區深厚的文化資產及生活細節，來反駁一般的迷思與偏見。作品之一的「大燈籠計畫」，即是藉一個八英尺高的巨型

7 這個實習課是由作者指導，並由華盛頓大學的「大學課程轉化計畫」還有「國際交流及交換計劃」提供經費補助。更多資訊參見 <http://courses.washington.edu/nightmkt/>

燈籠，裡頭設有影像裝置，描述社區裡的一日生活。燈籠本身是種文化符碼，代表了外界對社區的刻板印象；而裡面的影像裝置則是由社區青少年製作，代表社區的真實生活。燈籠／影像、外／內的關係促使遊客去思考他們對社區的觀點及理解。另一件作品「油紙傘計畫」也用了類似的技巧，在圓板凳上方掛上油紙傘，每座傘底下都由青少年繪製畫作，描繪社區內不同族群的民間傳說（圖 7.5）。在這些作為文化圖騰的紙傘下，遊客可以一邊觀看圖繪，一邊進入一個充滿故事的世界。

這幾個戶外裝置未來可以因應夜市在社區不同地點的舉辦來做轉變。這些座椅、招牌與照明的設計，是功能性的裝置，但對於外來的訪客或觀光客而言，這些富有文化意涵的裝置，也提供了一扇窗來詮釋、了解社區裡獨特的文化資產及常民生活。此外，透過一些熟悉的文化符號，這些裝置也是對族裔群落刻板形象的反思。透過創作與文化詮釋，這些裝置將有助於讓此活動超越一般夜市的商業性。透過功能性與詮釋性元素的結合，它們吸引使用者進一步思考夜市作為一種文化活動，背後更深的意義，這些裝置開啟了公共空間裡，各種對話、詮釋的可能性。

■ 重構公共空間

和台北、曼谷和首爾等亞洲城市的夜市相比，西雅圖的夜市雖然在規模和活動的密度上相形見绌，但它的重要性並非來自它的規模，而是它提供了一種管道，讓地方社群得以重構社區中的公共空間及公共領域。藉著社區營造、經濟活化及公共安全等多重目標，夜市把社區裡不同的組織和個人串聯起來。最初由一群青少年發起，到獲得其他社區成員的響應，所有的

規劃、組織工作所啟動的互動與合作，跨越了社區內部諸多的障礙，並創造了跨世代互動與合作的機會，即便不同的團體與個人仍在政治態度和意識型態上有所差異。學生們的裝置設計也提供了跨文化省思、詮釋的機會。夜市活動，讓社區取回了原本犯罪充斥和荒蕪的鄰里公園，同時也凸顯了現有公園設計及規劃無法滿足社區需求的缺失。

西雅圖夜市不只是一種文化進口品或特殊景觀，它顯現了北美城市裡的公共空間，可以如何被重新利用、發想和重構。社區鄰里可以藉由活動的重新規劃與調整，轉變現有開放空間使用方式；這些活動和事件的設計，挑戰了社區中既有的界限，並拓展社區對公共性的想法；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及互相合作，社區團體與個人可以集中資源來進行社區公共空間的改善。這些關係與合作也可以強化另一個層面的公共領域：即個人和群體間的網絡及互惠關係。透過夜市合作的正向經驗使他們更有能力，來面對未來的挑戰。整個活動也提供了文化表達、再現和省思的機會；利用作品的裝置和展示，將社區文化及日常生活的點滴帶入更大的城市公共領域，以消融族群之間的疏離與誤解。

在西雅圖的案例裡，儘管夜市本身只是臨時性的，甚至稍縱即逝的，但這些過程和成果對社區裡公共空間以及社會關係的重塑，卻有著深遠的影響。就像亞洲城市的夜市，北美城市的夜市也在都市的場景裡，測試著各種先入為主的界限與人際關係。在擴展公共空間的理念和設計的過程中，夜市就如同那些創造出它的新移民一樣，也在新大陸上展開新的生命。

參考書目

- Abramson, D., Manzo, L., and Hou, J. (2006) 'From Ethnic Enclave to Multi-ethnic Translocal Community: Constructed Identities and Community Planning in Seattle's Chinatown-International District',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Research*, 23(4): 341-359.
- Bedard, L. (2007) 'Few Resist Park Plan, but Questions Remain', *Northwest Asian Weekly*, 26(15): 1 and 11.
- Brown, A. (ed.) (2006) *Contested Space: Street Trading, Public Space, and Livelihoods in Developing Cities*, London: ITDG Publishing.
- Cranz, G. (1982) *The Politics of Park Desig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ranck, K. A. and Stevens, Q. (2007) 'Tying Down Loose Space', in Franck, K. A. and Stevens, Q. (eds.) *Loose Space: Possibility and Diversity in Urban Life*, London: Routledge.
- Hou, J. and Tanner, A. (2002) 'Constructed Identities and Contested Space in Seattle's Chinatown-International District', in Deming, M. E. (ed.) *Groundwork: CELA 2002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ouncil of Educator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nference, SUNY, Syracuse, New York, September 25-27.
- Jordan, D. K., Morris, A. D., and Moskowitz, M. L. (eds.) (2004) *The Minor Arts of Daily Life: Popular Culture in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Loukaitou-Sideris, A. (1995) 'Urban Form and Social Context: Cultur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Uses of Urban Parks',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4: 89-102.
- Temel, R. (2006) 'The Temporary City', in Haydn, F. and Temel, R. (eds) *Temporary Urban Spaces: Concepts for the Use of City Space*, Basel: Birkhauser.
- Wu, P. C.-C. (2005) 'Daily Consumption in a Globalizing City: Food Markets at the Crossroads', in Kwok, R. Y.-W. (ed.) *Globalizing Taipe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at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 Yu, S.-D. (2004) 'Hot and Noisy: Taiwan's Night Market Culture', in Jordan, D. K., Morris, A. D., and Moskowitz, M. L. (eds.) *The Minor Arts of Daily: Popular Culture in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8

城市農耕與反叛空間

洛杉磯及西雅圖

URBAN AGRI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INSURGENT SPACES IN LOS ANGELES AND SEATTLE

TERESA M. MARES and DEVON G. PEÑA ——— 文

吳瑟加 ——— 譯

這裡是關於兩個美國城市農場的故事：洛杉磯的南中央農場（South Central Farm），及西雅圖的瑪拉農場（Marra Farm）。這兩個空間和它們的在地政治及全球背景，呈現了目前城市糧食系統的問題，以及人們追求公平正義的努力。在本文中，我們特別關注移民和「離散族群」如何自覺的利用策略，在充滿競爭的城市中創造自己的空間。我們希望從弱勢者的經驗中，看到他們如何透過在地的反抗行動和認同，進行環境的再造（參見Castells 1997; Peña 2003），讓我們思考公共空間是如何充滿著記憶，還有身分認同是如何透過自覺的策略，「進駐」

1 原字 diaspora，代表「離開其原居地或其祖籍國，移動、遷居、散居」的離散僑民、離散民族。

並定居於這轉變中的空間。

Henri Lefebvre的著述（1974/1991），特別是「生活空間」（*espace vécu*）的理論，提供我們一組有用的概念²，對生產糧食的城市空間進行政治生態層面的理解。從城市的歷史發展可以發現，城市空間的結構會隨著來來去去的社群，彼此之間的社會衝突，以及社會運動的節奏和循環而改變。城市的政治經濟，不只是新自由主義自上而下之治理性的發明，也不只是管理性的空間法則。人們透過自我與群體的力量，爭取對空間的另類使用，構成反霸權的空間實踐，脫離制式規劃的束縛。

在以資本為定律的城市土地使用中，農業通常不得其所。雖然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曾經有種植作物的悠久歷史，但對許多人而言，在全球城市商品化的空間邏輯之下，農作似乎顯得格格不入。與天文數字般的房屋租金，和被炒作的房地產市場相比，城市農耕土地的價值經常被誤解或低估；這樣的錯誤認知一再對城市農場和園地帶來不幸的災難。

也因此，城市園圃常常體現的是反抗，透過在地社區非市場性的使用，重寫了空間的符碼。瑪拉農場和南中央農場，展現了城市農耕和社區為「糧食自主權」奮鬥之間的連結³。「糧食自主權」概念結合了社區糧食安全的想法，認為食物來源應該要與文化身分認同一致，也包含社區網絡自力更生與互助的想法。雖然這兩個案例非常不同，但它們均展現了弱勢和邊緣族群從事城市農業、創造地方感，以及建構另類糧食體系的可能性。

2 另見Soja(1996)用「第三空間」來描述Lefebvre所先提出的概念。

3 有關糧食主權的參考文獻，請詳見Dodson(2005)。



圖 8.1
南中央農場的農民茹菲娜·華列茲，在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日的移民權遊行。(Devon G. Peña 攝)

圖 8.2
標語：「沒有人是非法的」。在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日的移民權遊行。(Devon G. Peña 攝)



一般所言的美國城市農業史

主流的美國城市農業歷史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末。包括山姆·華納 (Warner 1987) 在內的歷史學者指出，美國城市農業的發展，為的是在國際危機、經濟不景氣和戰時，餵飽和掌控城市中的窮人。頗像今日的社區園圃，這些戰時園圃坐落在城市的空地之中，它存在的穩定性依賴於地主的財務狀況，以及土地的發展價值。曾在不同時期被稱作「戰時園圃」、「自由園圃」、「勝利園圃」和「救濟園圃」，這些作為食物生產的城市空間，與人類移民、軍事化和經濟轉型，緊密的連在一起。

美國涉入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本地糧食生產的需求上昇，讓城市農業、愛國主義和國民義務之間有更明確的連結。那些曾經「被認為是需要糧食與指揮的城市窮人，隨著農作，提供平民消費，對戰事有貢獻，…成了具充分資格的愛國公民」(Warner 1987: 17)。在當時，「國家戰爭園圃委員會」是個國家級單位，藉由城市農業去提倡愛國主義。隨著第一次

世界大戰的結束，「戰時園圃」遂輝煌的重新被命名為「勝利園圃」，作為新的城市農業的化身，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一九四四年間，一度「勝利園圃生產了美國國內百分之四十四的新鮮蔬菜」(Hynes 1996: xii)。

二戰之後，城市菜園在數量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隨之遞減。背後原因不少，有些學者把這種情形主要歸因於糧食生產與分配的大規模化與集中化 (Saldivar-Tanaka and Krasny 2004)。然而，我們認為這樣的計算過於膚淺，因為它忽視了勞工階級和移民家庭從事「廚房菜園」的歷史⁴。對於這些來自農村的移民和離散僑民而言，廚房菜園是一個傳統。舉例而言，中美洲遠古文明——馬雅、托爾特克、阿茲特克——都注重在城市環境中充分利用公共空間，做為園藝和農業使用。對墨裔和其他拉美裔人民而言，在城市環境中使用共有的開放空間來生產糧食，是項悠久的文化傳統，對於其他離散的原住民族群來說更是如此。

歷史學家追溯下一波城市農業至六〇年代末和七〇年代初期。這一波城市農業並非因國家危機的糧食短缺而起，而是因民權運動、環保運動的草根力量出現，以及為了回應與日俱增的城市衰敗 (參見Saldivar-Tanaka 和Krasny 2004；Schmelzkopf 1995；Warner 1987)。這些新興動機帶來了城市農業中的新政治和新文化，更直接連接到社會底層、經濟弱勢、種族邊緣化和不正義的抗爭。新一代的城市耕作者，嘗試創造出通常與地方政府利益相對立的反叛的公共空間。「南中央農場」和「瑪拉農場」，正是處於此新政治和新文化脈絡中

4 譯註：Kitchen Garden的簡單解釋，是為家庭消費所用，種植蔬果、香草、藥草的園地。

的兩個案例。

■ 加州洛杉磯：餵養家庭的南中央農民

加州洛杉磯的「餵養家庭的南中央農民」(SCF)是一個展現了新多民族和跨國拉丁生態理性思維的民間組織。二〇〇三年九月，面對菜圃被驅逐的威脅，一群農民成立了這個共同組織，來對抗土地政治、開發利益，以及社會菁英主導的糧食銀行。這些農夫以集體與民主的經營方式，創造了一個生長著本土作物、果樹和藤蔓、和藥草的地景，以及一個有活力的、充滿了社會生活和歡快喧囂的空間。但在二〇〇六年六月，面對著開發勢力的入侵，即便歷經一場激烈的、全球性的農場拯救運動（圖8.1及圖8.2），推土機最後還是開進了農場，摧毀了這一城市綠洲。所幸這些農夫後來在加州的巴頓維洛（Button Willow），取得了八十英畝土地和灌溉權，從悲劇的結果中重生。現在，在這塊新的土地上，他們透過「戶得食物計畫」（Food for the Hood）生產了更多的農產品。

像SCF這樣的組織，已經成為社區抵抗被迫遷的關鍵力量，他們也重新定義了所謂「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的本質（他們較喜歡「社區本位型農業」（Community-based Agriculture）這詞）。南中央農場於一九九二年建立，在被摧毀之前，農場的面積有十四英畝，其中有十英畝被密集地耕作，它是美國位於城市中心最大的農場之一。位於洛城以工業和住宅為主的南中央區，周圍為倉庫和廢物堆積的廠區，農場基地一側是作為國家主要鐵路，連接了洛杉磯港和區域貨物轉運中心的一條鐵道，另一側則是一條六線道的高架道路。SCF包括了三百六十個家庭，有在美國出生

的墨裔美人，也有源自墨西哥和中美洲來的原住民離散社群。十三年間，這些農夫，包括了米斯特克、納瓦、托霍洛瓦爾、特里基、澤套、塞里、亞基和薩波特克血統的家庭⁵，倚賴這塊珍貴的城市空間來種植作物，自給自足，並建立了社區的意識。在這裡，他們創造了一塊如假包換的中美洲農業生態地景，也共同建立了具有強烈地方感的「在地糧食主權」(local food sovereignty)。

洛杉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在這裡可以發現隨著來自瓦哈卡 (Oxaca) 或恰帕斯 (Chiapas) 的耕作者所帶來的古老玉米、菜瓜及豆莢的種子。這些種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中美洲心臟地帶，如今卻在被高速公路網絡圍繞的城市地景裡頭茁壯繁茂。在南中央農場，理解這裡的家庭園圃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們想像成這些海外離散僑民過去在墨西哥、中美、波多黎各、古巴，或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故鄉廚房菜園的複製品。快速比較一下傳統的馬雅廚園和南中央農場上典型的現代家庭菜圃，顯示了墨裔的耕作者，仍然種植熟悉的神聖三一組：玉蜀黍 (*Zea mays L.*)、豆類 (*Phaseolus vulgaris L.*) 和菜瓜 (*Cucurbita pepo L.*)。他們也種酪梨 (*Persea americana*)、香蕉 (*Musa sapientum L.*)、傳統的香草，和用來製作傳統墨西哥藥草貼布 (hortaliza) 的藥草。在很多例子裡，農民說，有些他們世代在墨西哥利用的植物，現在只有在美國的城市農場和廚園中種植。的確，許多曾在南中央農場作業的原住民僑民家庭，如今已不在墨西哥從事農作。這些祖傳的地方品種，是因為有了這些海外離散僑民在美國的保種、栽種、培育，才因

5 原文：Mixtec, Nahua, Tojolobal, Triqui, Tzeltal, Seri, Yaqui, and Zapotec descent



圖 8.3
於南中央農場，放在在做
為靜坐抗議地點的楓樹之
下的Ofrendas或「供品」。
(Devon G. Peña攝)

而被保存下來。

南中央農場的奮鬥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它是一個新興的、草根性的生態修復，對新自由主義在城市公共空間的圍剿與私有化，形成堅強的抵制。就這點而論，它在美國環境正義運動的奮鬥史上，代表著組織形式和運動廣度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SCF代表了一個草根生態民主的例子，它整合了有形的實踐與社群的生物遺產，複製了以村為基礎的社區自治形式。它顯示一批跨國離散僑民，不只進行城市地景的重塑，也挑戰了城市的規劃與政策。(圖8.3)

在拉美裔的社區裡，如同南中央農場的地方糧食地景，可被視為是「第三空間」活力的展現——社區透過空間的占用來支持城市農業的結果，這對於低收入的移民社區而言，特別重要（參見Pinderhughes 2003; Peña 2002; Soja 1996）。城市廚園，以及更集體化、有組織的社區園圃，其影響範圍、旺盛活力、文化意義，還有為爭取城市「永續公正」而奮鬥的角色，皆令人印象深刻。El Jardin（園圃）是一個人書寫「自我地誌」（autotopographies）的空間，透過空間的營造來表達自我。不管是南中央農場的例子，或是繼續擴散到其他美國城市的典型廚房菜園來說，皆是如此。這些jardincitos（小園圃），是跨國社群重建家園過程中精神與政治上的象徵。

訪問這些南中央農場耕作者，問他們為什麼栽培蔬果，他們多持相同理由：為了貼補家庭的食物開銷；為了種植屬於傳統食譜中的原料；為了從事有機栽種（這意謂著種植自己的食物，知道其由何而來，而且知其是新鮮的）；為了和朋友和家庭成員一起探訪農園，並向年長者學習傳統食物；為了像在家一樣的自在；為了種植香草藥草和蔬菜來供應家庭生意。這類在美國西岸出現的園地，是空間政治學之中反抗的種子：這些奮鬥經過「自我地誌學」的過程而浮現，並在這些新形成的、孕育歡快的共同社區空間之中展開。一位南中央農場的耕作者，三十歲的薩波特克婦女，對她的參與有這樣描述：「我在這塊園地種植，因為這小地方就像是家一樣。我種了當年我在家鄉瓦哈卡的園地裡所種的作物。我們可以像在故鄉一樣，吃同樣的東西，這讓我們感覺很像做我們自己。這讓我們在來到美國之後，還保留一部分的自我」。

像南中央農場huertos familiares（家庭廚園）的在地自我地

誌學空間，是對支配糧食系統的全球商品鏈的反抗。但這過程的內部是多元的，也具高度衝突。南中央農場直到被拆毀之前，名義上是由區域糧食銀行所管理，這個幾英畝大的城市土地，卻要去支持三百六十個家庭的糧食生產活動，在管理上產生了很多挑戰。南中央農場因此把相當有限的土地，分配成以家庭為單位的小塊土地，每塊大小一致，大約兩百到兩百六十平方公尺。耕作者在這些土地之間，隨著時間即興地樹立起廉價的圍籬，如同迷宮一般。

南中央農場上一個值得注意的特色，是為數不少的仙人掌圍籬。以Nopal(仙人掌)所做的圍籬，為北墨西哥鄉村地景上常見的傳統裝置物，尤其在契瓦瓦(Chihuahua)、索諾拉(Sonora)、科阿韋拉(Coahuila)和塔毛利帕斯(Tamaulipas)一帶。一位耕作者說，許多人把原本的鏈條圍籬拆下，開始以仙人掌替代之，不只如此，也有用甘蔗、香蕉、酪梨，和其他果樹和灌木，替代原有的鏈條圍籬，也有人利用藤蔓去遮蔽鏈條圍籬。所有這些案例中的努力，是為了創造一個對耕作者來說，更愉快、更有用也更自然的分界線。他們的方法是把「圍籬」變成可食地景的一部分。

至於選擇用仙人掌或是鏈條圍籬，很明顯的並非管理上主要的議題，而是反應著更深層的衝突。南中央農場的耕作者該如何經營其空間，符合社群共同需求，必然是一個集體的、適應的過程，以回應多元社群之所需。然而，面對這塊重要且珍稀的城市文化地景，當地的區域糧食銀行組織以及洛杉磯市政府，似乎並不重視民眾自決的過程。南中央農場的農夫處於一場攸關城市共有地，因都市土地爭議所引起的衝突。過度被炒作的城市商業、工業空間，是這衝突的深層原因。社區菜圃的

耕作者所面對的危機，是來自於把土地當做資產來看，定義它為發展商業和工業使用的空間，忽視了它在社區群體經濟、生態和文化上的價值。

■ 華盛頓州西雅圖：瑪拉農場

位於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四英畝大的瑪拉農場，為弱勢團體和家庭提供了菜園空間、技術和其他所需資源。這有機農場容納了四個社區園地，分別由不同的非營利和政府組織協調管理。做為一個城市共有地，它提供背景多元的人們栽植作物，除了給個人食用，也供應糧食銀行及非正式的交易。不像南中央農場，瑪拉農場所根植的四英畝地，打從這城市建立之初就被耕作。一開始，它為身為菜農的義大利移民瑪拉家族所耕作，瑪拉家族是最早提供派克市場本地農產品的家庭農夫之一。這塊地自一九〇八年起就一直為瑪拉家庭所有，直至一九七〇年售予金郡政府（King County）。在一九九〇年代，西雅圖市以開放空間債卷的基金買下這塊地，原本目的是使其繼續維持農業生產所用。然而目前，隨著農場用地的另一半正被改變成為城市公園，瑪拉農場與西雅圖的關係，也在轉型中。

乍看之下，瑪拉農場，做為一個密集栽種的綠地，在南西雅圖工業化的地景裡特別突顯。它是一個分成小塊地的共同空間，由非營利團體和個別的農夫所經營，這些團體與個人的文化和種族屬性，就像他們所栽種的蔬果一樣，各色各樣都有（圖 8.4）。每年夏天，零星而列的高聳玉蜀黍莖幹刺向空中，使得來照顧採收的人們顯得矮小。巨大的南瓜歇息在地上，閃耀著黃橙綠的光耀色彩。蘋果樹成列立於農場的北界，有一條進行著鮭魚棲地復育的小溪在附近流過。走過瑪拉農場，會讓人

圖 8.4
支撐豆類的結構，瑪拉農
場。
(Teresa M. Mares 攝)



忘記這是西雅圖污染最嚴重的地方之一。農場所在地的「南公園」(South Park) 地區，長期為附近的工業生產與貨運所造成的環境危險和污染物所擾。二〇〇一年，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把杜瓦米許河 (Duwamish River) 流經這地區東界的部分，列入聯邦「污染治理超級基金」的基地，因為它含有過量的多氯聯苯 (PCBs)、重金屬、油汙、汞、砷以及未經處理的下水道汙水。距離波音機場所在地僅五英里，瑪拉農場的幽靜和平和，三不五時被飛機的轟隆震響，以及丘陵另一邊資源回收廠的玻璃碾碎聲所打擾。

處於空氣、水、土地污染的空間脈絡，以及在這西雅圖經濟最弱勢、但文化多元的地區，瑪拉農場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綠地空間。人口統計上，這些住在南公園的居民和西雅圖其他地方的居民，有非常明顯的差異。南公園的居民，其三千七百多人之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為拉丁裔，而其他西雅圖城市地區的



圖 8.5
「孩童菜園」·瑪拉農場
(Teresa M. Mares 攝)

拉丁裔人口，只占五點六個百分比⁶。南公園的居民有大約三分之一在外國出生，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四的人是一九九〇年後才來到美國。相較之下，西雅圖市的居民有百分之十三·六為外國出生，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七的人是一九九〇年後才來到美國。南公園的居民平均家戶收入為三萬九百一十七美元，收入遠低於西雅圖市整體平均家戶收入的約五萬一千美元。這些經濟情況，可以由它的住屋狀況、糧食以及其他服務的匱乏看出來。不同於西雅圖大部分地區，農場的方圓幾里之內，很難買

6 這些數字來自於二〇〇〇年美國人口普查資料。

到一杯星巴克咖啡。

星巴克在此不見蹤影，其實是有許些反諷，因為在這裡植床間的小徑，遍躺了由這間以西雅圖為家的企業巨人所捐贈的麻布袋。也因為如此，總有一些由哥斯大黎加或哥倫比亞農夫所植的多餘的咖啡豆，零星散布於本地的番茄和甜菜之間。這種新穎的混合，豐富的象徵了在地與全球化之間動態的交互影響。如同南中央農場一樣，這裡跨國與離散的族群與文化的流動，很明顯的反映在作物上，墨裔和南美裔家庭種植著或藍或紅的玉蜀黍種類，東南亞緬族（Mien）人則種巨大的黃瓜、南瓜。這個空間，讓從地球上另一端來的人們，在一個遠離家園的城市裡，得以維持和協商出不同的地方感和認同。

一年到頭，瑪拉農場都是社會和文化活動的中心。農場西北角的「莧苣連結計畫」園地，種植了新鮮農作物，捐贈給鄰里糧食銀行。其中的「孩童菜園」，則提供附近學校和社區中心來的孩童，學習如何種植自己的作物，並參與菜園裡的烹飪示範和營養課程（圖8.5）。莧苣連結園地的南邊是「西雅圖青年園地工作」（Seattle Youth Garden Works）的菜園，由早春到晚秋，常可看見一群青少年照顧著菜床、除草和準備著要賣給當地農民市集的農產品。他們通常有一、兩位精力充沛的導師伴隨著，指導年輕人園藝和創業。另外還有緬人的社區菜園，富有人類植物學的多樣性，並生產豐沛的食物。這些耕作者自種自食，環繞園地的多語招牌，提醒人不要偷竊或破壞。栽培這塊農地的緬人的園藝技巧和知識，讓農場上的其他耕作者印象深刻，一個來自南美的終身農夫做了極好的總結：“Si, ellos saben cultivar”（「是的，他們懂得怎麼種」）。

這位南美裔農夫，在位於莧苣連結園地另一頭的「P園圃」

裡頭，有他自己的一小塊土地⁷。「P園圃」(P-Patch)是西雅圖市政府所支援的菜園，瑪拉農場裡頭的P園圃，容納了二十八小塊菜圃，各大約有十九平方公尺，幾乎是剛遷移至此的拉丁裔家庭的第二個家。P園圃裡頭的玉蜀黍，比起農場裡的其他園地，數量與種類都來得更多，而且如同在南中央農場的情形，通常是跨國種子交換的結果。這些種子的交換，長成了藍的、紅的、多彩的玉蜀黍穗軸，它彰顯了對拉丁裔耕作者來說深刻的文化價值。在P園圃的一角，有一種玉蜀黍長到近乎有十五英尺之高，但它在這裡，沒有能像在其原生氣候中有抽長成穗軸的充裕時間。雖然如此，它仍繼續被栽種的事實，正顯示了這裡的農民們在新環境中重塑地方感的努力，還有人和植物之間關係的重要性。

從農場資源的控制和使用，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地化以及全球化的過程，以及兩者的政治背景。自稱「綠色城市」，西雅圖顯然對農場所進行的環境永續實踐有著既定的興趣。我們可以預見的是，西雅圖市會繼續利用農場的環境管理，做為其「綠色」努力的案例，但這衍生一個重要問題：西雅圖市如何以及會否馴化、調整並收割那些在瑪拉農場上工作的人的勞力，和其所屬身分認同？

把農場轉換成城市公園，也產生了關於決策過程和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上的問題。所有權的問題相當複雜，也代表了農場做為競爭空間的本質，不同利益者對農場未來有不同的看法。現在農場為四個組成「瑪拉農場聯盟」(Marra Farm

7 「P園圃計劃」(P-Patch program)是一個西雅圖鄰里局裡的單位。這項計劃協調了近九十處西雅圖市內的園地。P是Picardo的縮寫，為紀念西雅圖第一座社區園圃所在地的主人Rainie Picardo。



圖 8.6
小屋和社區壁畫·瑪拉農場
(Teresa M. Mares 攝)

Coalition) 的組織所管理。雖然聯盟正和公園管理處商議，使所有參與者的角色和責任更為明確，但是很清楚的，現在市政府在未來的決策上有更大的發言權。在這四英畝之上，耕作者為了收益、捐贈和個人使用而種植農作，但這塊地事實上不屬於他們。這是一個難題，因為許多耕作者依賴著這些農場，來維持他們自己和家庭的生計，但同時，也提供了公共利益，因為有他們的投入，才能使西雅圖繼續在城市裡維持永續的農業空間。毫無疑問，還要更多的努力，才能確保農地繼續做為當地社區的資源(圖8.6)。

■ 城市農業和反叛空間

離散僑民和有色族群為城市農業所做的奮鬥，正是環境正義運動的縮影，這個運動將開放空間、生態保護和糧食主權，與公平合適的住房、有意義的工作與合理的工資等議題聯結起來，並創造鄰里和地方感所需要的共有空間。這個運動在永續的糧食生產上，有著令人振奮的發展，城市的耕作者成為推動社會正義、環境自決和糧食主權的進步力量。這些運動的出現，延續著數十年來許多社區在決定自己的未來生態環境和經濟前景，以及創造永續與公義環境上的努力。在這場與城市監控、生態足跡擴大以及失敗之郊區主義的對抗中，反映「後福特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幻夢的城市形態，正由下而上的被改造和重塑之中，反映出文化的多樣性，並將抽象的空間轉變為有意義的地點。

世界各地的社區菜圃均提供重要的生態、社會和經濟上的益處，但這些益處在面對著城市發展時，卻始終被低估。如本文所說的，藉著原住民移工所從事的農業活動，城市社區菜圃

能促進祖傳品種的多樣性與相關環境知識的就地保存。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跨國企業如孟山都（Monsanto）的持續支配，基改種子繼續污染著墨西哥的地方品種，這些保存努力和知識尤需我們的注意。透過我們在瑪拉農場和南中央農場的研究，我們希望闡明這些耕作者的農業生態做法，和經營這些反叛空間背後的動機與努力。在南中央農場的抗爭中，最關鍵的是，農民與其種植作物之間的關係，它代表著他們保留文化身分認同和建立社區的努力，但這樣的價值卻沒有被承認。而瑪拉農場現在面臨的則是土地所有權和管理權的議題，對一些社區居民而言，這塊地近來已被政府機構所掌控，但至少政府管理的結果是正面的，保障土地能夠繼續做為農用；同樣的可能性，已經從南中央農場農夫的手中奪走，儘管他們已經做了最大的努力。

很多時候，社區菜圃處於被爭奪的空間中，牽涉了開發商、投機者、規畫者、甚至慈善家彼此對立的主張。但同時，城市菜園和農場往往也展現了社區的政治力，像對支持當地家庭的需求、鼓勵世代與種族的混合，也鼓勵藉由自覺的場所營造，再現原生和混血的身分認同和文化。像南中央農場和瑪拉農場這樣的城市農場，是藥用植物及傳統食譜的來源，是多樣的農業生態空間，不僅是象徵，實質上也連結了移民和他們的原鄉。這些空間顧及了地方感的跨國化，它們是訴說個人故事的畫布，也是藉著烹飲技習、培育品種與知識體系的保育，來維持文化身分認同的一種策略。這些社群構成了多國籍與多種族的社會文化拼貼，是重新定義一個永續城市生態基礎的重要力量。在避免將他們的文化認同本質化的同時，我們必須認知這些耕作者在自我地誌學上，以及他們適應新場所的過程中所

展現的智慧。

「花園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塊地，但它也是世界的全部」，傅科這樣寫到（1986: 26）。南中央農場和瑪拉農場就是美國城市景觀裡的兩小塊地。每個南中央農場的廚房菜園，以及每塊瑪拉農場中的菜圃，都是耕作者重建其地方感的地點。在這些自發性的地誌學行動中，城市農民刻劃了一個故事，其中有著來自原鄉世界的元素，讓他們去創造一個熟悉的空間。這些「異托邦」(heterotopia) 的倖存必須靠面對對手全面的施壓——資本主義市場任何時候都渴望去篡奪並且物化空間，把它當成可買賣的商品，最後在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城市裡被消費。

美國需要更多如南中央農場和瑪拉農場一樣的城市農園。我們不需要再去摧毀更多文化珍寶，用更多千篇一律的東西來取代：即那些被私有化後，枯竭與同質的地景。自一九九四年以來，人文與自然的資本，在南中央農場上所創造的「第三空間」，必須被視為草根城市主義的模範。我們的希望是瑪拉農場永遠不需要面對那些最終摧毀了南中央農場的威脅。

北美洲的城市正由一股草根力量，由下而上地、用具有創造性、有希望的方法，進行再創造。在這些城市的邊緣裡有著永續城市生態的模式正進行着，而跟我們一起工作的農民，正體現了這項環境自治的傳統。這一個永續、公義城市的願景，不容被後工業時代、新自由主義式的城市地景，施以無情的侵害。

參考書目

- Armstrong, D. (2000) 'A Survey of Community Gardens in Upstate New York: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romo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Health and Place*, 6: 319-327
- Blair, D., Giesecke, C., and Sherman, S. (1991) 'A Dietary, Social,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of the Philadelphia Urban Gardening Project', *Journal of Nutrition Education*, 23: 161-167
- Brown, K. and Jameton, A. (2000)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 of Urban Agricultur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 21: 20-39
- Castells, M. (1997)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2: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Dodson, S. (2005) 'Food Sovereignty: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repared for Professor Devon G. Peñ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raduate seminar, ANTH 488 – Agroecolog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Foucault, M. (1986) 'Of Other Space', *Diacritics*, 16 (1): 22-27
- Glover, T. (2003) 'The Story of the Queen Anne Memorial Garden: Resisting a Dominant Cultural Narrative',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35: 190-212
- ____ (2004) 'Social Capital in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Community Gardeners', *Leisure Science*, 26: 143-162
- Hynes, P. (1996) *A Patch of Eden: America's Inner-City Gardeners*,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 Landman, R. H. (1993) *Creating Community in the City: Cooperatives and Community Gardens in Washington DC*, Westport, CT: Bergin & Garvey.
- Lawson, L. J. (2005) *City Bountiful: A Century of Community Garden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febvre, H. (1974/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Nemore, C. (1998) 'Rooted in Community: Community Gardens in New York City', *Urban Agriculture Notes*. Online. Available HTTP: <http://cityfarmer.org/NYcomgardens.html> (accessed 26 January 2005)
- Peña, D. G. (2002)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Link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Sides of Sustainability', policy brief prepared for the Second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 Washington, DC, October.
- ____ (2003) 'Identity, Place, and Communities of Resistance', in Agyeman, J., Bullard, R., and Evans, B. (eds.) *Just Sustainabilities: Development in an Unequal World*, London: Earthscan.
- Pinderhughes, R. (2003) 'Pov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Urban Agriculture Connection', in Boyce, J. K. and Shelley, B. G. (eds.) *Natural Assets: Democratizing Environmental Ownership*,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Saldivar-Tanaka, L. and Krasny, M. E. (2004) 'Cultur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Neighborhood Open Space, and Civic Agriculture: The Case of Latino Community Gardens in New York City',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1: 399-412.
- Schmelzkopf, K. (1995) 'Urban Community Gardens as Contested Space', *Geographical Review*, 85: 364-381.
- Soja, E.W. (1996)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Warner, S.B. (1987) *To Dwell is to Garde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9

廣場外的動／感地理

移向潤澤邊界的香港都市公民行動

GET WET AND DIRTY**SHIFTING GROUND FOR
HANDS-ON URBANISM IN HONG KONG**

黃舒楫 —— 文

談到都市公民行動，多數人會想到城市廣場上的集會身影——肥皂箱或手持大聲公宣講的姿態，例如野百合運動之於中正紀念堂，或如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每年追念六四要求民主的上萬人潮，乃至於二〇一一年九月起於美國華爾街而後遍及各大城市中心的「占領運動」。城市公共空間是如此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因而公共空間本身也常是運動爭取的目標，事實上，占領運動在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發生就形同一個將「私有公共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轉化為「反叛公共空間」（Insurgent Public Space）的絕佳範例（Hou, 2012）。二〇〇八年，在香港銅鑼灣名為「時代廣場」的購物中心前，市民也曾發動行動，不滿公共空間被財團私有化。城市中的廣場讓公眾集結；有公眾才能創造出公共空間。

然而，是否只有廣場才能有所謂的都市公民行動？大約從二〇〇九年反高鐵開始，香港的都市公民行動產生了地理的變

化，都市社會運動焦點漸漸移向了地景迥異於港島市區的新界，年輕一輩的社運參與者走入新界鄉村，運動語言中多了「土地」作為關鍵字，二〇一二年更有十多個團體共同組成「土地正義聯盟」（簡稱土盟），他們宣誓：「土地是全港市民共有的資源，唯有開拓城市同鄉郊的可持續發展，保育自然、永續農業、擴闊社區生活空間，發展多元經濟，才可為全港市民帶來生機，尋覓出路」¹。這一波「土地」運動挑戰發展主義壟斷土地使用的定義和分配。這是一波慢慢走入田野間的「社區運動」，不僅是抗爭場域的移動，行動構成地景變化，也造就抗爭主體的改變。²

在香港，二〇〇三年前的社運多針對政府，面向殖民政權，和政府談政策、爭取更多的保障權益，但這些運動中並不討論資本——已然全球化的資本。根據學者司徒薇分析（2003），在新社會運動裡，「打國家和打資本都同在一個運動裡發生」。在這個轉向中，「土地問題」浮現成為焦點。對於土地問題的關注，有別於保衛公共空間，保護環境的行動。在九〇年代的保護維港運動，要求停止填海，是修正式或防守式姿態，多是以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呼應「永續發展」論述提出的訴求，從意識行動團體（awareness-based activism），演變為知識型倡議組織（Lee 2010）。

離開了廣場，這群市民在田野間走出一條新路，不少所

- 1 由多個地區運動團體組成「土地正義聯盟」，積極支援各區反迫遷及保育運動，推動香港本地農業和社區經濟的發展及研究。可參考「土地正義聯盟」官網 <http://landjusticehk.org>
- 2 台灣近年風起雲湧的農村運動促成「台灣農村陣線」，其運動背景和實踐歷程十分值得和香港經驗進行比較分析。

謂「八十後」參與其中³，他們對土地不僅有理性的政治經濟分析，也有感性的身體經驗轉變，這些轉變揉和為質感豐富的行動主體基底，承接了二〇〇四年起自天星、皇后碼頭、「喜帖街」的「社區運動」能量⁴，在新界滾動起一番新氣象，本文稱之為「廣場外的動／感地理」，透過菜園村和馬屎埔村兩個案例，我將描繪這充滿土水的動／感地理如何滋潤都市公民行動，呈現挑戰城鄉邊界的新地理想象。規劃理論家羅伯·鮑爾瑞嘉（Beauregard, 2003）認為城市公共空間裡，故事創造群眾，創造了公共群眾才有民主之成形。除了故事與群眾外，香港的都市公民行動提示了我們，運動的實踐更需要落實於地理空間，在過程中涵養嶄新的都市認識。

■ 以蕉葉為誓：菜園村生活

「蕉葉為誓」，並不像是一句社會運動口號，卻是千人怒撐菜園村時，最情深意重的一句話。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一年，幾次近千人持著翠綠的蕉葉上街，希望能「保衛菜園」，要求「停止清拆、先建後搬」。持蕉葉並非標新立異，只因菜園村是一個位於新界石崗的農村，村民務農為生，一甲子以來，村內遍植各色蔬果農作物，包括香蕉。這是一個讓香港社會關注起新界農業問題的重要個案。許多原來在都市中心工作的社區組織者和專業人士，開始注意到田野間靜靜上演的開發大計，也

3 有關「八十後」的世代論爭辯在反高鐵預算案社會運動前後討論甚多，對「世代論」之批評，可參考周思中（2010）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頁25-38。香港：牛津。

4 「喜帖街」也就是香港島灣仔區的利東街，知名的市區重建案例，其運動歷程可參考（周綺薇、杜立基、李維怡，2007）。

就是所謂的「廣深港高鐵規劃」⁵。這個計劃中，菜園村被設定為列車停車側綫及緊急救援站，必須拆遷。於是香港社會才注意到該建設預算金額驚人，工程規劃的必要性也欠合理討論，捲動起大規模爭議，因而有反高鐵千人集結包圍香港立法會反對預算案，然而，高達六六九億港幣的高鐵預算依舊通過（圖9.1）。

菜園村是所謂「非原居民」聚集的小村，村民多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由中國南部逃難至港。一九四九年以後，港英殖民政府力求減少香港對於內地民生物資進口的依賴，遂積極加強農業生產，鼓勵新來港移民種植蔬菜，以期促進本土市場供給。不少村民因而投入蔬菜耕種，菜園村入村處的「菜站」就是這段歷史的產物。拆遷前，菜園村已有居民約五百人，許多大家庭共居，好不熱鬧。但二〇〇八年香港政府突然公告村子必須拆遷⁶，村民們疑惑不止，為什麼選中菜園村？路線是怎麼劃設的？聲援的社區工作者和專業者遂考察規劃過程中的空間政治，一方面挑戰發展邏輯，一方面也揭露了新界土地中深藏的原居民形成特權階級的歷史課題。原來，殖民時期港英政府為確認統治穩定性，對於殖民前即在新界居住的「原居民」施行



圖9.1
「蕉葉為誓，保衛菜園」
在中環的行動剪影。
（黃舒楣攝）

- 5 廣深港高鐵連結廣州、東莞、深圳、香港。港深段由香港西九龍總站經邊境皇崗至深圳龍華，號稱完成後由香港到廣州只需四十八分鐘。
- 6 高鐵規劃及菜園村迫遷過程可參考朱凱迪（2009.2）視而不見的逼遷（廣深港高鐵與石崗菜園村系列）<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2198>（accessed on 12/05/2012）

間接管制的行政系統，並給予土地發展優惠，促成新界特殊的地方權力結構。一九四九年後，來港定居於新界的移民則變成「非原居民」，成為政治和經濟雙重弱勢，這個結構關係在不少大型發展徵收的決策中一再凸顯，工程總是繞過原居民村落，但非原居民則多受迫遷⁷。

高鐵預算通過後，菜園村民不得不接受拆遷，但持續的抗爭行動，總算讓他們爭取到「有尊嚴的搬遷」。他們拒絕金錢賠償或社會住宅安置，希望能集體覓地重建家園。對於香港社會來說，這要求非常特別，坊間媒體亦多抹黑村民接受高額賠償仍不搬離，徒然延遲高鐵工程。村民的道理很簡單：幾十年來共同居住的生活經驗和社區關係何其寶貴，如何能打散後安置入標準化的社會住宅，並且失去農田和菜圃？唯有集體搬遷，「耕住合一」，才有尊嚴。

新的難題從決定買地之後才開始，村民和志工們體驗了新界政治和土地交易合謀之複雜，發現要尋覓一塊水源及土質適合耕種、面積可納數十戶人家的土地，原來極其困難。此外，為了在農地上建設農村，還要處理農戶「復耕牌照」的申請。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要求村民提出具體證明全職務農，兼職不算，種花也不合格，申請過程受到許多刁難，筭路藍縷難以盡書。這過程讓參與者深刻體會了香港農耕之不易，原來從政策串連到新界政治都有結構性問題。這一塊在目前都市運動分析中完全空白，必須置身其中才能理解。

一切自己來，村民決定由下而上來設計生態村。他們尋求浸會大學陳允中和香港大學王維仁老師等協助參與式規劃設

7 以菜園村為例，環評報告即無法解釋為何徵收避開原居民所擁有土地，反而選擇多數新移民耕種的農田。新界殖民歷史可參考劉潤和（1999）。

計，花了一年多，利用小模型和圖說反覆溝通，完成了四十七棟同中求異的家屋。回首來時路，社區工作者Keith分享他的感想：「社會運動中總是不斷要求，總在要求政府改變或釋放資源，這是常常會輸的。但規劃過程很難說輸贏，像菜園村都買了地，應該不會輸的。如果輸，也是輸在自己，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最困難就是會不會放棄…」他的發言點出了社會運動而後入村紮根，行動者身在其中的實踐變化。

菜園村運動影響深遠，在文學藝術電影領域都有迴響。持續支持菜園村的志工們組織「菜園生活館」，運動期間，來自各界的年輕人索性搬入村內和村民共同耕作，以期更深入的理解村民生活議題。二〇一一年夏天的菜園生活館旁，我看著志工朋友開完會檢討行動後，馬上挽起袖子到田裡除草，忍不住問他：「當初是為了運動呢，或者為了拉近和居民的關係才開始耕作？」他想了想回答：「當初是這樣，不過現在好像倒過來，是為了自己想耕作，所以繼續參與運動。」⁸我認為，是在這般參與位置轉變過程中，展現了當代談論「手作都市主義」(Hands-On Urbanism)的積極意義。⁹(圖9.2)

值得一提，菜園村經驗引發「青苗上河圖」的繪製。呼應前幾年上海世博展出「清明上河圖」動畫引起熱潮，香港參觀群眾欣羨畫中呈現的北宋繁華市井，卻多半無知於香港新界既存的耕種豐盛生活，來自香港理工大學有三十幾位設計師組成研究團隊，結合深入訪調和繪圖再現，挖掘菜園村農家生活故事和耕作智慧，繪成「青苗上河圖」¹⁰，隨著繪圖長軸捲開，呈

8 訪談C，18/03/2011。

9 參考“Hands-On Urbanism”(Krasny 2012)

10 周綺薇，蕭競聰策劃(2011)青苗上河圖。香港：Kubrick出版。

圖 9.2
馬屎埔村中農民耕作身影。
(黃舒權攝)



現的是年輕一代企望了解香港農業的過去和未來，探索多元經濟的可能。如同董啟章為文批評：「《清明上河圖》的美好街道生活圖景對我們來說是個「時宜相合」的諷刺。這不但是硬件上的城市景觀的問題，而是民間生活的本質的問題。地產霸權和官方政策合力，在市區重建和郊區發展方面也逐步把原有的民間生活空間剷除。現在反過來由建築師嚴迅奇提出，在西九文化區引入《清明上河圖》的概念，把正在消失中的香港街道生活文化於西九重造，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¹¹

確實，只要有土壤，民間創意都在每日生活中展現。但都市發展以建築鋪面掩蓋土地，以交換價值來衡量土地，把自主人民都馴服為被動的消費者，在節慶表演中才見得奇觀化的「生活」展現，不論城鄉，由下而上的創造空間都被「國家」或「城市發展」的想像掩蓋。由菜園村拉出的各種行動則是另

11 董啟章 (23/11/2010)〈清明上河圖的反諷・民間社會如何被偷龍轉鳳?〉《明報》。

一種論述的過程，每人都用不同方式參與其中，每一個故事累積展演著民主的某一種面貌，去挑戰單一的發展論述。往農村邊緣移動的過程中，說故事的人和土地上的人產生新的關係，一起成為故事中的人物。而這故事還未說完，「土地正義聯盟」成立後甚至推出年輕候選人參與新界代表，力創地方政治新局，持續辦理「八鄉錦田社區報」等等，新界土壤肥沃，故事新頁才正要開始。

■ 馬寶寶：后土而生的感覺地理

另一個例子位在新界粉嶺馬屎埔村。村內田間，越來越常見小木牌標示著紅字「此乃私人土地，任何人士不得內近或使用，違者必送官究治。業主示」。近來有意思的是，一旁出現了風格極為相似的木牌，卻標示：「此乃土地，任何人士歡迎內進使用，用者必安享福樂。主示」。兩者看似雷同卻差異甚大，其實是參與馬屎埔農耕行動的年輕人，試圖表達「土地」是公共自然資源，不能商品化。這只是三年多來的「馬寶寶行動」的一次游擊，創意幽默且一語中的。要介紹馬寶寶行動，得先談由上而下的「宜居城市」(Livable City) 藍圖，將如何改寫香港和深圳之間的綠帶邊境。

九七以前，港英政府視新界北部為天然邊防而少有發展，直到八〇年代後香港九七回歸大勢底定，同時間香港工業生產逐漸北移珠江三角洲，才有道路系統連結廣東南部和新界。回歸後，深港之間隨即展開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工程及規劃研究(俗稱「新界東北三合一」，簡稱三合一，1999-2008)¹²，以

12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諮詢文件摘要 http://www.nentnda.gov.hk/chi/Digest2_Chinese.pdf (Accessed May 20, 2012)

圖9.3

「此乃土地，任何人士歡迎內進使用，用者必安享福樂。主示」。

(由馬寶寶社區農場提供)



「宜居灣區」為主軸，推動綠色基礎建設，多元化土地使用及產業發展。但深究其規劃內容，明顯可見偏重經濟持續發展，雖以宜居城市設計談低碳交通運輸、綠建築設計、公園綠地及都市水岸空間活化，卻少檢討城市生活重度倚賴商品、私有化服務，缺乏生產性地景等問題。宜居城市之論述修辭「漂綠」(greenwashing)¹³，但整體規劃取向由上而下，還是讓發展主義主宰一切。關心環境生態的人，則憂慮綠色基建其實是為了打通連結香港建商囤積農地處。即使新建設強調永續發展原則，開發所造成的農地轉用及農業消失，以及農耕生產實踐所維持之生態系統服務，恐怕得不償失。(圖9.3)

在此架構下，二〇一一年廣東省五市及港澳兩地政府聯合主導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重點建設行動計劃》涵蓋面積近七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涉及約二·五億人口。香港各界人士質疑，

13 Karliner, Joshua. "A Brief History of Greenwash". *CorpWatch*, March 22, 2001. Accessed April 28, 2013.

在此計劃中香港成了「被規劃」的客體¹⁴。民間發起的新界東北關注組認為「三合一」之新市鎮規劃假設有問題，預測香港將超過八百萬人口是不當估計¹⁵。一來，香港人口並無預期般地增加，再者，不斷向新界北發展的城鎮布局，會不會帶動人口遷移和組成的變化？配合「三合一」，香港政府打算增設蓮塘／香園口岸，並且騰出邊境禁區的土地以供發展，以及落馬洲河套區發展計畫，推動高等教育、科技產業、醫療等等。然而，這一波貼近邊境的新城鎮規劃結合道路、關口的打通，將可能引導產業中心的北移、更多勞動人口的流動，沒有人能保證重整後的空間關係仍以香港為首。未來會有多少人開車或搭乘高鐵通勤往返深港？年輕人會不會索性搬離房價高漲的香港，直接北上到深圳或廣州工作定居？這藍圖所推動的究竟是「宜居城市」還是「移居城市」？宜居灣區計畫所編織的香港未來，似乎只是開發更多的「臥房社區」。再進一步來看，這規劃藍圖中預設的居民顯然是資本家或專業白領中產階級，最好是所謂的「創意階級」(Florida 2002)。如此劇烈改變城鄉結構，中產階級持續遷到郊區，而基層農民勞工則可能被迫遷到珠三角地區居住，不僅消解香港的城市公民社會，也撼動新界難得留下的香港本土農業基礎。

位處新界粉嶺北的馬屎埔村，就是個被納入三合一規劃的農村。該村土地多為新界原居民所有，但原居民早已不事農耕，把土地租給五〇年代起陸續抵港的非原居民，多年來營造

14 反對香港「被規劃」—關注「珠三角灣區跨境行動計劃」<http://www.facebook.com/PRDBayArea>，已有超過一萬五千名網友加入。

15 包含粉嶺北在內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畫可算第四代新市鎮，預計2019年完成，容納十三萬人口。

為蔬果農業重要基地。一九九八年香港政府推出「環保城」新市鎮計劃，建商亦風聞而至開始收購土地¹⁶，逐漸趕走農民租戶，隨時配合發展方案開工。雖然環保城計畫無疾而終，新的「三合一」馬上替補，粉嶺北有四個非原居民村（包括馬屎埔村、天平山村、石湖新村及虎地坳村）的土地都將成為建商掌中物。新界東北關注組指出，恆基地產在一九九八年開始收購馬屎埔農地，至今已購得八成土地產權。十幾年來不少農民被陸續「請」走，剩下部分農戶苦撐。馬屎埔對面的「綠悠軒」取名綠意盎然，其前身也是農地，然而高樓不僅取代了良田還遮擋旁邊農田的陽光，乃至於隔鄰小農只能改種粗生的蘆薈。諷刺的是，有些綠悠軒新住戶注意到馬屎埔的菜田和閒置農地，十分有興致地加入耕種行列。

在前述發展陰影下，馬屎埔村仍舊奮力耕耘梧桐河畔南岸的僅存綠意生機。多年來他們對以宜居為名的區域規劃佈設，一無所知，直到建商收購土地趕人，他們才逐漸明白他們珍惜的農耕生活完全在政府規劃中被排除。於是，二〇一〇年夏天，由二十幾歲的居民Becky發起，結合許多其他關心新界東北的青年，成立了「馬寶寶農墟／社區農場」，希望能以創意抗爭實踐來抵抗不當規劃。他們以「馬寶寶」象徵新生嬰兒，充滿可能性，透過永續農業，希望為這全球城市提供健康、安全又美味的有機新鮮蔬菜，重塑城市、鄉郊和人的關係。馬寶寶的信念是：「最優質的食物只能出產於腳下的一片土地／由馬屎埔重新出發／發掘自主生活的可能」，食物、生活、生產·

16 香港地產商和政府互動密切，往往早於政府預定動工十年以上便開始囤積土地，推高地價後再趁勢推出豪宅。參考[四叔四叔，無食我黍]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542>



由這些關鍵字開始，土地和人類的關係需要重新被理解，一如小告示牌上的主張。

馬寶寶透過許多不同活動把城市社群帶到了香港邊界農田，讓人們看見生活的另類可能。他們定期舉辦耕作班，社區導覽和教育活動，讓不曾體驗土地生命的香港市民開始反思生活。在菜園旁，他們示範如何利用咖啡渣、豆腐渣，加上魚肥和紅糖製造堆肥，他們以清晰簡單的道理來提醒「土地就像人類」，維他命永遠不及新鮮食物，唯有複合有機的材料才能提供生命最豐富的營養。馬寶寶邀請各方來探望有機耕作現場，直接把農耕體驗帶給人們，讓參與其中的人感受：究竟耕作是怎麼一回事？農田周圍的地景是什麼模樣？土壤的顏色差異有

圖 9.4
青年組織導覽，Kaikai帶
市民認識馬屎埔周邊的
都市化議題。
(黃舒楨攝)

什麼意義？施了有機肥的田野是什麼氣味？他們致力讓城市人體會到自然農法和飲食健康與大自然生態健康循環的關聯。

他們也連結藝術社群來豐富公民行動，推動音樂會、藝術行動活化空屋、結合港青藝術教育計畫製作「親親土地／馬屎埔地圖」等等。在馬屎埔村內，不常看見抗爭現場常見的悲情訴求或凌亂遺跡，這些腳踩農地也能寫詩作畫的年輕人把村子整理得十分宜人，工作坊不時傳來麵包烘培香，每週舉行的馬寶寶社區農場讓消費者到產地直接購買，不僅拉近生產和消費之間的距離，也拉近了市民和農村生活實踐的關係。從農田到餐桌，每當來人品嘗了手工製作的醬料佐餐，味覺感受中的地景經驗讓市民更容易理解馬寶寶行動的論述，為何而批評，為何而抗爭。這是一種身體力行經營出來的地景故事，透過身體參與空間故事的共同書寫，讓參與者一齊轉化憂慮或恐懼，在共同梳理空間記憶的過程中找到多樣共存的可能性，甚至許多參與者都變成了留下生活的新農民。¹⁷

■ 「土壤」中的知識和力量

以上兩個案例呈現了都市公民行動的新可能。參與者不只要去保護弱勢他者，而是根本地改變自己生活的位置，這不僅是暫時的運動參與，而是藉由運動來改變觀看都市的角度，以及生活的質感和「感覺結構」，如同張小虹（2005）所言：「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成長記憶的房子，老家與童年沒有留在遙遠的另一個時空深處……我們的生活周遭，我們的經驗與記憶，都在身體裡結晶……我們的身體是我們的感覺結構，而我們的

17 有關永續城市須兼顧多元性和都市性（urbanity），並且透過「規劃故事」來達成，可參考Sandercock（2003）。

感覺結構卻又不時溢出我們的身體。」生活經驗的累積隨時影響著「感覺結構」，「一如所有軟的、硬的、乾的、濕的結構都在微調……感覺結構是認知地圖，也是情感團塊，感覺結構更是逃逸路線。」在這感覺結構時時微調的「運動過程」中，人們重新理解都市形成的過程與城鄉之間的有機關係。近年來在香港新界興起的農耕實習，具體顯現了這個新的「運動過程」。類似馬寶寶耕種班的實踐，啟發了不少人呼朋引伴一起租地學習務農。二〇一一年間，我曾隨幾位香港朋友去勘查土地，體驗深刻。夢想從物色土地開始，必須換上輕便裝束以便踏勘田野，在地圖上無法獲知的具體地理細節，都需要行走觀察（圖 9.4）。在香港要買地並不容易，涉及道路進出權利，要和新界原居民地主交涉；要買一塊土壤乾淨未受污染的土地更難，需要注意附近利用狀況，屋舍、水源、地理現況等等，因為大量建商囤地，等待動工前空檔可能長達十年，建商往往把土地出租給停車場經營或貨櫃倉儲堆置，嚴重改變地貌，影響周邊生態環境。所謂「土地儲備」，形同本土農業及生態的劊子手¹⁸。

踏勘田野過程中，人們以親身體驗來重構空間認識。例如有位歷史老師和朋友們發起「鄉土學社」，既耕作也學習，希望能認識戰後香港的土地發展中許多有待釐清的關係。他們發起「鄉土學社」，在上水梧桐河畔華山村租地務農，以土地為師，以英文縮寫「SoIL」(Society for Indigenous Learning)來表達對「土壤」的重視¹⁹。他們走入田野實踐農耕，也促成了新的社區關係。他們尋求附近商店支持提供有機廚餘材料作為

18 參考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專文 http://northeastntconcern.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10.html (accessed on 04/27/2013)

19 「鄉土學社」網誌 <http://soillk.wordpress.com/>



堆肥，包括搜集豆渣、藥材渣和木糠等等，無形中年輕參與者也透過收集廚餘才真正和社區建立關係。有些從小在當地長大的年輕人，因為忙於就學工作，從來只當自己是過客，反而因此農耕經驗才讓自己理解社區。越是參與，他們越堅定地認同自己是「實習農夫」，不是週末玩玩的假日農夫。除了耕種，他們也搜集村民「口述歷史」，透過身體經驗來累積土地中的香港歷史。（圖9.5）

圖9.5
因港青藝術計劃帶來的馬屎埔村屋壁畫。
（由馬寶寶社區農場鴻飛提供）

取看SoIL的多重意義，「土壤」或可作為一個新比喻，激發有關都市空間行動的多元思考。以土壤來比喻，那實踐基礎是溼潤有養分的，土壤顆粒間有縫隙有水分，需要適當鬆動，



才能讓植物根部呼吸，維繫土壤間微生物，甚至蚯蚓和蜘蛛等昆蟲的生存空間，也要考量不同植物社群如何共存。這是一組複雜的生命關係，是有溫溼變化的生命動態，不同於一般公民行動研究的權力或階級分析注重結構，也非同「公共空間」等抽象的概念，以及僅重視語言的理性溝通²⁰，土壤物理呈現的複雜性讓我們更注意到空間實踐的流動（fluidity）和感染性（transformative action），以及超越語言與文字的土地感官經驗。重新建立身體和土地的知性與感性關係，以「身體過程」（bodily processes）詰問空間，這漸趨潤澤的空間行動

²⁰ 例如有些討論以「論述民主（discursive democracy）」取代「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Beauregard 2003）

圖 9.6

因港青藝術計劃帶來的馬屎埔村屋壁畫，描繪曾經住在村中的「貓仙人」照顧群貓的故事。

（由馬寶寶社區農場馮飛提供）

經驗，挑戰人們對於「地理／界線」的僵化理解，去注意許多實體存在充滿孔隙，也沒有固定邊界（Grosz 1994; Haraway 1991）。於是，看似理所當然的「城鄉發展矛盾」——如果不往郊區發展將無法紓解都市壓力，必須被質疑；看似理性的都市土地使用和發展方向，也應該被檢討，不管是城市居民面對都市更新，還是弱勢新界非原居民面對因大型開發的迫遷，問題底層都有階級問題，而階級構成關連著資本流動和權力展現，都以土地使用為運作基礎，不分城鄉。鄉間實踐所重新挖掘出的「土壤中的生命」，照見城市的乾燥蒼白無生命力，正是新社會運動契機，從吃到住，由下而上地挑戰香港中環所象徵的全球化城市生活，二〇一三年春天在香港展出的「新界東北 style：生活可以是這樣的」²¹，即為一例。

■ 結論：都市公民行動的動／感地理

參與土地運動的行動者，逐漸把這些新的認識累積成批判性論述，帶回都市中心，直接挑戰土地不足的迷思所演改了的土地分配不公真相²²。長期關心香港新界土地問題的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表示：「將反映現實的數字收藏（註：刻意掩飾土地分配的真實統計數字），只是框在香港『地少人多』、『農地荒廢』的印象裡討論問題，增加土地供應的說法就此不脛而走。這為我們帶來了如布希亞所描繪的後現代深淵：我們失去了基本地理認知作參照，只能浮游在純粹的象徵與符號的話說

21 「新界東北 Style」是個藝術展覽，集結多位視覺藝術工作者作品，展現新界生活面貌和人物。在2013年五月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展出。可參考 <http://thehousenews.com/gaze/> 活在新界東北的人/

22 可參考本土研究社（2013）《不是土地供應：香港土地供應的迷思與真象》。

世界裡，的確是不知所云²³。確實，後現代的語言權力操作脫離了物質和地理參照，還強勢主導了現代社會對於空間社會運作的思考和判斷²⁴，也造成政治社會運作脫離空間實存的危險。這一波移向田野邊界的運動，讓人有機會更辯證的來看空間之相對性，暨抽象又具體實存，藉由行動者的身體占有，我們才感知到空間存在，才能理解地景深處蘊藏的都市化課題。換句話說，是日常身體經驗的累積構成了空間，是青年移動腳步，離開乾燥的廣場鋪面而踏進了溼潤的農田，以身體勞動經驗來「占領」土地，才讓長久被忽視的農田和農耕實踐，重新被香港社會看見。這沾滿塵土泥水的「占領」，不再只是日常生活語言中的抽象使用，「占領」落實於空間地景的改變中²⁵。(圖9.6)

葛蘭西一再提醒我們 (Gramsci 1971)，資本主義的操作，莫非是不斷的打造新的勞動身體 (laboring body)。傅柯 (Foucault 1979) 則以監獄的創造來說明「身體規訓」(docile bodies) 之打造。上述的田野行動以身體參與直接挑戰新自由主義霸權，重新定義勞動價值並挑戰身體規訓，每一個積極身體 (active bodies) 的姿勢都在挑戰資本主義經濟定義的「時間空間」(spacetime)，突破無所不在的規訓權力。

除了地理意義，土地中還有太多不易言喻的生命能量，形塑人類關係，甚至能修補種種被現代國家暴力毀壞的社會文

23 原文章〈誰抽了海洋的水〉，刊載於 Breakazine Vol 21。

24 如亨利·列斐伏爾 (Lefebvre, 1991) 指出為空間專業者主導的「空間的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 與日常生活中「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 兩者的差異。

25 列斐伏爾指出「占領」的空間實存意義，原文可參考“The metaphorical term ‘occupy’ is borrowed from an everyday experience of space as already specific, already ‘occupied’” (Lefebvre, 1991)

化，其潛力值得我們去理解。《土地知道我的名字》(Klindienst 2006)一書描繪移民適應生活，如何藉由耕種連結過去和未來，透過雙手勞動，在異地重新耕耘出和諧的生命敘事和景觀相異的園圃，既是一種文化抵抗，也是癒療行動主體傷痛的生命力來源，而那力量來自種子深處的神秘記憶，蘊育著「耕作主體」(gardening agency)。生物過程往往是一個奇妙過程，由混亂的有機事物中互動孕育出形體清晰的生命秩序。那過程提醒我們，生命存在超越理性分析的限制。

香港這一波向邊界而去的新都市公民行動，呈現了移動參與位置的重要性，同時，由改變身體經驗來開始和城鄉環境重新對話，體會身體和社會的相互改變。於是，都市公民長久以來乾枯且異化的身體政治能力，才能被大地潤澤，孕育新的視角和能量。憑藉著動／感地理來尋求「城市的權利」，不只是移動游擊位置，更在移動同時，因身體空間經驗的質變，拔土而出的改變了都市公民對於「城市」的想像。

參考書目

- 本土研究社 (2013) 不是土地供應：香港土地供應的迷思與真象。香港：本土研究社。
- 司徒薇 (2011) 思考香港新社會運動。頁47-62。本土論述2010：香港新階級鬥爭。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編。台北：漫遊者文化。
- 張小虹 (2005) 感覺結構。台北：聯合文學。
- 周綺薇、杜立基、李維怡 (2007) 黃幡翻飛處。黃幡翻飛處：看我們的利東街。香港：影行者有限公司。
- 劉潤和 (1999) 新界簡史。香港：三聯。
- Beauregard, R. A. (2003) Democracy, Storytelling, and the Sustainable City, in Eckstein, B. J., and Throgmorton, J. A. (eds.) *Story and Sustainability: Planning, Practice, and Possibility for American Cities*, pp. 65-77.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lorida, R.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Perseus Book Group.
-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Grosz, E. A. (1994)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araway, D.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Hou, J. (2012) Beyond Zuccotti Park: Making the Public. *Places*. SF: The Design Observer Group. Online Available: <http://places.designobserver.com/feature/beyond-zuccotti-park-making-the-public/35658/> (accessed: June 18, 2013)
- Klindienst, P. (2006) *The Earth Knows My Name: Food, Culture,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Gardens of Ethnic Americans*. Boston: Beacon Press.
- Krasny, E. (2012) *Hands-on Urbanism 1850-2012: The Right to Green*, Hong Kong: MCCM Creations.
- Lee, Eliza W. Y. (2010) *Public Policymaking in Hong Kong: Civic Engagement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a Semi-Democracy*, pp. 85-87, London: Routledge.
- Lefebvre, H., Kofman, E., & Lebas, E. (1996) *Writings on cities*, Cambridge, Mass,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 Sandercock, L. (2003) Dreaming the Sustainable City: Organizing Hope, Negotiating Fear, Mediating Memory, in Eckstein, B. J., and Throgmorton, J. A. (eds.) *Story and Sustainability: Planning, Practice, and Possibility for American Cities*, pp. 143-16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0

公共空間行動主義

多倫多與溫哥華¹

PUBLIC SPACE ACTIVISM, TORONTO AND VANCOUVER

USING THE BANNER OF PUBLIC SPACE TO
BUILD CAPACITY AND ACTIVATE CHANGE

ANDREW PASK —— 文

顏寧 —— 譯

「反對汽車占領公共空間」，這個以Times New Roman大寫字體橫跨三行的句子占據報紙的頭版，下頭的文章引用了楷德（Curtis Guild）的名言：「一個侵占公有地的城市人，應該受到所有喜愛美好城市市民的堅決反對」。文章中，我們發現楷德先生是波士頓公園協會（Boston Common Society）的會員，波士頓公園協會是一個公開反對城市汽車俱樂部提出將部分綠帶作為停車空間構想的市民組織。

近年來，這類故事開始每天在全世界的新聞報導和部落格

1 我非常感謝TPSC的Dave Meslin與空間雜誌（Space Magazine）的Dale Duncun和Matt Blackett 分享他們對多倫多公共空間行動主義發展的瞭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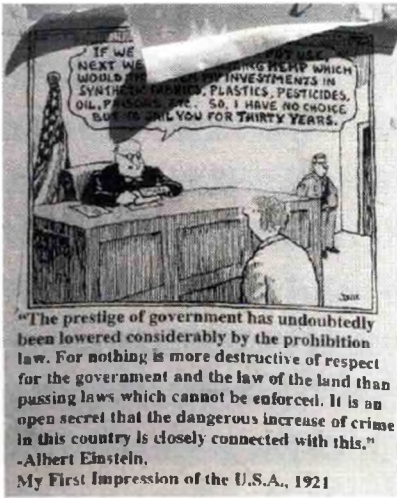


圖 10.1

多倫多街道上的海報。多倫多公共空間委員會 (TPSC) 成立的動機之一，就是反對張貼條例的計畫。市民擔心該條例會剝奪在公共空間張貼訊息的機會。

(照片來源：VPSN)

中出現。從新聞檔案中搜尋「公共空間」的關鍵字，我們可以發現自九〇年代中期後出現大量文章。文章的細節雖然不同，但主題卻非常相似：市民團體、草根團體，有時候甚至當地政府，帶頭創造原本不存在的公共空間，或是重新取回過去失去的空間，也有把過去不理想或功能不足的空間賦予新生命。

當越來越多人使用公共空間一詞，同時發生的是環繞在「公共空間」的意識覺醒與對話。「公共空間」一詞成為都市規劃、草根組織與社區發展倡議的一部分。「公共空間」被視為是確保正面社會關係與福祉的構件 (Dines and Cattell et al, 2006)，幫助城市和社區裡的社會融合 (Eberle and Serge, 2007: iii²)——不只是為了一般大眾，也為了那些可能遭受邊緣化和排除的族群。公共空間一詞具有多重字面上和隱喻上

2 像是 p.iii 所述，「公共空間，作為一個共用的都市核心，在關於城市包容性的有限的論述中，扮演了一個核心的角色。該公共空間為不同背景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慶祝的活動空間，並成為城市象徵性的核心。」

的意義 (Brodin, 2006)，它被理解為健全民主的一部分 (詳見 Habermas 1962/1989 中對於公共領域的討論)、一個面對企業入侵威脅的場域、一種對於日益私有化的實質 (和心理) 地景的解藥 (例如 Klein 2000: 35-38)，以及一種非排他的空間，讓所有市民在無需門票的狀況下，自由進出。

在這個過程中，「公共空間」成為一個動員的詞彙，讓許多行動者和組織因而結合。「公共空間」有時是運動的焦點，有時只是附帶但卻依然重要。以楷德先生的組織為例，他們集結了在地、立即與個人的力量，來保護拉法葉大廈和特萊蒙街之間的綠地。在今天，許多城市裡大大小小的團體，依舊在從事類似的努力。

波士頓公園協會的工作和抗爭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它發生於一世紀前的一九一四年三月³。對於今天的行動者來說，它有助於我們了解城市行動主義和公共空間倡議工作之間的時空脈絡。在這裡，我試圖從兩個加拿大城市——多倫多 (自二〇〇一年起) 和溫哥華 (自二〇〇五年末開始)，來談「公共空間行動主義」的概念在當地如何被推展，超越個別案例的參與，朝向更全面的 (城市公共空間) 敘事前進。

■ 轉變中的公共空間與公共空間行動主義

在北美洲，傳統規劃理論中提到，從六〇與七〇年代開始，帶有現代主義思維的「規劃技術官僚」的影響力逐漸走下坡，而由市民領導的規劃和倡議逐漸興起。這些由市民領導的

3 文章標題是〈反對汽車占領公共空間〉，是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七日的基督科學箴言報頭版。這是我所能在報章媒體中找到，最早使用公共空間一詞的例子。

規劃案推動了鄰里尺度的小發展，過程中更強調多元主義，爭取在地的公園、人行道、圖書館、兒童看護等服務⁴。這項變化雖然確實反映了市民規劃行動實質的成長，但卻也隱藏了「反叛規劃」更長遠的緣由⁵。從一個世紀前波士頓公園協會一文（以及報紙檔案與其他城市社區布告欄可找到的類似文章）來看，與公共空間（作為城市環境一部分）相關的衝突，早已是更廣脈絡的抗爭歷史的一部分。

自從過了千禧年，我們在多倫多和溫哥華看見了市民組成的公共空間倡議團體逐漸成形。不同於一八八九年的市民團體、一九一四年的波士頓市民協會，或其他任何後繼團體，「公共空間」成為這些團體的共同號召與統一的訴求。對前者而言，焦點是在一個特殊的空間，這個空間不一定會被稱為「公共空間」（而且通常沒有這個語彙，這也是波士頓市民協會案例為什麼有趣的原因）；而對後者來說，公共空間的概念本身就是主要的動力，是城市空間中不同活動的焦點。

換句話說，「公共空間」現在本身就是個目的，或如肯威爾（Mark Kingwell）說的，它已成為「時代的主要符號」（Kingwell 2008: 1）。它不再只是公園或水岸，而是城市全貌裡的某空間，這空間連結不同的端點，包括使用這些空間的大眾。公共空間絕不是令人畏懼或沒道理的（Kingwell形容它是一個「放任的」、「靈活的」，和「不按牌理出牌」的「牢籠」）。相反的，

4 請見 Davidoff (2003)、Friedmann (1987) 的例子。

5 的確，很難確切地說市民領導的參與行動，在都市規劃、建築和都市建設中的歷史有多久。舉例來說，所謂「市民領導」或「參與」的界線並不如我們所想的清楚。其次，隨時間過去，許多個人與團體的意見，已經在他們曾試圖影響的城市中消逝。

我會說公共空間是個十分有效的整體概念和行動口號，讓人們日益喜愛公民議題、社區空間，以及我們在城市裡平日生活的經驗。

在討論這兩個組織的工作之前，我希望先完整交代這些改變的脈落。我相信自覺與自省的「公共空間行動主義」是相當創新的發明，雖然它曾經以許多不同方式存在於不同團體和組織的工作中，像「開放空間協會」(Open Space Society)、「公共空間計畫」(Project for Public Space)、「佈告板解放陣線」(Billboard Liberation Front)、「收復街道運動」(Reclaim the Streets)等團體⁶。我認為「公共空間行動主義」的概念有三種不同卻又重疊的用法：它是詞彙變遷的產物，同時也反映了範疇界定上的變化。

6 現今多倫多公共空間委員會 (TPSC) 和溫哥華公共空間網 (VPSN) 的整體性的公共空間行動主義，受惠於先前的理論家、作家、藝術家、市民團體、草根組織和基進主義者。在這些先鋒當中，最直接有連帶關係的組織，有一部分是來自一九六〇年代晚期萌芽的議題導向團體。最有名的例子包括幾個在不同城市 (包含多倫多和溫哥華) 的反高速公路團體；「布告板解放陣線」(一九七七年在美國成立，帶起一九八〇年代晚期的「文化干擾」運動)；「收復街道運動」(一九九一年從英國出現，而後擴展至世界其他城市)；「單車復興運動」(一九九二年從舊金山開始)；「監視器玩家」(一九九六年從紐約開始，使用街道劇場凸顯公有與私有監視器擴張的問題)。此外還包含議題導向的都市行動主義，尤其是一九九〇年代晚期到二〇〇〇年早期的反全球化和全球公正組織，引發公有與私有、全球與在地相互關係概念的討論。最後，公共空間行動主義也擁有強烈的規劃和設計內涵，像是珍雅各 (Jane Jacobs)、威廉懷特 (William Whyte)，和像「公共空間計畫」(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一九七五年從紐約開始) 與「波特蘭城市修補」(Portland City Repair) 等組織。可以參考 Smith (2004) 對街道復興運動多倫多分部的描述，分部的部分成員後來參與了 TPSC 的創立。

I 「公共空間」的前身

在公共空間尚未成為普遍用語之前，其實就已經有很多跟公共空間相關的反抗行動。這些包括跟公共領地、封閉空間等相關的歷史爭議，同時也有許多近代行動主義範例。當今的記者、學者和行動者，很容易將過去這類的活動與「公共空間」做連結，而將「公共空間」一詞置入該情境中，儘管偶而會令人有時光倒置的感覺。像最近葛希（Peter Goheen 2000）討論十九世紀多倫多社區參與水岸規劃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以下是他所引用的觀念：

公共空間或「共有地」重建的淵源，在英國歷史中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六四九年倫敦效外，占領了聖喬治丘的一群基進的、沒有土地的老百姓。他們被稱為「真實破壞者」或「掘土派」。（Social Centre Stories 2008: 1）

正是這樣的公共空間（由印刷技術和閱覽創造的「中間地帶」）以及大眾啟蒙的可能性，使約翰米爾頓在一六四四年十一月出版《最高審判》一書，得以藉此辯護印刷的自由權。（Rahe 2008: 182）

還有許多這類的例子，每一個案例均讓我們重新評估公共空間在我們社會歷史中的角色。許多過去的爭論，現在已被置入公共領域，這個更大的敘事脈絡當中，為我們今日對公共空間一詞的理解，增加寬度和豐富性。

「公共空間」的出現

第二個類別裡，公共空間是透過行動者的特殊行動、議題和干預，與所謂的公共領域連結。在這裡，公共空間的概念被用來從事動員與幫助理解（而非只是學術研究的對象）。關鍵的是，這些行動被視為公共空間的「一種案例/類型」，在某一議題的脈落中被用來動員群眾。「公共空間」提供了行動的（部分）基本理由，變成行動的一部分。舉例來說，受威脅的公園、街區或廣場會因為被認為是「重要的公共空間」，而引發關注。這個類別指的是早期對「公共空間」一詞的使用，以及當代的許多用法。在此，公共空間比較不是統一的概念，而是描述其他事物的用詞：它是一部分，但不是整體。

有趣的是，搜尋數個資料庫的結果顯示，相對於現今的普遍性，過去使用「公共空間」的想法比我們想的狹隘得多。波士頓公園協會一例，是一八五〇年到一九五〇年間少數使用到公共空間一詞的報導之一。法律資料庫裡也同樣缺乏對於公共空間的敘述，以加拿大為例，法庭上第一個提到「公共空間」的法庭紀錄是出現在一九一六年⁷，但接下來的數十年間卻沒再見過。

這些歷史紀錄，有助於我們了解現代「公共空間」詞彙的來源與使用方式。這似乎顯示「公共空間」的概念，是在過去三、四十年間才快速出現與成長，而只在過去十至二十年內

7 詳見Elliott v. Fraba (1916)的判決，三位法官Meredith、Riddell與Lasten負責整個過程。紀錄如下：「那時日光仍明亮，公共空間裡有些人站著、有些人在馬車上。被告乘著車撞過來，有位年輕女士站在為了公眾使用而設計的路緣旁邊。」

(根據有限的文獻)，才有實質的發展。⁸

公共空間行動主義

前幾個段絡中對「公共空間」的分法，雖然看起來似乎沒有必要，不過為了釐清與公共空間有關的反抗行動的轉變，我們需要觀察從波士頓公園協會、「監視器玩家」或「單車復興運動」等一類的行動，到更聚焦的「公共空間行動主義」之間具體的改變。事實上，多倫多公共空間委員會、溫哥華公共空間網與本書的其它案例，和過去的案例即有一些操作上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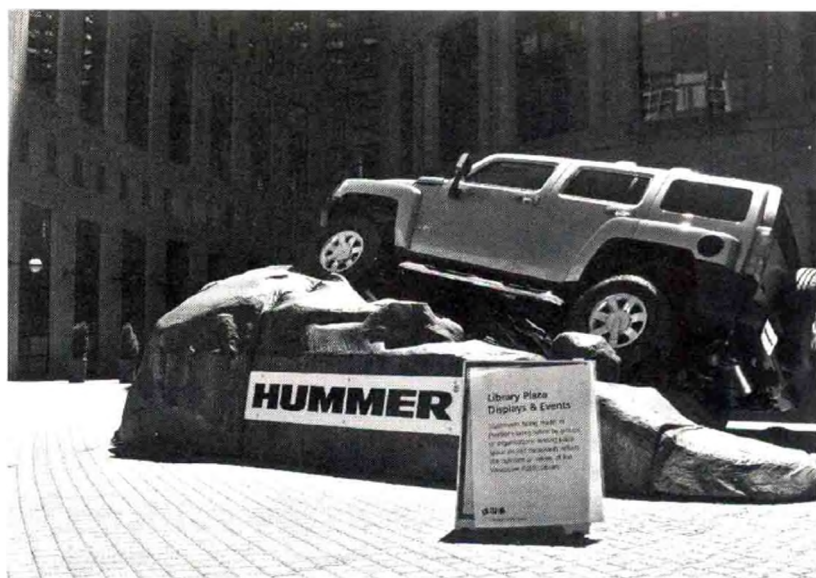
我要說的是，「公共空間」本身已成為社會運動和行動主義的趨動力，而且是相當具策略性的。「公共空間行動主義」做為一個廣泛的概念，連結了原先不同的社會行動，並動員了原本與行動沒有關係的群眾，提供更可親、更常民的倡議和公民參與語言。具體而言，「公共空間行動主義」有助於連結之前各自獨立的運動：像收復街道運動、園藝游擊、公園倡議、無障礙行動、反監控、反招牌運動、街道藝術、進步都市計畫和設計等等。雖然這些行動讓公共空間一詞的用法變得太「鬆散」或「散漫」，但公共空間行動主義是一個創造連結、強化社會運動網絡的精彩手法。事實上，這個向外尋找和建立連結的決定，對於像「多倫多公共空間委員會」(TPSC)和「溫哥華公共空間網」(VPSN)這類團體來講均是有意識的選擇。

8 事實上，從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數個大學資料庫搜尋的結果，我們找到首次書名出現「公共空間」的例子是一九七三年Lyn Lofland的《陌生人的世界：都市公共空間的秩序和行動》。一九七〇年代的出版物僅偶而使用「公共空間」一詞，到了一九八〇年代頻率開始變高，但直到一九九〇與二〇〇〇年才開始大量出現。

圖 10.2

因憂心公共空間的財團化，催生了溫哥華公共空間網（VPSN）的成立。這是通用汽車在溫哥華中央圖書館外廣場，為新款越野型休旅車「悍馬」辦的造勢活動。

（照片來源：VPSN）



公共空間行動主義的實踐：TPSC 與 VPSN

多倫多公共空間委員會成立於二〇〇一年，但一年後才有正式的組織形式。溫哥華公共空間網的想法則是從二〇〇五年開始，但也在一年後才正式成立。這兩個組織的誕生都來自一連串事件的催化。對多倫多公共空間委員會的創始成員來說，一開始的動機是來自於一個即將架設在城市最大綠地之上的電子廣告看板，多倫多市民很快相應提出新的反張貼條例（圖 10.1）。溫哥華公共空間網的成立，則是為因應通用汽車在市立圖書館前為新款越野型休旅車「悍馬」舉辦的造勢活動（圖 10.2）、一份在市中心裝設監視器的警方計畫書，和號召朋友一起進行游擊園藝的計畫。在這兩個案例裡，行動的焦點不在於個別議題的特殊性，而是用「公共空間」的訴求把各個行動

表 10.1 多倫多公共空間委員會 (TPSC) 的主要議題

議 題	內 容
TTC TV	多倫多公共運輸系統的廣告影片
媒體大亨Viacom的違規手段	違規的街道傢俱和廣告
怪獸垃圾筒	反對有廣告意涵的垃圾筒
反張貼條例	街道張貼條例倡議
拆除市中心圍籬	鼓勵自發性移除柵欄圍籬的計畫
廣告車	反對行動招牌倡議
招牌大隊	監控違規招牌的設立
感謝騎乘	提倡和支持自行車運動
藝術攻擊	對付街道傢俱廣告的臨時街道藝術裝置
游擊園藝	在公共空間種花種草
人之河	被掩埋的下水道
拍賣城市	命名權拍賣

表 10.2 溫哥華公共空間網 (VPSN) 的工作小組和主要活動類別

工作小組	活動類別
財團化	市民命名權倡議、監控違規招牌
民主空間	市民和省區選舉、主要的政策討論和辯論
綠地 (四個工作小組)	公園、社區綠地、社區堆肥、游擊園藝
地圖繪製和路標	標注舒適和有問題的空間、游擊路標
公共藝術	街道藝術、公共空間電影、公共藝術政策
監控和安全	監視器、私人保全、社區警察
運輸	自行車設施、行人友善的社區、公共運輸
都市設計	回顧主要的都市規劃案、評估公共空間、設計競圖
組織發展	溫哥華公共空間網的操作和策略規劃
宣傳	網站、電子佈告欄和背景資料
活動	捷運派對、公園慶祝活動、擺攤和社區活動
志工統籌	志工訓練、依照志工專長分配任務

圖 10.3

溫哥華公共空間網為了
2008年市政選舉所出版的
《公共空間宣言》。

(照片來源：VPSN)



串連起來，這樣的作法的確奏效。⁹

接下來的幾年，TPSC和VPSN所從事的行動雖然有些調整，但核心議題並未改變。表 10.1 與表 10.2 是兩個組織的主要行動內容。因組織發展策略不同，兩個組織在有限的資源範圍內各自關注不同取向的議題。TPSC將組織分成幾個不同的子委員會，運作特殊關注的議題（如反張貼條例、反對媒體大亨Viacom的違法活動）。VPSN把組織能量放在不同的工作小組，在個別的行動中涵蓋了廣泛議題（如財團化、都市設計、公共運輸）。此外，VPSN也成立了幾個內部工作小組，從事網絡的組織規劃、媒體公關、志工培訓以及舉辦特別活動。

從上述提及的活動，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兩個組織架構下的異同之處。TPSC大部分關注的內容是更大的財團化議題；VPSN則擁有像都市設計工作和社區花園等次領域。兩個團體都有廣告招牌和游擊園藝的工作，規劃的活動也有「如果這

9 VPSN的案子也幫助許多公共空間網的成員熟悉TPSC的工作，使後者成為一個先例。

是公共空間，這就是可抨擊的對象」(“if it’s public space, it’s fair game”)的相同理念。實際上，兩個團體的概念互相影響了彼此。多倫多公共空間委員會向西傳達了反張貼和在捷運系統辦嘉年華活動概念；而VPSN對於公共空間的命名權和監視器提案的想法，則往東傳開。

這兩個組織的運作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市民團體本身也必須被視為一種公共空間來運作，包括組織的會議通常在公共機構舉辦，開放大眾參與，程序儘可能民主。這意謂強調共識的決策方式、透明的規劃過程，以及鼓勵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和志工。

■ TPSC與VPSN作為「反叛」的中介者

反叛 (insurgency) 的概念對公共空間倡議團體而言是十分新鮮的問題，因為這表示這些團體有個單一、具體的反對對象。但事實上，至少對多倫多公共空間委員會和溫哥華公共空間網而言，事情並沒那麼簡單。他們關注的不僅是「國家」、「私人利益」或「企業財團」的影響，還有公共空間普遍的「威脅」。因為公共領域裡的操作經常是掌握在關鍵的有力掮客上，而這個場域是流動的。在溫哥華，VPSN經常強烈反對不利於城市公共空間的市府政策、計畫和管制措施(圖10.3)。VPSN不只支持積極的法案，同時也 and 市民合作，共同舉辦活動(圖10.4)。於是，這些對話成了活動的特點之一。同時也讓人覺得，由不同部門和機構所組成的地方政府，比原本想像的來得多元許多。

在多倫多和溫哥華的公共空間行動主義，其實跟所謂的無政府主義沾不上邊。事實上，公共空間行動者甚至習慣利用不

同的國家機制，來進一步推展他們的主張：包括，市民代表制、鼓勵市民參與，等等，此外他們也動員媒體和進行其他較傳統的倡議和行動。的確，兩個組織的部分工作，就是推動讓溫哥華和多倫多市政府強化既有的規範。「公共性」論述的本身，即涵括了國家作為中介的概念。

作為反叛的一種形式，TPSC和VPSN雖然選擇在政策和規範的體制內運作，但他們也試圖在體制的框架中探尋最大的可能性。對於私部門的態度也是如此，兩個團體都理解「企業」不必然都是同質的，在兩個城市公共空間扮演相當角色的私人企業也可能有十分不同的價值和方向。就像在建築和都市設計事務所，也會為了不同的開發商、製造業、店家、商會等客戶服務。因此，VPSN在與不同開發商合作創造社區園圃的同時，他們也鎖定戶外廣告招牌公司為對象，監督他們的廣告設置。

在兩個城市的案例裡，不管TPSC與VPSN從事什麼樣的活動，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公共性在公共空間的屹立不搖¹⁰。他們的反叛是主動出擊的，同時也依情境而反應，但他們針對的目標已不再像過去固定、刻板或二元對立。

■ 缺點和機會

新公共空間行動主義有其優點，但也有需要留意的限制。在花了些時間整理公共空間行動主義的新形式後，最後我希望藉由回顧TPSC和VPSN工作中提到的部分議題，來作結論。雖然還有其他可能有關的因素，我姑且提出最相關的五項要

10 VPSN經常在簡報和工作坊中使用「公共性」一詞，該詞也反映了Melsin、Duncan和其他人所描述的TPSC的哲學。特別是我在二〇〇七年秋天與兩個組織的對話中也經常聽到。

素：廣度、多樣性和包容性、「公共空間」的衝突與矛盾、資金和「權力下放」。

► 工作的廣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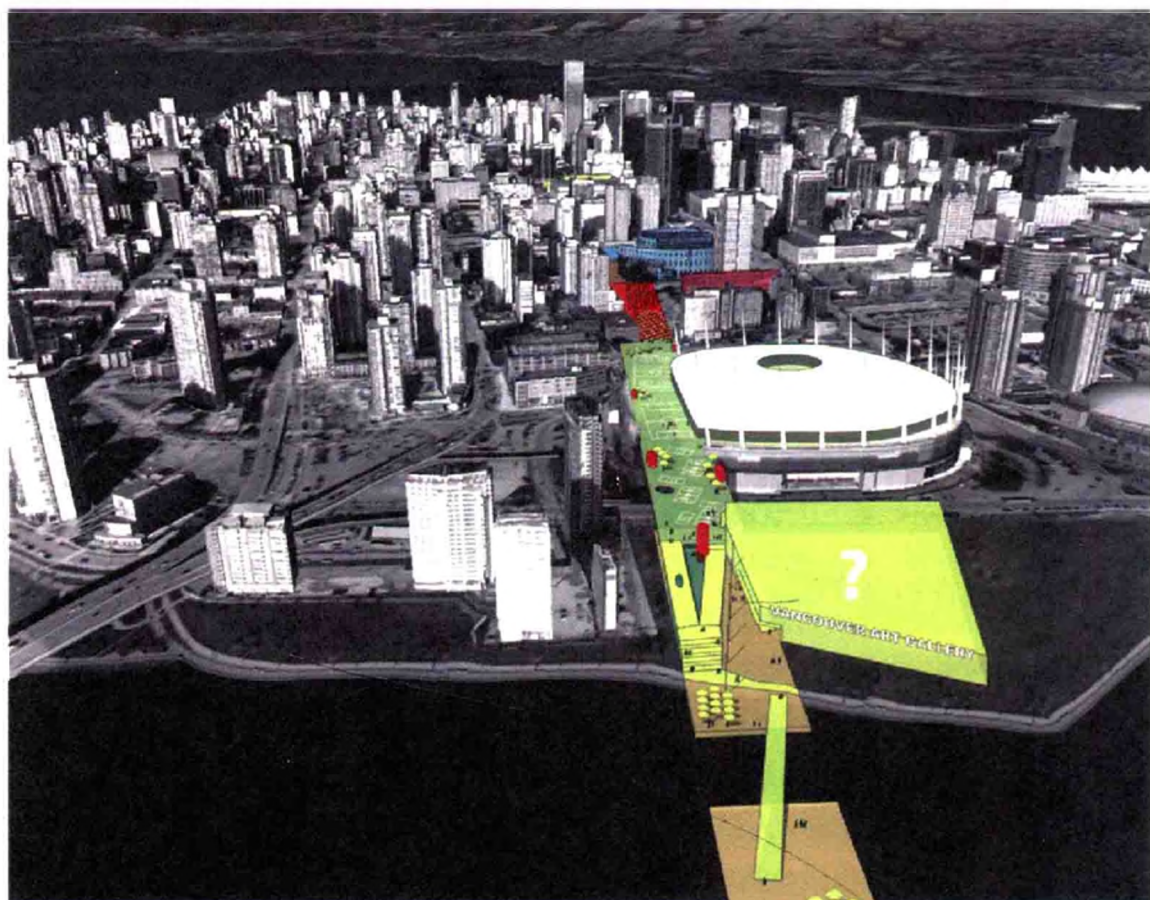
第一條是最清楚的：公共空間議題的廣度，往往遠超過單一議題的關注。因此運動團體需要嚴謹地安排志工人力，平衡不同的需求。團體需有適應力強的結構，才能適度拓展工作、管理志工資源，且仍能維持整體堅強的凝聚力。從VPSN的案例來看，定期的組織發展會議和規劃工作，以及定期檢視當前的議題，都有助於維持工作的廣度。

► 確保多樣性和包容性

Low、Taplin和Scheld（2005）在他們對文化多樣性和城市公共空間的研究中提出，開放空間的規劃有必要更多元，以反應城市人口變動的特性。更明確的說，城市的規劃需要更大的包容性，來回應城市人口中族裔文化和經濟的差異。TPSC和VPSN的工作也以此為理念，儘管實際操作的結果還是不能盡如人意。這不表示兩個團體的會員都是同質的。實際上，來參與會議和活動的人，有著不同年齡、族裔、人口和其他的背景。我們必需再加強，確保這樣的包容性能再延展，包容更廣、更多樣的族裔文化和經濟族群。

► 「公共空間」的衝突與矛盾

當肯威爾將公共空間比喻為牢籠，他的說法部分是緣於公共空間過於廣泛的使用。他哀悼公共空間成為一種工具，用來「保衛（或攻擊）建築物、責難（或慶祝）市民廣場；促進（或



THE BAND

圖 10.4

溫哥華公共空間網舉辦的「廣場在哪裡？」設計概念競圖，意圖促進市民對設立新的聚會場所之議題提出討論與提案。（設計：Mark Ashby & Greenskins Lab）

告發)塗鴉藝術家、滑板家、不守交通規則的人、跑酷愛好者、砸派的游擊隊、地下奪旗運動愛好者、快閃監視器剋星，以及其他抵抗體制的日常反政府人士」(Kingwell 2008: 18)。也就是說人們對於公共空間常有不同的意見，也因此在此定義上造成困擾。但與其是個問題，我反而認為這就是公共空間概念的優點之一。它是可以被開放討論和辯論的，並且激發各種不同的意見，無論是讚美或指責。只有在詞彙使用上變得顛三倒四

時，才可能發生超出負荷的語義。就像我們城市辭典中其他豐富的詞彙，公共空間不是巴別塔，沒有人因為其擁有引發對立反應的能量而指責「藝術」。

► 資金

許多人都喜歡自願關注公共空間議題。事實上，幾年前 TPSC 還獲得媒體的認可，得到「最佳志工組織」一獎。雖值得高興，但也令人感到悲哀，這顯示很少有加拿大的贊助機構願意支持具整體和整合性的公共空間活動，造成像 TPSC 和 VPSN 這類的組織需要完全由志工主導，透過志工的時間和經歷、私人捐款，以及一些小型社會企業（占最大部分）的支持來維持運作。公共空間的議題，往往被贊助單位給忽略。這在運作主要計畫時是個不利的條件，儘管也激勵了一些創意思考的點子。

► 「權力下放」(Downloading)

近年來有許多關於權力下放的論述：政府上層組織轉移不同服務項目與責任給當地政府（但沒有一併移轉預算資源來適當管理這些計畫）。過程中較隱晦的是，當地方政府負荷過重（或可能是不情願）時，公共空間的關注團體其實是有可能來分擔這些諮詢工作與政策、綱領與條例的分析，以及社區規劃工作。

I 結論

作為一個組織守則與行動口號，公共空間的概念開啟民眾對於城市空間的關注，讓不同類型空間之間的連結變得清楚，

像公車、人行道、社區花園、市民諮詢、視覺環境等等。它也幫助我們釐清與都市環境互動時的連結以及一般的威脅和機會。過去幾年間，在多倫多和溫哥華所起步的公共空間行動主義，採取了整合性的方法，將公共空間視為一個包羅萬象的、通盤的和多層次的概念，連結許多實質的和概念性的空間。雖然行動本身是個別的（如TPSC的反張貼專案，或VPSN所舉辦的新公共廣場概念競圖），但這些行動卻都建構與陳述在更大的公共空間框架中。

TPSC和VPSN的公共空間行動者已利用機會，創造出多樣的合作網絡，並透過這些管道推展共同的討論，以及動員原本分散的團體或提案，組織成更一致的回應，最後形成一個由藝術家、學者、自行車騎士、市民自由意志論者、經濟學家、鄉民都市規劃者，與形形色色的市民，所串聯起複雜又動態的連線，共同強調都市環境適居性和公共領域所可以扮演的角色。

從這兩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公共空間」已成為市民倡議的一股新的、更具包容性與更具整合性的動力。這個尺度擴大的過程，代表了對「公共空間」概念的重新定義：（1）和公共空間有關的「個案」被視為是大整體的一部分；（2）一個公共空間的「整體」代表了所有的連結與總和，並進而再擴展創造其他連結，以及認知到（3）「一個」既有公共空間（像一個公園或廣場）的健康和完整，與城市整體的適居性習習相關。相反的，一個對公共空間不利的個案（私有化的潮流、荒廢的狀況等等），則反映了對整體城市之公共領域的威脅。

參考書目

- Brodin, J. (2006)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Spa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almer House Hilton, Chicago.
-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14) 'Plan to Leave Cars on Public Space Opposed', 17 October, p. 1.
- Davidoff, P. (2003) 'Advocacy and Pluralism in Planning', in Campbell, S. and Fainstein, S. (eds.) *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Dines, N. and Cattell, V. with Gelser, W. and Curtis, S. (2006) *Public Spaces. Social Relations and Well-being in East London*, London: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 Eberle, M. and Serge, L. (2007) *Social Inclusion and Urban Form: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Study*, Ottawa: Canadian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
- Elliott v. Fraba. (1916) *Ontario Supreme Court—Appellate Division, Second Divisional Court*. 13 March 1916.
- Friedman, J. (1987) *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heen, P. G. (2000) 'The Struggle for Urban Public Space: Disposing of the Toronto Waterfro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Murphy, A. B. and Johnson, D. L. (ed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Viola Haarmann, *Cultural Encounters with the Environment: Enduring and Evolving Geographic Them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Habermas, J. (1962/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ingwell, M. (2008) 'The Prison of "Public Space"', *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 16 (3): 18-21. Online Available: <http://reviewcanada.ca/essays/2008/04/01/the-prison-of-public-space/> (accessed 31 May 2009).
- Klein, N. (2000) *No Logo: Tal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 Toronto: Knopf.
- Lolland, L. (1973) *A World of Strangers: Order and Action in Urban Public Sp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 Lows, S., Taplin, D. and Scheld, S. (2005) *Rethinking Urban Parks: Public Space & Cultural Diversit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1

**「非常」公共空間¹
(NOT) YOUR
EVERYDAY
PUBLIC SPACE**

JEFFREY HOU 侯志仁——文

吳比娜——譯

「飛夢」可說是西雅圖最有特色的社區之一²，街角立著一座十六呎高的列寧銅像（這不是美國嗎？），對街商店的屋頂上則架著一顆從海裡打撈起來的火箭，附近的橋底下還有一隻專吃金龜車、名叫クマツノ的神話怪獸。二〇〇一年的某一天，這個亦名為「宇宙中心」的社區，又多了一個寶貝，…一座八英尺長、金屬製的胖豬雕像，在黑夜裡被悄悄地設置在人行道上。

這隻豬仔在西雅圖立即造成轟動，社區居民議論紛紛，地方報紙連續幾週追蹤報導，追查到底是誰沒有經過准許就把它立在這裡。兩個月以後，當周邊店家開始抱怨，正準備將它搬

1 本文為《城市造反》英文版《反叛的公共空間》(*Insurgent Public Space*)的〈序言〉。

2 飛夢社區的故事，可見《飛夢共和國》，遠流出版社。

遷時，它又在一夜間神祕消失。後來，媒體發現這隻豬仔是兩位匿名藝術家的一件反商業主義的創作，主要在模仿並嘲諷官方的「豬兒大遊行」——一項以藝術結合募款為名的活動，在全西雅圖的購物中心和街道放置被裝飾的豬兒雕像。

矗立在人行道上，飛夢社區的這隻豬仔，不僅是社會和藝術的宣言，也是對當代城市公共空間的批判。儘管雕塑本身沒有影響街道空間的使用，但它「不正當」的出現，卻挑戰了公共空間的規範，包括市政府對公共藝術設置費用的要求。儘管豬仔的誕生沒有透過所謂的市民參與，但它引發了鄰居們、市民、媒體的討論，讓街道成為公共論壇。它的出現，使得公共空間的「公共性」真正鮮活起來。

世界各地類似飛夢豬仔的事件，層出不窮。它們代表了微小卻持續不斷的反抗行動，挑戰著日益被規範化、私有化與一致化的公共空間。以美國奧勒岡州的波特蘭市為例，「城市修補」(City Repair)的社運分子，把十字路口漆上鮮艷的顏色和花紋，邀請附近居民，一起把平凡的十字路口變成鄰居們的聚會空間。在倫敦，「空間駭客」(Space Hijackers)從事了一系列的城市游擊行動，包括在街道上放長椅，讓街道不只是枯燥的步行空間，以及在倫敦的地鐵車廂裡辦派對(Circle Line Party)，直到被警察阻止。在台北，受不了高漲的房價和政府的無作為，市民占據了城市的精華地段，睡在路中間抗議，開始了當年的「無殼蝸牛運動」。

這些反叛的行動跨越了國界，也反映了不同的社會脈絡和議題。從歐洲到亞洲，人們占領都市的剩餘空間和工業廢地，轉做新的用途。從北美洲的東岸到西岸，新移民改變了都市地景，置入新的活動與功能。在東京，郊區住宅被轉化成為所謂

的「第三地點」(Third Place)³，既是私人的空間也是社區的領域。從西雅圖到上海，人們種菜或跳舞，長期或是暫時性的占領了都市空間，注入新的活力與意義。

這些自力營造的場所、都市空間的收回和挪用、暫時性的事件與快閃行動，為當代城市的集體領域提供了新的形式。不再受限於鄰里公園、廣場、市政建築等傳統公共空間的典範，這些「反叛」的公共空間，挑戰了所謂「公共」的定義和「空間」的生產模式。

作為市民或是專業者，我們可以從這些日常（或「非常」）的反叛行動中學到什麼？從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代城市的公共領域有哪些侷限與機會？這些反叛的空間與行動，究竟如何挑戰傳統對於公共的定義與空間的生產？它們如何擴展公共空間的角色、功能與意義？這些即是我們在本書中所討論的問題。

公共空間：民主、排他性與政治控制

公共空間長期以來，一直是城市文化一個重要的面向。在全世界各地城市裡，廣場、市集、街道、廟宇與公園一類的空間，長久以來一直是市民生活的中心，提供了聚會、社交、休閒與慶典等活動使用，有時也不免成為抗爭與示威的場所。公園和廣場等開放空間，為擁擠又僵硬的都市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抒解。作為公共空間之一的公共建築不但是一個城市精神的表徵，同時也隱藏著許多個人的記憶。作為日常生活與重要歷史事件發生的地方，公共空間同時蘊含著官方和非官方的集體記憶。

3 Third Place是Ray Oldenburg(1989)所提出的概念，意指介於家居與工作之間、支持社區生活的地點。

扮演著城市裡社會關係、公共論述和政治行動的媒介，公共空間不只是有形的空間與疆界。就如Henaff和Strong(2001: 35)所說的，公共空間「是一串社會關係、政治制度、司法規範的組合」。Brill(1989: 8)也寫道：公共空間是公共領域和公共生活的代表，是「一個論壇、一個群體行動、社會學習的場域，還有相互交流的平台」。西方傳統裡，從希臘的小廣場時代開始，公共空間就一直有著民主、開放與公眾討論的正面意涵，因此Henaff和Strong(2001: 35)認為，民主的概念和公共空間息息相關，「公共空間意指對所有人開放、被大眾所熟知，被每個人所認同……是特殊利益與私人空間的反義詞」。地景建築學者Mark Francis(1989: 149)亦寫道，「公共空間是一個公民意識與公共性形成與表現的地方」。此外，Fraser(1990)也視公共空間為市民對話和連結的場域，而I. M. Young(2002)更進一步認為，公共空間代表一座城市的開放性，並反映它的多元與包容。

然而，相對於這些正面的描述，公共空間的真實面卻往往顯現了政治現實和社會偏見。Agacinski(2001: 133)指出，在法國大革命前，所謂的「公共／公眾」在西方的定義，僅限於那些「識字又知書達理的人」，「和一般大眾迥然不同」。即使是在近代西方歷史，研究者認為，「儘管表面上具有公共性和可即性」，官方或正式的公共空間通常建立在某種程度的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包括性別、階級和種族的排除(Fraser, 1990: 59)。性別特別是一個有力的排除界線，使女性被規範在私領域，阻絕她們充分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Drucker and Gumpert 1997)。因此，所謂的公共空間，長期以來一直是充滿排他性的，它代表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劃分，

圖 11.1

淺草寺今日是旅遊勝地，但原本它一度是江戶時期東京的遊園地，位在城市的輻員之外。
(侯志仁攝)



以及某些社會成員的權利，不同於Young (2002) 對公共空間持有具包容差異和多元的定義。

除了排他性外，公共空間自古以來也是權力展現的場域，以及受政治控制的對象。在中世紀西方的君權下，公共空間常常是政治力上演、展現和被正當化的舞台 (Henaff and Strong 2001)。在近代的集權國家，大型的公共空間通常是軍隊遊行的場所，用來向人民和敵人炫示其武力。在現代的民主社會，當權力從君主被移轉到人民，公共空間總算是成為人們自由表達言論的正當場所。但這樣的自由，若沒有經過重重奮鬥和警戒，則從來不會真正實現。「後911」注重安檢和充滿監視的反恐時代給了我們新的警訊，公共空間裡各種層出不窮的新管制，已經大大減少了人們行動與言論的自由，限制了公共空間裡的活動與意義 (Low and Smith 2005)。

在不同的文化傳統裡，公共空間的功能和意義也跟著有所



圖 11.2

首爾消失中的避馬巷，原本是城市裡平民的重要通道和非正式公共空間。

(侯志仁攝)

差異，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社會和政治控制。在近代的西方民主體制裡，公共空間和公共意見的形成，是民主程序的重要一環。透過集會和對話，公共領域裡的言論代表對政府的監督，使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公眾」(public) 和「國家」(State) 的區別，是正規民主政治的重要元素。相反的，在深受儒家影響的東亞，社會和個人生活幾乎全部由對國家和家庭的責任所支配，沒有留白，也沒有公眾的觀念。在傳統上，公共空間要非不存在，就是緊緊地由國家所掌控。

江戶時期的東京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下，城市在空間上被劃分為山手（由高地上官員所居住的大型私人宅院所組成）和下町（一般大眾所居住，擁擠並受嚴密管

理的街區)兩區。在下町，唯一的大眾聚集地是有柵門的街道和岸邊的市集，人們如果想要躲避規律嚴謹的日常生活，就必須要到城市外圍的遊園地，包括今日的淺草一帶(圖11.1)。

在許多亞洲城市裡，公共空間往往等同於由國家、公部門管理的空間。相較之下，真正有活力的日常都市生活，反而多發生在後街、小巷等遠離正式公共空間的領域。首爾的「避馬巷」，一條平行於主要歷史軸線鐘路的窄巷，就是一例(圖11.2)。在封建時代，平民在鐘路上必須對騎著馬的貴族與官員行禮，久而久之，為了要迴避對貴族與官員頻頻鞠躬，平民大眾轉而在後巷闢出一條捷徑，逐漸的，餐廳和商店開始在後巷發展起來，像是一個平行的小宇宙，充滿城市的紛亂與活力。

在美國，公園的發展和設計，則提供了另一種例子，顯示公共空間不及想像中的開放，反而一直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制式的管理。Cranz(1982: 3, 5)指出，美國早期田園式的公園設計風潮是建立在「反城市的理想」，「為了將人們從萬惡的城市帶回田園的純淨環境」。後來普遍可見的現代式鄰里公園，亦反映了這種觀點——它們通常位於人口稠密、由移民和勞工階級所組成的社區。這些公園與遊戲場的設置，主要是讓兒童和成人遠離混雜的街道，讓遊玩紀律化，並將新移民同化到美國主流文化裡(Cranz 1982)。今日，雖然多元文化的價值已常被主流社會所接受，但這歷史性的偏見仍普遍存在。Low, Taplin和Scheld(2005: 4)即發現，在美國「大型公園的限制性管理，對移民與少數族裔以及各種文化族群，創造了越來越不友善的環境」。觀察了洛杉磯各種不同文化群體在鄰里公園裡的使用行為，Loukaitou-Sideris(1995: 90)寫道：跟包容的概念相反，「現代美國的鄰里公園，並不符合社會不同

層面人士的需要」。

■ 被侵蝕的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

數十年來有關公共領域的文獻中，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的侵蝕和消失，已成為一個顯要的主題。在《再會吧！公共人》一書中，Sennet（1992/1978）提出，公共生活已經成為一種形式化的要求，特別當私人 and 個人生活優先於公共時，社會越來越少去關注公共事務，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利益和個人慾望的操控。他指出，代表「失去平衡的私人生活和空洞的公共生活」最具體的例子，就是現代建築中死氣沉沉的公共空間，裡面根本就沒有社會互動的機會（Sennet 1992/1978: 16）。更晚近，Putnam（1995）以「獨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的比喻，來描述美國社會日漸低落的市民參與：投票比例減少、公共會議出席率降低、傳統組織像是工會和教會成員的減少，都是例子。他認為，這樣的風氣削弱了民主政治的運作（Putnam 1995）。

近幾年來，公共空間普遍的私有化，更危及了原本在實質和精神上均已搖搖欲墜的公共空間。在世界各地的市中心和郊區，土地被轉變為主題式購物中心或是所謂的假日市集。為了重塑往日成功的都市空間，仿傳統的市街和小鎮廣場被重新打造，但同時這些地方又和其他都市空間隔離起來，創造一個購物和商業的安全天堂。儘管這些空間在外表和形式上，看起來很像過去傳統的公共空間，但它只徒有外表，而沒有真實的功能和意義。

此外，為了刺激經濟成長，公共資金被拿來補貼私人計畫的開發，開發商只要提供一些功能有限的公共空間，就能大幅

受到獎勵。隨著街道、鄰里、公園變成購物中心、圍牆化的社區與企業空間，公共空間已逐漸受限於新的擁有權與商品化的控制之下。Davis (1992) 觀察到：量販店和超級購物中心的「公共」空間，已取代了傳統街道，並規範了原本即興的活力。Loukaitou-Sideris 和 Banerjee (1988) 更寫道：「美國市中心是為了企業經濟的需求而量身打造，把城市的形式屈居於利益的邏輯之下」。

受控制的公共空間已是全球城市的普遍現象，代表著空間的形式與意義如何隨著資本的力量而改變。從洛杉磯的邦克丘 (Bunker Hill) 到約翰尼斯堡的沙敦 (Sandton)，私人利益建造了城堡化的市中心和次中心，為了保護各種「類公共空間」和私人財產，使其免於受到「不受歡迎份子」的入侵 (Whyte 1980)。除了功能受限，公共空間的私有化也影響了現代城市的政治氛圍，Kohn (2004: 2) 寫道：「當私人空間取代了大眾的聚集場所，政治對話的機會也就隨著消失」。Mitchell (2003: 34) 也提出，「在一個由私人財產權所定義的世界，要去形成一個健全、有包容力、又多樣化的公共，實在難上加難」。Barber (2001: 203) 進一步指出，空間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將我們原本「複雜又多功能的公共空間變成單面向的消費場所」，他寫道：「美國城市的購物中心化，也意味著美國市民社會和公共的撕裂」(Barber 2001: 201)。

▮ 反叛的公共空間：暫時的脫序與平日的對抗

有了這麼多歷史枷鎖和種種的阻礙，一個開放和具有包容性的公共空間是否還可能存在？Mitchell (2003) 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論斷，那就是公共空間的創造以及自由開放的保障，



上 | 圖 11.3

野草莓運動的學生們占據台北的自由廣場，抗議警方濫權，還有法律對集會遊行自由的限制
(侯志仁攝)



下 | 圖 11.4

學生們所建的暫時性紀念堂，哀悼民主的墮落。
(侯志仁攝)

是一場無止境的奮戰和行動。他寫道：「公共空間的概念從來就不是被保障的，它只能由不斷的抗爭中得來」(Mitchell 2003: 5)。同樣的，Watson (2006: 7) 認為：「公共就意義上而言，永遠是在發生中，沒有被完成，而且是永遠被爭論的」。Mitchell (2003: 5) 更進一步指出，「這種抗爭是保障公共空間自由、促進社會正義的唯一方法」，對 Mitchell 而言，只有透過行動以及具目的性的占領，公共空間才會變成公共的。

今日，即使有越來越多的公共空間受到規範和私有化，不少個人和團體仍然努力不斷，爭取更多的自由，這些行動儘管稍縱即逝，但它們反駁著 Sorkin (1992) 所宣稱的「公共空間之死」。在舊金山，自行車團體「關鍵多數」(Critical Mass)，透過定期的聚眾騎車，將街道從汽車輪下奪回，這個行動現在已經出現在世界三百個以上的城市。在北京(舊金山的自行車騎士即是從這裡得到啟發)，即使在天安門的民主行動被鎮壓後，廣場仍舊是一個緊繃的政治舞台，不時有零星爆發的個人的抗爭。二〇〇八年在台北，野草莓運動的學生們在自由廣場露宿，抗議陳雲林事件中警方的濫權，為了顯示他們的決心，要求政府回應，學生們在廣場上建造一個村落，有廚房、教室、一個菜園、網播站、民主靈堂，還有露營區(圖 11.3 和 11.4)。在香港，菲律賓外勞每個週日占據了建築大師諾曼·佛斯特(Norman Foster)所設計的著名之匯豐銀行大樓(一個全球資本的象徵)之一樓川堂，移工們在那裡野餐、聊天、敘舊和聚會(圖 11.5)，將冰冷的企業入口，轉變成充滿活力的聚集場所。

從不同的面向來看，即使通訊和媒體科技的進步，減低了實體公共空間的重要性，它們也使新的行動和市民異議的表現成為可能。自一九九四年起，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對墨西哥政府的抗爭，即是透過網際網路的串聯，在國際上建立強而有力的支持。從二〇〇〇年在西雅圖反WTO的抗爭開始，反全球化的社運分子依賴全球化的科技，彼此聯繫策劃，在世界領導人和國際金融機構的會議所在，進行示威。不久前，在中國的沿海城市廈門，手機簡訊讓上千的民眾得以在瞬間聚集起來，抗議一座化學工廠的興建，迫使地方政府否決了這項開發。最近，社群網路工具，例如推特(Twitter)，被認為跟在伊朗和摩爾多瓦(Moldova)發生大規模動員和抗爭有關(Cohen 2009)。整體來說，這些例子證實了Mitchell的推論：公共空間之死的論斷「過於簡化」，「沒有考慮到新形態的公共空間已然興起」(Mitchell 2003: 8)。

在日常生活裡，市民自發與非正式的活動，其實也在創造新的公共空間形式與使用模式。一時興起的活動、非預期的使用，抗拒或是逃逸既有的規定，這些日常的行動將都市空間轉化為Watson(2006: 19)所稱之「一個充滿可能、差異和樂趣的交會所在」。關於這點，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是北美和世界各地的社區園圃運動，成千上百個原本閑置或被遺棄的土地(包括公共和私人的土地)，被轉化成有生產性的菜園，成為社區可以耕種、休閒、聚集、教育的所在(Lawson 2005, Francis et al. 1984)(圖11.6)。像社區園圃這般的開放空間，已成為另類的城市公園系統(Francis, et al. 1984)。因為同時有個人和集體的使用，融合了私人和公共利益，這些社區園圃就像是「混血的公共空間」，跟保守與單一性質的正式公共空間截然不同(Hou, et al. 2009)。

這些日常的公共空間行動，乍看下雖然不那麼具反叛性，



圖 11.5

每個星期天，菲律賓移工將匯豐銀行的大廳轉換為社群的聚會地方。
(侯志仁攝)



圖 11.6

像是西雅圖國際區裡的胡培進 (Danny Woo) 園圃，是由居民和社區工作者所一起建造的，和一般的公共空間在形式和功能上大有不同。

(侯志仁攝)

但在很多案例中，若不是經過持續的草根奮鬥，它們的成果不會存在。舉例來說，在西雅圖的貝克山 (Mount Baker) 社區，居民、耕作者和社區工作者曾一度聯合起來，去抵抗市政府把一塊原本已廣為使用的社區園圃，出售給房地產開發商。他們和全市的開放空間支持者組織起來，向市議會陳情，最後通過法令，規定市政府在出售公園土地的同時，必須要在同一個鄰里內以一塊同樣大小的開放空間作為補償，這項條文不只有效的保存了他們的菜園，也守護了城市裡其他類似的公園土地 (Hou et al. 2009)。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在士林夜市——台北市最受歡迎的夜市之一，非法的攤販每天晚上為逃過警察的取締，發展出自己的監視機制、可移動的設備，與暫時性的倉儲地點，當警察從

遠方來到市場時，攤販可以輕易得知，彼此用暗號互通，並在數秒內瞬時消失，然後在警察走後又再度聚合（圖 11.7）。這種非正式的機制和劇碼，每晚要上演好幾次，使擺攤的人與逛夜市的民眾得以逃過法律規定，共同創造一個熱鬧和充滿活力的市集。

■ 關於「反叛的公共空間」一詞

本書《城市造反》的英文版 *Insurgent Public Space* 一書是一項嘗試，它的目的在於讓我們能更加瞭解這些抗拒傳統規範和認知的「非常」公共空間，它的焦點不只是這些另類的空間，還包括空間裡發生的活動與社會關係，以及它們如何因應現代社會的限制與變化。「反叛的公共空間」這個標題的用意，在於讓我們能定義和陳述這些另類的公共空間和社會關係。與其哀嘆公共空間的消逝，不如讓我們重新詮釋公共空間的生產，進而支持一個更多元、正義與民主的社會。

這本書的編纂集結了許多個人的聲音，他們透過實踐、研究、教學，還有公民參與，積極的在實現這樣的空間生產。這些作者有人類學家、傳播學者、地理學者，還有建築師、藝術家、社區組織者、地景建築師與規劃師。所有的文章都聚焦在真實的案例，它們提供了現實中的經驗，也探索了新的可能性。由於類似的案例遍佈在全球各地，我們也盡可能匯聚來自不同地理區域與社會背景下的案例。

近來有些出版品，對相關的主題已有所著墨，反映學術界對於公共空間的另類使用亦越來越感興趣，像是《鬆空間》（*Loose Space*, Franck and Stevens 2006）和《日常都市主義》（*Everyday Urbanism*, Chase, et al. 1999）等書。Franck 和

Stevens (2006: 4) 在《鬆空間》中強調，所謂非預期的使用「有能力去鬆動特定場所的主流定義，讓新的觀感、態度、行為得以發生」，他們將鬆空間定義為「不同於美感和行為都受控制、以娛樂和消費為主、不容許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的同質化主題空間」(Franck和Stevens 2006: 3)。在《日常都市主義》這本書中，Crawford (1999) 提出一個類似的概念，她寫道：「日常空間不同於精密規範、官方定義、充斥於美國城市的那些通常低度使用的公共空間」，「它代表讓社會轉變的機會，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和想像得以發生」(Crawford 1999: 9)。

在《嬉戲城市》(*Ludic City*) 中，Stevens (2007: 196) 則探索公共空間的遊戲性使用，這些空間常是「非工具性、活躍、無法預期，而且冒險的」，但是他們卻提供了新的經驗，並創造了新的社會關係 (Stevens 2007: 196)。同樣的，在《城市大眾》(*City Publics*) 一書裡，Watson (2007: 7) 把焦點放在「邊緣的、未偽裝的、隱藏和象徵的空間」以及「常被遺忘的主題」。而在《非正式城市》(*The Informal City*) 一書中，Laguerre (1994: 2) 探索城市的非正式性，如何做為「能與外在規範和控制抗衡的力量」。他進一步認為，與正規化的空間相比，「城市的非正式性是一種自由的表徵」(Laguerre 1994: 24)。在設計和規劃領域裡，最近一系列的出版品，也反映了對參與式行動主義的重新重視 (見 Architect for Humanity 2006, Bell 2003, Bell and Wakeford 2008, Bloom and Bromberg 2004, Palleroni 2004)，在越來越多的案例中，專業者和市民或社區一起，轉化都市空間提供給社區和大眾使用。在《為生態民主而設計》(*Design for Ecological Democracy*) 一書中，Hester (2006) 則連結一個更大的公共空間——地球的社會和生態系

圖 11.7

台北市林夜市地攤能在數秒鐘之內攜帶他們的商品消失，逃避取締，這也讓原本豐富的夜市更具機動性。

(侯志仁攝)



統。最後，「反叛的公共空間」之概念，也受到James Holston (1988: 39) 所提出「反叛公民權」(Insurgent Citizenship) 和「公民的反叛空間」(Insurgent Space of Citizenship) 的啟發，正如與由政府所掌控的公民權相對立，反叛的公共空間也對立於那些由國家所規範、控制、管理的公共空間。

「反叛的公共空間」一詞企圖立基在這些另類都市行動的探索和詮釋上，去想像新的公共空間的生產方式，一種異質的、流動的與多元的空間。前面的章節訴說著不同的抵抗故事，我們在此將這些故事做初步的分類，但這個分類不是強硬

的歸類，而是用來強調這些行動不同的特色和目的地：

▶ 挪用 Appropriating

代表將公共空間的所有權、結構與意義，進行暫時的或甚至永久的顛覆。本書的案例，描述市民如何賦予現有都市地景新的用途。在北京，Caroline Chen 檢視當地居民面對著都市的急劇變化，如何利用既有的公共設施和城市剩餘的空間，作為每天娛樂和休閒的地方。在舊金山，Blaine Merker 描述藝術與設計團體 Rebar，如何在公共和半公共空間之間找到了「立足點」，作為社會和藝術對話的基地。

▶ 取回 Reclaiming

描述的是將被遺棄或低度使用的城市空間，給予新的使用。在柏林，Michael LaFond 描述 eXperimentCity 的例子，將城市裡的空屋轉變成為合作式住宅、生態建築和青年創作的所在。在東京，饗庭伸和西田司述說他們的 Re-City 計劃，將東京舊市區神田的既有建築物重新利用，轉變為新的鄰里空間。

▶ 多元 Pluralizing

指的是特定的族群如何改變了公共空間的意義和功能，形塑一個更異質的公共領域。在洛杉磯，James Rojas 檢視拉丁裔移民即興的空間創造，把現有的街道、人行道與空地作嶄新的使用，進而衍生所謂的拉丁都市主義。在西雅圖，作者檢視在國際區華埠夜市的形成，如何引發了社區裡空間、文化和社會關係的重建。

▶ 越界 Transgressing

代表透過暫時性的占領、侵入或是穿越所謂私有和公領域的界限，營造出新的空間意義與社會關係。在這裡，東京世田谷的案例，探討了公私領域的跨越，以及以社區非營利組織的網絡，作為日本「新公共」基礎的可能性。在香港，菜園村的案例代表了社運工作者，將公共議題的陣線從城市的廣場，拉到市郊的農村，挑戰了城市與鄉村、公共與社區的界線。

▶ 對抗 Contesting

代表對公共空間權利、意義與認同的持續競奪。在加拿大，Andrew Pask 檢視公共空間行動主義如何在溫哥華和多倫多逐漸成長，監督並挑戰了公共空間的私有化問題。Teresa Mares 和 Devon Peña 則檢視了兩個美國都市農場的案例，說明公共空間如何被拿來從事食物生產和社區營造，對抗傳統城市規劃下制式化的土地使用。

▮ 游擊式都市主義： 麻雀雖小、意義甚大的都市公共空間

這本書裡的故事，訴說著不同個人和社區群體，如何透過多樣的行動重新定義了公共空間的界限、意義和功能。這些個體和群體包括了藝術家、建築師、地景建築師規劃師、社運分子、塗鴉藝術家、居民、移民、家長、學生、老師、性工作者、違建者、都市農夫等。這些例子提示著，社會的每一分子均可以憑自己的力量，透過不同的方式重塑公共空間，進而從事城市空間與社會關係的再造。從將私人住家轉化為社區用途，到

占領街道另作為他用，這樣的行動或許看來微不足道，但也因此不需要過度的投資和建設，就能有效的改變原本單一又乏味的都市地景。也許這些行動是非正式的、並缺乏組織，但它們成功顛覆了正式公共空間裡生硬的空間結構與社會關係，使新的互動、連結和意義有了可能性。

這種另類空間創造的過程，正因為規模小，往往更有參與性與自發性，所以也更加的開放，包容多元的群體與個人。它們所創造的「反叛式公共空間」看來雖小，意義卻很大。這些行動反映了不同參與者的主體性，而這些空間也乘載著更大的能量與可能性，進而觸發更多元的個人和集體行動。雖然這些行動者不完全吻合Fraser (1990: 67) 的所謂「低階的逆眾者」(Subaltern Counterpublics)，但透過對霸權的規範與毫無人格之「公共性」的抵制，這些行動者均參與了在當代社會的公共領域中「論述對抗的擴大」(Fraser 1990: 67)。

「反叛式公共空間」的創造，提示了一種新的城市建構方式。它不同於制式的都市主義和其衍生的整體計劃和通盤政策，也不同於傳統由學者和專家主導的都市規劃的實行方式。本書的案例，說明了市民團體和個人在都市環境的形塑過程中可扮演的積極角色，挑戰硬性的法令與規範。它們也提示了，即使在規劃法規和鳥籠參與的阻撓下，市民和市民團體仍然可以採取行動去進行改變，抵抗主流社會的支配性力量。這些自力救濟和反抗，就是所謂的「游擊式都市主義」。

隨著城市之社會、經濟與政治面向的持續改變，公共空間的功能、意義和生產方式也勢必跟著演化。當現今城市人口和文化變得更多元，文化和社會的差異變得更顯著，公共空間的生產和使用也常充滿著高度的爭議。反映著當今文化、經濟和

城市空間的變遷，反叛式公共空間的出現，代表一種日益豐富的行動與實踐，讓社會裡不同的聲音與價值得以表現出來。如果公共空間是城市裡認同、意義與社會關係之生產、編碼與維繫的所在，反叛式公共空間所孕育的，也正是新的認同、意義和社會關係的連結與啟動。透過豐富與多元的行動，反叛式公共空間使得更多人得以參與城市的再造，讓城市空間成為公民意見交流和辯論的場域。透過持續的表達和爭論，反叛式公共空間的出現和營造，可被視為我們當今社會民主和包容的指標。

參考文獻

- Agacinski, S. (2001) 'Stages of Democracy', in Henaff, M. and Strong, T.B. Strong (eds.), *Public Space and Democrac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rchitecture of Humanity (ed.) (2006) *Design Like You Give A Damn: Architectural Responses to Humanitarian Crisis*, New York: Metropolis Books.

- Barber, B.R. (2001) 'Malled, Mauled, and Overhauled: Arresting Suburban Sprawl by Transforming Suburban Malls into Usable Civic Space', in Henaff, M. and Strong, T.B. Strong (eds.) *Public Space and Democrac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ell, B. (ed.) (2004) *Good Deeds, Good Design: Community Service through Architecture*,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Bell, B. and Wakeford, K. (eds.) (2008) *Expanding Architecture: Design as Activism*, New York: Metropolis Books.
- Bloom, B. and Bromberg, A. (eds.) (2004) *Making Their Own Plans/Belltown Paradise*. Chicago: WhiteWalls, Inc.
- Chase, J., Crawford, M., and Kaliski, J. (eds.) (1999) *Everyday Urbanism*,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 Cohen, N. (2009) 'Twitter on the Barricades.' *The New York Times*, 21 June. Online. Available HTTP: http://www.nytimes.com/2009/06/21/weekinreview/21cohenweb.html?_r=1&sq=iran%20twitter&st=cse&scp=1&pagewanted=print (22 June 2009).
- Cranz, G. (1989) *Politics of Park Design: A History of Urban Parks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rawford, M. (1999) 'Introduction', in Chase, J., Margaret C., and Kaliski, J. (eds.) *Everyday Urbanism*,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 Davis, M. (1992) 'Fortress Los Angel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Urban Space', in Sorkin, Michael (ed.),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Drucker, S.J. and Gumpert, G. (eds.) (1997) *Voices in the Street: Explorations in Gender, Media, and Public Space*.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Inc.
- Francis, M. (1989) 'Control as a Dimension of Public Space Quality', in Altman, I. and Zube, E. H. (eds.) *Public Places and Spaces*, New York: Plenum Press.
- Francis, M., Cashdan, L. and Paxson, L. (1984) *Community Open Space: Greening Neighborhoods through Community Action and Land Conservatio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Franck, K.A. and Stevens, Q. (eds.) (2007) *Loose Space: Possibility and Diversity in Urban Life*, London: Routledge.
- Fraser, N. (1990)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Social Text*, 25/26: 56-80.
- Henaff, M. and Strong, T.B. (eds.) (2001) *Public Space and Democrac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ester, R.T. (2006) *Design for Ecological Democrac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olston, J. (1998) 'Spaces of Insurgent Citizenship', in Sandercock, L. (ed.)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A Multicultural Planning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u, J., Johnson, J.M., and Lawson, I.J. (2009) *Greening Cities, Growing Communities: Learning from Seattle's Urban Community Garden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Kohn, M. (2004) *Brave New Neighborhoods: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Routledge.
- Laguerre, M.S. (1994) *The Informal 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oukaitou-Sideris, A. (1995) 'Urban Form and Social Context: Cultur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Uses of Urban Parks',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4: 89-102.
- Loukaitou-Sideris, A. and Banerjee, T. (1998) *Urban Design Downtown: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ow, S. and Smith, N. (eds.) (2006)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Routledge.
- Low, S., Taplin, D. and Scheld, S. (2005). *Rethinking urban parks: public space & cultural diversity*,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Mitchell, D. (2003)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Oldenburg, R. (1989) *The Great Good Place: Cafés, Coffee Shops, Community Centers, Beauty Parlors, General Stores, Bars, Hangouts, and How They Get You through the Day*, New York: Paragon House.
- Palleroni, S. (2004) *Studio at Large: Architecture in Service of Global Communi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Platt, R.H. (1994) 'From Commons to Commons: Evolving Concepts of Open Space in North American Cities', in Platt, R.H., Rowntree, R.A., and Muick, P.C. (eds.) *The Ecological City: Preserving and Restoring Urban Biodiversity*, pp. 21-39,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Putnam, R.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 65-78.
- Sennett, R. (1992/1978)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 Sorkin, M. (ed.) (1992)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Watson, S. (2006) *City Publics: the (Dis)enchantments of Urban Encounters*, New York: Routledge.
- Whyte, W.H. (1980)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Washington, DC: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 Young, I.M. (2002) 'The Ideal of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Bridge, G. and Watson, S. (eds.) *The Blackwell City Read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Young, T. (2004) *Building's San Francisco's Parks, 1850-193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